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报告文学选集)

何与怀

澳大利亚文化出版社

Australia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报告文学选集)

作者：何与怀
责任编辑：唐培良
封面设计：张仲衡

出版发行：澳大利亚文化出版社

Australia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00 千

版次：2024 年 5 月第一版

202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978-0-6458944-2-4

定价：\$30.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 | |
|----------------------|-----|
| 前言 | 1 |
|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 6 |
| 十字架下的圣女 | 61 |
| 她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 | 78 |
| 那颗曾经划破夜幕的陨星 | 97 |
| 宾雁：上下求索，虽九死犹未悔 | 117 |
| 北望长天祭英魂 | 138 |
| 大时代剧变中的一个悲剧 | 168 |

| | |
|-----------------------|---------|
|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 182 |
| 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经是那样跃动 | 236 |
| 他一生短暂，却是世间罕见的传奇 | 272 |
| 附录 | 298 |
| 谁为华夏鼓与呼 | 雨 石 299 |
| 鲁迅的恶意与中国人的智慧 | 武陵驿 304 |
| 躁动的火山 | 蒋行迈 308 |

前言

何与怀

本书选收本人十篇报告文学作品。

关于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报告文学曾经在中国大陆高度发达，高度繁荣，拥有异常大量的读者群。那时，具有强烈社会性、政治性的大事件、大问题成了报告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内容。许多作品，并不听命於某党某人，皆非歌功颂德之作，而是作家出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发自心底的声音，或多或少带有冷峭的、批判性的色调。许多作品，其道义水平之高，社会震撼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由於报告文学的极大成功，文史家相信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某一文学样式可以特别获得迅速发展而达到高峰；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那几年，对中国文坛而言，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时代。它使整个中国文坛为之激动，

1988 年被文史家称为“报告文学年”。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报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特别密切。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激活人们的思考与追求，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向执政党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正是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或在现实中出现的一个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特别刺激了报告文学的繁荣，并促使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的刘宾雁这种作家的诞生。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当政下，是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几十年里比较不那么恶劣的时代。特别在文化文学艺术领域里，中宣部长朱厚泽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于 1986 年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宽容、宽厚和宽松——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对照近年来中国精致新极权高压统治的政治社会状况，以上这些已经恍若隔世。不要说“刘宾雁”这个一度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的名字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已被他的国人忘记了；在政治高压与金钱引诱双重作用下，伪劣作品层出不穷，惨不忍睹。一些报告文学作者是冲在前面摇旗呐喊了，但往往是为了证明和宣传党的某些概念，特别是为党主“个人崇拜”大唱赞歌，完全工具化、脸谱化、夸张化、虚假化。而那些坚守良知的报告文学作者，却受到打压，迫害，其优秀作品被下架，甚至根本不让出版。很多人惊呼：报告文学已死。

有论者曾悲愤地指出当今中国政治现实：“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那么，真正有作为的作家，必须对抗这场预谋，要有良知，要有底线，要坚持站在历史正义一边。

这是本人希望坚守的。

本书选收的十篇作品，有长有短，长的如《沉沦神州的血祭者》和《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长达三万两千多字。在写法上，如果说报告文学有些作品比较抒情，如徐迟所写的《哥德巴赫猜想》有些着重思辨，如刘宾雁所写的《人妖之间》，在本书所选的篇什中，也可看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有些我更是努力让抒情与思辨交响。无论如何，我力图写出真实：人物的真实、时代的真实。真实是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对报告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各篇所描述的人物非常不同，其人生背景和所处的具体环境也差别很大。但有一点这些人是相同的：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在这个大时代中全都命运多舛，其中一些甚至非常惨烈，惨遭中共暴政杀害。

本书书名因而取自第一篇文章题目：“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古代有一种宗教仪式——人祭（human sacrifice），即用人作为祭品来祭祀神灵。到了现代社会，即便是动物祭，也已经从许多宗教当中消失，活人献祭更是除了邪教外极端少见的行为。多数的宗教谴责此习俗，且现代世俗法律将活人献祭视同谋杀，人们会使用“仪式杀人”一词来谴责并严惩此种行为。然而，长久以来，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大大小的暴徒，就为他们的“革命”套上邪教的自奉为“神圣”的光环并以其神圣名义吞噬了千万人的生命。其罪恶罄竹难书！在这个沉沦神州，除了那些以鲜血祭祀民主自由的先知先觉者外，还有一些被黑风妖雾裹挟到地狱的迷失灵魂。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把人变成鬼，变成另一类祭品。进而论之，中共可以调换主子，但它把人变成鬼的事业依然继续不变，而且还能变着花样，让可能的得宠的新鬼自鸣得意，以为不同于落难的已被

抛弃的旧鬼。

而那些为了祖国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那些先知先觉者，他们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气，反抗共产主义暴政，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像多年前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为我写的一篇序言中指出：他们是“高尚而深刻的灵魂”，人们应该为其镌刻一座心碑。

陈行之先生进一步畅想，渴望：

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陈先生美好的畅想和渴望令人肃然起敬，心向往之。然而，当今中国的现实很令人失望，令人悲愤。

本书第一篇文章《沉沦神州的血祭者》，抒发对死于文革的先烈的追思，写于2011年8月，笔者第二次造访重庆前夕，也正是野心勃勃的西南封疆大吏薄熙来大搞“唱红打黑”、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基于对其极度反感，文章结尾悲愤地喊出：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真让我非常困惑……”

非常不幸。眼下，的确的确，出乎许多善良的人们的意料，荒诞正在这个国度重演。

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

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甚至完全错误。

今天中国，真正的报告文学已死，固然在文学范畴上这很可悲，但更严重之处在于许多号称“知识精英”的利己者竟然热衷于助纣为虐。他们不但没有从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局限性吸取教训，还反其道而行之，谁上台就吹捧谁，为当局吹喇叭、抬轿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近百年来，中共制造了无数令人发指的灾难，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而眼下的中共国，尤为可怕。习近平定于一尊，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实行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在习总加速师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下，荒诞重演，且越演越离谱，越演越烈，这个国家正在他指明的方向走向又一次民族灾难。

人们说，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获取教训。难道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如此健忘如此不堪的民族吗？

处于当前中国严酷形势下，人们发现，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理论证实无比正确，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国的现实。今天，他二十多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华人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一

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一踏上这块土地，我不由得马上提醒自己，千万记住这句传遍世界的话：“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说出这个既生动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极其虔诚地把维也纳这个当时欧洲音乐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乡。

真是名不虚传。置身维也纳，便感受到浓郁的音乐气息。而音乐气息最浓是它的“金色大厅”了。这间大厅是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的主要演出场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的杰作。如评论家所说，这所大厅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厅”现在被称之为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在这里，你会看到全世界最杰出的乐队和演奏家们，更能够欣赏到本地的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

团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团体的演出。不过，即使要充分感受这个世界音乐之都，其实也并非一定要走进它的“金色大厅”。整座城市，跃动的令人悦耳欢心的音符无处不在。只要漫步街头，到处都可听到音乐之声——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在街头练功。你看着听着，心里便想，说不定其中有人几年后还会成为大师呢。在一些街边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入乡随俗，与当地人一起，或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或热情奔放地跳个什么舞。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人们还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这样敬仰了！

进一步见识这个世界音乐之都，最好还要亲临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端详着。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



维也纳公墓中的贝多芬墓

方正简洁，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

“Beethoven”（贝多芬），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

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

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虔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 2001 年，也是 5 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晚生后学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

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 2000 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 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 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 1990 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



本书作者与江涛女士在后者家中的合照
(摄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

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编辑《毗陵佛教》。

父亲于 2002 年 9 月 30 日往生后，在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共分为四册的林子青选集

——《一花一叶一如来：林子青佛学论著

集》《白云深处一禅僧：林子青传记文学集》《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和《鸿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书信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不但对她家族而言，而且对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江涛悉心毕力，把这套书编得非常出色，真是可

敬可佩，在悉尼华人文化界传为佳话。

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其中一件小事，涉及她和我的交往，缘因我前几年出版了一部名叫《北望长天》的报告文学随笔集。

《北望长天》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烈士和精英。这部书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创办人主持人萧虹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陈先生序言最后写了一段令我感激不尽也令我担当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据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

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拙著《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遗照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

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

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 Chas. D. Blake 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 Gustav Lange 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 年 1 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 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 1956 年 10

月 11 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



陆洪恩手迹（书信）

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

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

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陆洪恩书信信封一叠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睬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

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

“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
面向工农兵，
还是工农兵面
向贝多芬呢？
我看应当是
工农兵面向贝
多芬。工农兵
应该提高自己的
文化艺术修
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的通知书及他艺术活动的照片（见上海交响乐团建团五十周年纪念册）。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

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说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元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儿子陆于为在赠送江涛的上述纪念册中有关父亲那一页的一角上录了四句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此表达他对父亲的怀念和无限惆怅之情。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

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

“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

并冲动地喊起来：

“修正主义万岁！”

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

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

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

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



刘文忠先生

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14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

“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

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

“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

“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是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

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

“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 he 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

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

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

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 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 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

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 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阅读 1144 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

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



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等人被押到“上海革命文化广场”，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是当时上海报纸的“报道”。

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

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

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刘文忠和陆洪恩儿子陆于为（手上拿着的是父亲的画像）。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1957年，刘文辉二十岁，因为向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艰苦的舟山岛船厂工作，其间长期偷听“敌台”，1964年组织策划偷渡出境去日本与台湾，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审查关押。1966年春天，舟山嵎泗法院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犯”，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三年。但这位未满三十岁身处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长期苦读自修（曾先后考读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适

先生提倡的独立思考精神，一直怀抱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他居然在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烧之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也最致命的壮举。

《十六条》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会下大笔一挥，变出一张奇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决定》这个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刘文辉阅读了这个《决定》，便马上告诉弟弟：这个文件出笼，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左倾思想，一定会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刘文辉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气，顺次加以批驳。刘文忠当年帮他哥哥抄写，迄今为止还能逐条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章节和话语：

第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刘文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为理由，大肆向亚（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完全不顾中国国内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新阶段，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这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是建立战争策源地……。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

第三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刘文辉号召青年学子学习

胡适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要学会识别真伪、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自作结论”，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所谓最高指示。他提醒党内外不要盲从，擦亮眼睛。他指出，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他还指出：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对中国人的教诲，今天看来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在华人世界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在发扬继承，如果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

第四条：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刘文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这是历史教训……。

第五条：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刘文辉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他指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条：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刘文辉说：要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与同胞手足之情。所谓敌我矛盾是毛推行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对他暴政的不满。关于区别对待党内干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内有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经济建设，不赞成毛搞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这批干部才是毛发动这场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对象……。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文辉说：文

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是疯狂迫害民众。中国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在关于自杀与拼杀一段，他号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部门，占领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第八条：区别对待党团干部。刘文辉指出，共产党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产党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产党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泽东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独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党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条：教学改革。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浩劫，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孔子就是对师道尊严的颠覆抵毁。所谓批判“封资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实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残，这场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当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边一群奸人所愚弄。他还指出：所谓打倒旧教育制度，所谓“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

第十二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刘文辉指出：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协，不要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第十三条：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刘文辉说：“四清运动”是毛精心策划的想改造、控制农村干部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失败而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已造成中国农村饿殍遍野，农民怨声载道，毛察觉和担心广大农村干部对他的不忠，为了重树自己威望，所以要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农村干部实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刘文辉主张：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把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引进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十五条：部队。刘文辉说：党指挥枪就是专制的特征，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类的谬论，主张部队要研究，要批判。他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独裁；号召军队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刘文辉指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

平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了人民。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刘文辉一再提醒说：毛泽东这个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

刘文辉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国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刘文忠清楚地记得，他抄写时每次写到“毛泽东”三字，自己的手都会发抖。他辉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的秦始皇、暴君、独裁者与疯子。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辉哥用鲜血热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有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过研究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就会知道刘文辉的驳斥是怎样的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就这样，刘文辉拼死对抗文革狂澜，毫不顾惜自己的命运会卷去何方。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中国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

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副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泽东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

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两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二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党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邓小平都深有感触而且极其正确地指出，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严重缺乏法治



刘文忠著作《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封面。

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刘文辉撰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是在 1966 年 9 月 28 日的深夜。

他已经深思熟虑了。犹如一个勇士孤身扑上敌人的枪口，他断然摊开了“十六条”公报，对着伏案奋笔疾书起来。弟弟则受命在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探。刘文辉一口气写了四个小时，写了近万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体太特别容易被人认出，所以考虑再三要弟弟帮忙重新抄写。刘文忠一连两天抄写到半夜，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他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是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的巨型炮弹！当

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内容，心跳加速，脑海中马上跳出“杀头”二字。但辉哥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对弟弟说：

“今天毛泽东疯了，共产党也疯了，这文化大革命正要逼疯全民。国家不能这样随独裁者为所欲为地摆布。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刘文辉还一再对弟弟说，“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刘文忠从小崇拜辉哥，对他一贯言听计从，但还是劝他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刘文辉回头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顺受，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弟弟：

“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二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他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闪，凛凛无畏。誓言无声。但弟弟好似听到他的心声，听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弟弟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答应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只有十九岁、腿有残疾的刘文忠，怀揣着哥哥已装进信封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悄悄地

离开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将十四封信沿着湖滨大道一路上的邮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选的，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学的组织。

事后，刘文忠离开单位冒充红卫兵北上大串联。近一个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当天深夜十一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他，突然被冲上楼来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个便衣用枪顶着他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颌首嘱咐弟弟：“不要怕！镇定点。”

二辆灰白色警车行驶半小时左右，进入一所大院。刘文忠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灯光贼亮，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548！看清楚了吗？墙上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文忠前面长方形审讯席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矮胖审讯员首先开腔……

从此开始长达七天六夜、接连十几场的密集审讯，那几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刘文忠不放，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刘文忠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师大、外语学院等大学里看大字报；还承认了文革开



刘文辉刑事判决书

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

短短四个月后，即 1967 年 3 月 9 日，刘文辉就被判处死刑，继后又被押在市监狱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 月 23 日，当天下午，在一场名为“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庆功大会之后，刘文辉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示众后被枪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杀害的人。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 年度沪中刑《一》字第 3 号）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

1957 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

1964 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 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专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

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黷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



刘文忠著作《风雨人生路》封面封底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美帝”……

十一

刘文辉被处决后，公安局通知家属去领遗物：一床被头、一双高帮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儿子一定会留下什么



1942年刘文辉（右一）与兄妹合影。当时他八岁，最小是刘文忠。

遗言，细心拆除被单，发现被角里藏着折迭得很小的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遗书！遗书用二张十六开练习簿纸写成，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共四页纸，最后的签名和诗词都是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父亲提心吊胆地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五儿刘文龙保存。不久刘文龙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他知道自己

私藏三哥血书，只要被人发觉势必遭殃，便偷着回家把遗书原件烧了。在烧之前，为了把遗书内容完整保存下来，他除了死记硬背，还把遗书一字一字分别拆开，用红笔作记号划在毛选“老三篇”内容中，再用电话号码程序编写全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整篇遗书后来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复原。

刘文辉在他写于 1967 年 3 月 20 日的遗书中说及他被害前一些细节：3 月 9 日四时许，刘文辉被关在一间私堂，与外人隔绝，一人递给他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这人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刘文辉的上诉书这时才刚写好。为此，刘文辉在遗书中说：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 50 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他们。

遗书提到他写的已被红卫兵抄去的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提到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写道，此传单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导线。他在传单和书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盗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

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揭条石落。

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刘文辉继续写道：他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他要求亲人不要难过，也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他，或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他的生平。他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

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刘文辉说，因他的死，在毛政权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损害，但他相信，毛政权倒台后，他作为烈士，必能恢复家人的光荣。

刘文辉还在遗书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泽东。他还说他写了七首诗词，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讽刺毛泽东和林彪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刘文辉说他临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集中针对毛的反动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刘文辉被害前这样宣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
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这是刘文辉在短暂人生旅途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当人们读到这篇临终者以鲜血写成的血书，不能肃然起敬！都会为他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为他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更为他英年早逝而惋惜！

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



刘文辉留下的手迹（写于1963年）

案资料，无法获知他被折磨被杀害的细节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由此也可以断定，刘文辉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敏感的，当局难以公布。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资料，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刊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

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政论，认为江青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发动武斗的祸首”；说批判刘少奇乃是“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认为文革“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指出林彪“有阴谋”，把毛泽东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1980年6月平反。

遇罗克，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在他于1966年2月寄给上海《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发表时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中，点名批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针对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他在1966年9月写出著名的《出身论》予以严词批判——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张坤豪，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19日被杀害，是年二十八岁。罪名是：反对批判刘少奇和其它老革命家。1969年7月6日被勒令检查交代时，却签名写下“我热爱刘少奇主席”，随即隔离审查，批斗毒打，群众专政八个月。其间写有九份“反动”材料。他认为，中国“被个人迷信充塞着”。1979年10月平反。

方运孚，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罪名是：

撰联讽刺文革派：“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攻击说“林彪、江青野心很大，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又为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1968年“一打三反”中，重庆公安局办案人员起初拟将被收捕的方运孚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进而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1980年平反。

毛应星，女，1969年1月23日被捕，1970年4月14日被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狱中书写“反动”笔记，说：“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就是老百姓，而毛主席的江山最后也被这些人所葬送。”“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又说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时，身材瘦小十分衰弱的她，却镇定自若，目光明亮，从容不迫。1980年11月29日平反。

陈卓然，1970年2月被捕，1970年4月28日被害，是年只二十岁。罪名是：1970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组成“反动标语”六十多条，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这就是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1980年平反。

丁祖晓，女，1969年7月5日深夜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罪名是：1969年3、4月间，寄信和发传单，反对“三忠于四无限”宗教式狂热。她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现在提倡的‘忠’，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这恰如封建社会里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她们呼吁民众“不

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此事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当地“特一号案件”。临刑前丁祖晓还慷慨陈词，批判个人崇拜、奴隶主义。

李启顺，女，1969年7月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是年二十四岁。罪名是：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为同学丁祖晓叫好，称她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猛烈抨击林彪、江青大搞现代迷信。她十七岁的妹妹李启才也自告奋勇，深夜到县城各主要街道去散发。传单还直接寄给“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为此，她们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全部被捕入狱。李启顺与丁祖晓同一天被枪毙，丁祖霞则被判刑二十年；李启才判刑十年。1980年8月，她们获得了平反。

忻元华，1967年1月25日被捕，1970年5月30日被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1967年1月，致信毛泽东，称：文革是“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惨祸”，“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恳求“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解决当前万分严重的局势”。随即以“恶攻罪”被捕。1979年12月平反。

陆兰秀，女，1967年5月开始失去人身自由，1970年3月18日被正式逮捕，同年7月4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枪杀。她在监禁期间写了14万多字的文章、学习心得和意见书，反对毛泽东，反对打倒刘少奇，从理论上全面批判文化大革命。1980年8月平反。

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分别于1970年3月、1970年8月、1969年1月被杀害。罪名是：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共十三名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将心得编为《学刊》油印小报。批判中共“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

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坠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还批判说，“现在的形势类似辛亥革命的形势，也有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企图利用文革篡权，此人就是林彪。”1978年8月平反。

官明华，女，1967年1月被捕，1971年3月12日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认为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野心家、阴谋家”和“披着羊皮的狼”，高呼：“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78年秋平反。

王笃良，1968年6月被捕，1971年8月6日被害。罪名是：认为“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者，是国家的栋梁，把他们打倒，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有人“光抓权力，不抓生产，结果使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失调”。在狱中又写道：“林彪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忠、忠、忠，他心里有鬼。”又针对刘少奇被诬陷一事说：“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被诬为“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1980年6月平反。

张志新，女，1969年9月24日被捕，1975年4月4日被处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一次次批斗会上责问：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她对林彪宣扬的“顶峰论”非常反感，认为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好。她又认为派性泛滥、武斗成灾是江青在搞名堂；江青不是“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她指明毛泽东是文革灾难的“总头子”。行刑前，张志新被惨无人道地割断喉管，以防喊“反动”口号。1979年3月平反。

史云峰，1974年12月24日被捕，1976年12月17日判死刑，

两日后枪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1974年10月26日，史云峰散发标语、传单，反对“四人帮”，为刘少奇等人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刘少奇一案是“千古奇冤”；提出：“全面审查文革中的错误”，“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给刘少奇等人“恢复名誉”。临刑前，史云峰嘴塞纱布用缝合线紧紧勒住，以防喊“反动”口号。1980年3月平反。

张锡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罪名是：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最后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至今未平反。张锡琨为之送命的1957年大字报如下：

-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王申酉，1968年1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及对文革不满被隔离审查，抄家，1977年4月27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证全都出自他的日记、读书笔记、读毛选眉批和给女友的书信里。早在1964年，他就开始批判思想独裁。他写道：“完

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此后，他不断批判“三面红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极左思想”；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1981年7月平反。

李九莲，女，1969年5月15日被捕，1977年12月24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最初因怀疑文革、怀疑林彪、为刘少奇鸣冤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台后，她虽获得释放，但还是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1974年3月，李九莲忍无可忍，在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等六份大字报，因此又于1974年4月19日深夜被秘密逮捕，并于1975年5月被判刑十五年。1976年12月，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后还当众念出，犯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死罪。李九莲被枪决后，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并惨遭侮辱，乳房和阴部被割了下来。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钟海源，女，1974年4月被捕，1978年4月30日被处决，是年三十岁。最初罪名是因声援李九莲，在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等传单，自己刻，自己印，自己散发。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李九莲被杀四个月，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昂首离去。行刑时枪击未死之前活剖取肾。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冯元春，女，1957年鸣放时，最早提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当年她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川大校园与足球场数十米大字

报栏上，尽是批她的檄文，省市报刊上也是连篇累牍的声讨，但她不退半步，从不检讨。冯元春被划为极右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三年，押简阳平泉农场劳改；因为拒不认罪服管，她再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南充省一监狱。1971年7月1日，也就是“从重从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中共五十“华诞”那一天，冯元春被杀害于南充。她先被游街示众侮辱，再押至市郊火花公社广场，暴民用钢钎与锄头戳她、挖她，已奄奄一息，再被一枪杀死。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内部文件，声称全省二十七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冯元春。

.....

十三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数，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其中，刘文辉也可以大书特书。

他，在已知的文革被害英烈中，是最早公开批驳《十六条》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在1966年，还没有一个人这么早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敢于把毛泽东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一针见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动性，预见它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

他，最早警告中国民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和全民大迫害运动”，并号召全国全党全军起来抵制文革。无论对文革的性质分析，还是反抗烈度，刘文辉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

他，1966年11月底被捕，1967年3月23日遇难，是文革政治犯中最早的被处决者，甚至比林昭烈士还早一年多。

他，即使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均获平反的时候，独独不获平反。后经亲属反复上诉，一直拖到1982年，才宣布无罪平反。最初法院驳回的“理据”是：“刘文辉是真正的反革命，不仅反文革，而且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这个“理据”是不值一驳的。一个真正的反文革英烈，必定反毛也必须反毛。因为文革乃毛一手发动，反文革不反毛，看不清识不破这一点，认识层次就不可能太高。刘文辉最早遇害最晚平反，可证明其“反”之深之烈。死刑判决书、遗书俱在，可证可鉴。

的确，从目前见到的材料看，无论从时间、性质、内容，或反抗程度上，刘文辉是中国全国第一个公开反文革反毛泽东的勇士之士，也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位文革研究者说，在大雾弥夜的文革初期，一个学历仅初二而只靠自学成才的青年，能够众醉独醒，公开反毛，血荐轩辕，且自成体系，令他拍案惊奇，钦佩之至！我熟识的上海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得知刘文辉事迹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惊疑：其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从何获得？虽然毛泽东的“反右阳谋”使他睁开迷眼，“反右幸尝智慧果”，开始反思各种时政，但从宏观上检视毛权威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对那一整代青年来说，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



刘文辉文革前最后一次照相。

刘文忠的这位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许多文革研究者都有此共识。

然而，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刘文辉至今尚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视野之外。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刘文辉”这个名字，但如果没有看到刘文忠给我的资料，便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这又是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一书中绝对不应该遗漏的人。对着他先知先觉、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我惭愧万分！

十四

在这篇称之为报告文学的拙文最后定稿之际，我将再次到中国重庆考察。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这次造访，与我于2004年9月的上次，竟已经相隔七年了。

我上次到重庆，也去了一个特殊的墓园凭吊。这是一个红卫兵墓园，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曾长久与世隔绝。



重庆红卫兵墓园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山城重庆“武斗”惨烈，规模为整个中国同期之最。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见于官

方记载的就有三十一处，其中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现代军械兵器进行的，计二十四次。武斗中死亡者的尸体当时就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二十四处地方，沙坪公园内的墓园是其中主要的一处，于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期间造墓立碑。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资料，墓园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四百零四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们只是当时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大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研究者根据碑文资料还考证出，墓园中的死者，工人约占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学生约百分之四十；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二十六岁以上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公墓座落于一片小树林里，西高东低，依山傍水，占地约三千平方米。正门右侧石墙外，红漆写着四个大字：“文革墓群”。有一条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通往深处，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布局杂乱。据知情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大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三十七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坟墓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有几个墓碑，高出了石墙。墓碑上当然刻有死者姓名、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等，但让人最为感触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为了突现死者的“英雄气概永不灭”，墓碑上都刻有当时流行的最红最革命而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如：“有为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当时坟墓都用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但如今大多风化，有的上面的文字都已剥落或模糊。虽

然近来有死者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墓地，但整个墓园，是一片凋零、幽深、凄凉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那天，我坐在墓地路旁一块石头上，良久不动，堕入深深的沉思中。当年参与者见证者的各种旧闻，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景象，一一在脑海中反复重现。现在写到这里，我且借引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足可重现当年重庆武斗的可怕景象的回忆：

……1967年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同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中，有些来不及带走的就丢下随着就腐烂在水田里……

8月5日，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八一五”派学生，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手持各种火枪武器冲锋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一时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八月的大热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还有其它什么什么派，当年都各自视为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名号啊！但如今，却连一点点的

价值都没有。也许，他们的死亡也有一点意义：他们也是文革的血祭者，是可悲可叹的另类血祭者；他们的死亡指向一种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荒诞：势不两立的派别，竟然是为了他们同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互相残忍地斗杀！上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场，只是在重庆一个地方。当年，在整个神州大地，在许多城镇，一旦武斗起来，其气氛极为恐怖：武斗者拿着武器横冲直撞，高低楼房碉堡工事林立，大街上战车呼啸而过，大桥、机关要地架着轻重机枪……红了眼、丧失了人性的杀人者互相对准的是同学、同事、工友、邻居，是同胞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有杀人者和被杀者都认定自己在捍卫无限神圣的所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因此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时中国全国人口八亿，几乎全部八亿之多的民众居然就这样被愚弄被牺牲！人世间最可悲也最不可理喻的事莫过如此！

十五

如今我要再次造访的重庆，更让世人惊奇的是，它又是已在神州大地广泛开展的“唱红”运动的发源地。

所谓“唱红”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唱“红歌”。我问刘文忠先生，今天中国各地最流行的是哪些“红歌”？他给我举了一些，包括：《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爱北京天安门》、《党啊，亲爱的妈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旗飘飘》、《延安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爱祖国的蓝天》、《中国，中

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所谓“红歌”，范围也可以放得很宽，但核心部分主要是一些近年来创作的“主旋律”，而大多数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文革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歌曲。刘先生说，当年他在监狱与劳改农场，大多是在集体政治训教和公判、加刑大会这些场合上被迫收听这些“红歌”，当然非常反感，但服刑者不能有丝毫不乐意言行，否则会严加惩罚……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东方红》，最红的“红歌”了，还曾经一度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当年，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办“人民公社”，盲目“大跃进”，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反“右派”，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个个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神州；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淫威之下，万马齐喑，国家命运濒临绝境……“红歌”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从国内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它所宣扬的文化都是“极左”，从吹捧、神化领袖到宣扬仇恨、斗争，不一而足。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这样一些“红歌”就是浸透着专制毒汁的“恶之花”。

现在，不是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么？！文革结束后，不是已经批判过个人崇拜了吗？不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大救星”吗？文革后在“拨乱反正”中这些问题不是都已解决了吗？把

毛从神坛上拉下来，当时不是已有共识、不是已深入人心了吗？看来，就像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的那样，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当时的“拨乱反正”实在太不彻底太有问题了。

三年前，中国大陆许多人最初听到重庆居然由党政军组织出面，大肆搞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觉得只不过是让人回味一下文革时“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之类的死灰，难以复燃，觉得像是一个笑料，大可一笑置之。而现在，曾几何时，大江南北竟然红潮滚涌，唱红歌、跳红舞、播红剧、贴大红标语、做巨幅党旗、万名党员宣誓……等等，争表忠心，煞有介事。闹剧要变成另一幕正剧吗？文革的幽灵重新又在神州大地徘徊吗？是时空错乱吗？

这些年，中国大陆在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面，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也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原来马列意识形态又已不灵的情况下，有人寄望于“唱红”办法，企盼这股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可以安抚大众情绪，在党内能结成联盟，得以最大程度地延续其权力。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唱红”运动能化解社会矛盾吗？它将会导致的恶果谁能承担？又如何承担？

……思绪驰骤间，我不禁联想到两年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凭吊。那里，即使是墓地，也是那样宁静、祥和、高雅。

我还想到，七年前我在重庆红卫兵墓园的凭吊。在那里，我和冤魂相会。他们悔恨交集，拖着屈辱厌倦的脚步，纷纭杂沓，在我面前无声滑过。今天，如果再度见面，他们脸上一定还带着惊讶不

解的表情——他们怎么能料想得到，墓地外面，如今“红歌会”的招牌到处悬挂，人们每天被组织聚合一起，高唱所谓红色歌曲。歌声飞越时空，甚至让阴间也不得安宁。而这些“红歌”的高歌者，是否会在某场梦魇之后，突然想起，有人是唱着“红歌”去赴死的，就是四十四年前墓地里的那些死者？！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甚至完全错误。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真让我非常困惑……

（2011年8月18日完稿于澳洲悉尼，曾为世界众多媒体刊登，如：议报、光传媒、独立中文笔会、新世纪、CND（华夏文摘）、澳洲观察、澳纽网、博讯、爱思想、共识网、万维网、文学城、中国报道周刊、倍可亲、禁闻网、中国数字时代、燕谈博客和明鏡歷史網；也收在《二闲堂》的“典藏文库”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

2016年6月6日后记

光阴荏苒，迎来了2016年，那场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竟已半个世纪了。这是一场反人性、反人类、摧残中华民族的大浩劫。任何一个华人，假如还自称炎黄子孙，假如还良知未泯，对此浩劫当殒齿难忘！如题目所示，本文抒发对文革死难者的追思，写于2011年8月，笔者第二次造访重庆前夕，也正是野心勃勃的西南封疆大吏薄熙来大搞“唱红打黑”、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基于对其的极度反感，文章结尾悲愤地喊出：“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真让我非常困惑……”非常不幸，今日，的的确确，荒诞正在一步步在这个国度重演，且越来越离谱。特发此文，以作“文革五十年祭”。

又：

当年拙文《沉沦神州的血祭者》曾在北京的《爱思想》网发表。该网站的前身是《燕南》网，《燕南》被迫关闭后，一度以“天益”之名重开；《天益》网又被关闭后，出现《爱思想》网。《爱思想》最初还力图坚守普世价值，但很快，在严峻的政治气氛笼罩下，这个网站变味了。现在，它虽然还保留我的专栏，但里面的文章都是多年前写的，刚刊登时文后读者的留言已全部删除了。幸亏在我的电脑中找到以下一些留言：

* 为真正的民族先烈作传，为国人的思想启蒙。

* 此文，历史真实+义理之辩=古今经学兼具之作。难得。
“血祭者”鲜血并不能惊醒同代及下一代。必能唤醒第三代。中国

历来是“先知先觉者”很少，权力血祭。“不知不觉者”占多数。而“后知后觉者”，说到底，每个苟活者，你、我、他都有或多或少责任的。

* 再次，向活跃于上海各大公园“聊天角”的刘文忠先生致意！致敬！如果再次搭进（抓捕）及“活埋”刘文忠先生，那么，将国际审判这个政权权要和典狱长的“反人类罪”！

* 太感谢了！何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这些血迹斑斑的血祭者的事迹，我们要铭记他们的英灵！

* 太震撼了！

* 谢谢何先生为这些无名的“血祭者”作传，深切悼念这些可贵的“血祭者”们！

.....

重读这些文字，我内心充满感激，也恍若隔世。

另外，当年《沉沦神州的血祭者》发表时，得到一些学者和文友的评论。例如退休居住在墨尔本的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汪应果先生读了我这篇拙文后，给我来信说：“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气壮山河。我在想，能否为此写个电影剧本……”他们的鼓励，我铭记在心。

十字架下的圣女

一



……那时，她多么意气风发！她简直心比天高啊。

这位原名彭令昭的苏州姑娘林昭，才华出众。早在1954年，她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北大，她成为校园内公认的才女。她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赏识，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后又担任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她

林昭遗像（摄于1958年） 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

可是，正当她要像鲜花般迎春开放之时，厄运之神降临了。那

是1957年，毛泽东施展他的“阳谋”，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在不断号召不断加温下，当天，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鸣放大字报，紧接着，各种大字报纷纷出炉，整个学校立时处在大鸣大放热潮之中。林昭她一个热烈拥抱社会主义事业和理想的充满活力的青年，自然积极地投身进去了。她天真地以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出现了她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关于“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斗得不可开交。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仗义支持被批判的同学张元勋。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中传来，问她是谁，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林昭大义凛然。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那天深夜，她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结果，果然是个悲壮的祭坛！林昭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刚烈的她像牛虻一样无法接受这个猝然打击，她疯狂地吞服大量安眠药，以自杀对抗。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

不低头认罪！”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作为唯一一个拒绝检讨的北大右派学生，她最后落得在系资料室“劳教”（“劳动教养”）三年。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

她因心情郁悒，咯血病重。到1960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

林昭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上海也常去图书馆、公园走走，结识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等人。他们怀着赤子之心编辑一本名为《星火》的油印刊物，陈述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



林昭和她的北大同学

在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他们甚至将一起议论的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1960年10月，林昭等人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了。林昭父亲对女儿的冤情痛苦万分，于她被捕后不到一月便仰药自杀身亡。

1962年，林昭被准许保外就医。家人相见时问她为什么坐牢时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斑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切口疤痕。母亲

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原来，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在狱中，林昭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呼喊口号、蔑视法庭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为此，她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曾被反铐达一百八十天，并经常组织女犯人对她毒打，进行凶狠残忍的斗争，她满身伤痕，长发被一绺绺地拔掉。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

在保外期的1962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在信中她自称是右派群体的一份子，对反右斗争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并谴责政府镇压反革命。她说“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

1962年9月，林昭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是月，在上海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文件带到海外发表。

无疑地，林昭是步步走向“深渊”。

二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

林昭一如既往，在狱中拚死抗争。她多次绝食，自杀，申诉，写血书，不屈不挠，异常刚烈，异常悲壮。以下是其中一些记录：

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

并表达政治见解。

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狱卒施暴。她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1965年2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此信附有一封要求外转的呼吁书，希望引起国际力量

对自己的事业和案情的关注。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
信（之三）首页复印件。

1965年3月6日，林昭向狱方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直到5月31日，绝食共80天，此间她天天写血书。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血书《告人类》。

1965年3月至5月，足足一个半月，林昭没有张口说话。

1965年5月31日，再次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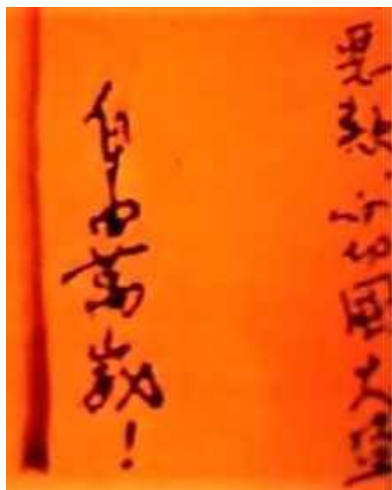
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份《判决后的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做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对所谓“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特别凝然驳斥，批注道：“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

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1965年7月至12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戏称为“楼梯上打架”



的理论)和极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十万字。

林昭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十四万字的血书。现在，人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林昭衣衫破旧，长发披肩，一半已是白发，头上顶着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一个手掌大的“冤”字！林昭对张元勋说：“我随时都会被杀，

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

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见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当天林昭惨遭处决。

林昭那天是从医院被抓走的。当天上午几个武装人员直冲入病房，把正在治病的林昭从病床上强行拉起，并叫道：“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



林昭死刑判决书

从容不迫地要求换件衣服，也被拒绝，随即被老鹰抓小鸡似地架走。公审大会上，林昭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林昭的脸发红发青，眼中燃烧着怒火。（见彭令范，《我的姊姊林昭》，收《走近林昭》）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林昭这样被处决了：

……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

林昭是年还不满三十七岁。

1968年4月30日下午，一个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的楼房



2000年，亲友找到林昭的青丝和骨灰。

下面。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他拿了钱后一言不答，扬长而去。

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下昏厥过去……此后，她逐渐神经失常。年逾七旬的她，在上海长街上，在茫茫人海中，到处游荡，嘴里喃喃着，仍在呼唤寻觅女儿。半年之后，她被人发现死在街头，有说是自杀，有说被“红卫兵”打伤致死。

三

林昭思想卓犖，才气横溢，性格刚烈，拼死写了数不清的文稿，包括入狱前的书信和写作，特别是在狱中墨写和血写（不少是用鲜血和发卡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林昭在狱中如此以自己的鲜血书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至今她绝大部分文稿尚未见天日。有关她的专项的材料当局封存了整整一房间。她的档案包括她的作品至少有四大箱，据说要封存五十年。

但林昭是无法抹杀的。林昭思想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林昭精神不会灰飞烟灭。正如她一首血诗所说：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林昭针对毛泽东那首七律《占领南京》，在狱中写下《血诗题衣中》，充满大勇无畏而且深刻独到的批判意识：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林昭在监狱里投给《人民日报》的血书中，居然能够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她对极权统治作出了感天动地的凄烈的控诉：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的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林昭早就有言：“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林昭就曾对“五一九运动”的骨干之一的谭天荣说：

“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像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桂冠的分量。无论如何，这一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

‘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回忆林昭》，收在《走近林昭》）。

林昭在写于1960年的长达三百七十行的诗篇《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发出这样的呼唤：

……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

这些激情滚烫、义正词严的诗文，像一把卓然艳丽的自由之火，闪烁着神性的光辉，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四

林昭身上极其珍贵地充满着批判、控诉、呼唤,但还远不止这些。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面对血写的文字》一文里,曾经指出:如果说“五一九”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民主”和“法制”,林昭则在坚持“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权”和“自由”的概念。这一点,钱教授强调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自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钱教授后来在他的《“殉道者”林昭》一文中进一步补充说,在1964年、1965年,毛泽东正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试图将他的阶级斗争的治国逻辑和路线推行到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极端,来解决中国党内与社会的矛盾;林昭对“人权”与“自由”的呼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早在此之前的1962年,林昭和她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战友,就已经竟然能够提出了另一种与毛泽东完全相反的治国路线与目标。在他们的纲领上,赫然列出“八项政治主张”,即“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三,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七,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引自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收入《走近林昭》。)

令人格外悲愤和痛惜的是,惨遭极刑的林昭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基督徒与和平主义者,信仰的力量使她始终保持着人性的高贵和不屈的意志。即使在惨受非人迫害的血雨腥风中,她还在思考着:

“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要

诉诸流血？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然则深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期望去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有时可以甚至还必须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这些话语，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啊！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事实上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她的精神历程，昭示了中国自由精神的复兴。

钱理群教授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气质的学姊林昭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这位“中国的圣女”，唱出了一首最悲壮、最坚韧、最决绝、最动人的“天鹅之歌”。

一位无名氏，写了一首《十字架下的圣女》（《文革九歌》之七），以祭林昭：

是自由的化身

是不化的贞烈

是红楼碧血诗魂

是太湖剑胆孤月

苦难雕刻的灵魂

灵魂站立的圣洁

让时代苍白地拒绝
让人性巍峨地选择

哦，你就是你
一袭白衣的殉道者
一尊无需基座也
不屑以浮云和桂冠
来烘托凄美、博爱和执着的
圣女

在中国的十字架下
无声呼唤着“人”的世界

五

1980年8月22日，林昭被杀十二年后，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为林昭平反，但竟以林昭为“精神病人”为由承认是一次“冤杀”而已。林昭的校友和老师于同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礼堂为她举行了平反追悼会。灵堂中有一幅挽联，没有字，只见上联一个怵目惊心的大问号“？”；下联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号“！”。

这种留个尾巴的不彻底的“平反”



林昭墓碑正面

人们显然无法接受。当时，人们对文革滥杀无辜深恶痛绝，可谓群情奋勇，又正值拨乱反正时代批判四人帮的政治需要，在多种原因形成的合力下，1981年1月25日，林昭第二次得到平反。上海高院再次复审，撤销1980年以精神病为由的裁定，同时撤销文革和文革前对于她的判决，宣告林昭无罪。

又过了二十三年，2004年4月22日，一座小小的林昭坟墓在苏州灵岩山立了起来。墓中只有林昭的一缕发丝、一些骨灰、一套旧衣和一张照片。林昭的墓碑正面镌刻着：

一九三二·十二·十六—一九六八·四·二十九

林昭之墓

苏南新专、北京大学部分老师同学、妹彭令范敬立

背面以红字书：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以殉中华

林昭一九六四年二月



林昭墓碑背面

在林昭坟墓敬立后两天，2004年4月24日，《寻找林昭的灵魂》首集首次播出。当时，这部由胡杰先生历时四年采录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在中国以非公开放映方式在一些关注者之间传看；历史见证人对林昭的回忆、学者专家对有关林昭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进行……

但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历史竟然又一

次回流！

不多久，《寻找林昭的灵魂》成了禁片，严禁流传播放；林昭坟墓成了禁地，严防人们前往拜祭；林昭的名字也成了敏感词，不准公开出现；任何有关林昭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更属违法之列。这种倒行逆施，使人愕然。就像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独立中文笔会第七届林昭纪念奖获奖人艾晓明博士在她于2013年4月4日发表的文章《“死者青春长在”——癸巳年悼林昭》中所道：

读到林昭狱中遗稿，我不禁怀疑，林昭案倘若放在今天，还能平反？所有那些针对极权独裁、特务统治和密谋政治的揭露，恐怕只能作为犯罪铁证吧。君不见，至今苏州灵岩林昭墓上，依然有摄像头将每一位前来吊唁者的身姿记录在案。由此我不禁要问，当年林昭案能够经历两次平反，最后连因“精神病”的尾巴也不保留，林昭被确认为无罪错杀——这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拨乱反正，还是一次不小心的“政治错误”？

我想到当年林昭的校友和老师她举行了平反追悼会时灵堂上的那幅挽联，想到上联那个怵目惊心的大问号“？”；想到下联那个震撼灵魂的惊叹号“！”。这位北大才女，在1957年“阳谋”期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成了右派，她在狱中多次绝食，自杀，申诉，写血书，宁死不屈，在文革席卷神州最为黑暗的日子，最后惨遭处决。她是中国圣女，异常刚烈，异常悲壮，唱出了最动人的“天鹅之歌”，成为了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象征。然而，今天，五十五年过去，林昭们更被打入深渊。今上继承毛泽东衣钵，搞个人崇拜，更以“数字极权主义”进行高压统治，打压异见不择手段，中华民族又到了危险的时代。

难道林昭那一代人的鲜血，竟是白流的吗？

浑身伤痕、曾经也是右派的诗人白桦，在他晚年的时候，以整整十年时间毅然完成了二百六十五行长诗：《从秋瑾到林昭》。他的长诗最后喊出：

把黑色的白还原为黑！

把白色的黑还原为白！

还中国以真实！！

还林昭以美丽！！



“白霓贯日，彗星袭月。”忠骸何在？浩气长存！”严正学、朱春柳伫俚为林昭、张志新创作的英烈双雕。

白桦这样形容林昭这些先烈：

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提醒我们记住她们美丽的面庞！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在二十世纪的史册上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的来路和归途！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的潇洒身影！她们用鲜血

的醒目色彩让我们预见她们必将复活的日子！

一切都非常悲壮，但是人们不屈不饶地期盼着——相信这一天一定到来。是的，“复活必然成为一个庄严的节日，／欢歌一如生命，无所不在。”

（本文初稿写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2023年4月22日修改。）

修改稿后记

林昭是北大才女。1957年“阳谋”期间，她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被打成右派。她后来在狱中多次绝食，自杀，申诉，写血书，拼死抗争，不屈不挠，异常刚烈，异常悲壮。1968年4月29日，在文革席卷神州最为黑暗的日子，林昭惨遭处决，是年不满三十七岁。今天，五十五年过去，现在习近平继承毛泽东衣钵，搞个人崇拜，更以“数字极权主义”进行高压统治，其内外政策造成了巨大的恶果。难道林昭那一代人的鲜血，竟是白流的吗？这一切不得不令人万分悲痛并在悲痛中深深思考！

她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



张志新遗像

—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这首诗是韩瀚所写，题为《重量》。

当年还有另一首同样著名的诗，题为《哭》，流沙河撰写：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
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当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些日子，哪些诗最直截了当让中国大陆民众整个心灵受到震撼，最能使人悲愤、自责、反思、醒悟？我想，这两首短诗必列其中。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是何等的震撼力！短短几行诗，传达给人们的是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形象和信念。正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确，每个读到此诗的人，如论者所言，热血者当无不为之动容，而苟活者则必然无地自容。而流沙河的“哭”，可谓



切肤之痛的真情实感。假如没有亲身经历那场大劫难，没有感受过那种排山倒海般而又无处不在的红色恐怖，没有遭受过心灵或肉体的残酷迫害，便写不出这样的诗，也无法深刻理解这样的诗。真是字字皆是泪句句皆是血啊！“不装哑就必需学会说谎”，这不就是那些年中，在专制暴政下，整个民族的写

张志新曾经是一个快乐的母亲。照吗？！“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诗人痛心疾首，激励自己，亦是向整个民族发出的诚挚而又凄厉的呼唤！

这两首诗是献给张志新烈士的。张志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二

张志新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她究竟犯了什么滔天死罪？以下是知情人的揭发、记者有关调查和档案纪录。

1968年前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的年月，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张志新，辽宁省委机关一个普通干部，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讲话资料，顺口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不久，在干校里，张志新被揪出来。

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的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



曾关押张志新的沈阳公安局重犯看押所旧址(赵玉民摄)

张志新第一次被判是1970年5月14日。辽宁省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曾经关押张志新的地下牢房(赵玉民摄)

本来，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刑就行了。可就是因为她不认罪，便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

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地下牢房门送饭小铁窗（赵玉民摄）

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不搞破坏。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但高振忠虽然对张志新案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张志新戴过的手铐和脚镣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某某。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十五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抛在监外的牢房椅子（赵玉民摄）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即“恶攻”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审批会上，

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关押张志新的地下牢房门（赵玉民摄）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林”指林彪，“孔”指孔子，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江青一伙便发起一个声势巨大的运动，并发展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企图把周恩来也打倒）。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

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毛远新、魏秉奎、苏羽等十七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听完《报告》后，这些大人物有如下一段对话：

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

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

魏秉奎说：“干脆吧。”

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苏羽、魏秉奎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内中只有六十多个字：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

3月19日，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就这样“干脆”地被“杀了算了”。

三

从当时的监狱档案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张志新的确“恶攻”毛泽东。她说：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关于“文革”，张志新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

张志新在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她还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张志新表示这些意见和看法，正是“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张志新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屈服，在监狱里甚至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她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她这些言论体现出的坚定政治信念可谓惊人！

张志新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69年在一次批斗会上，她就公开声明：

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

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因为涉及最高神物毛泽东，张志新两次被判死刑，平反也经历两次曲折。



主持为张志新平反的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因此，开始时张志新案不予彻底平反。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对张案复审的汇报。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任仲夷（任后来任职广东，2005年11月15日逝世，

享年九十一岁。他被认为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的改革年代中，

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他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张志新平反昭雪之后，施加在她身上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点一点地被揭发出来。

她因为至死不认错，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事实上，在六年铁牢生活，张志新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种种摧残迫害。监狱当局甚至鼓励刑事囚徒频繁地肆意强奸、轮奸她。张志新最后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她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

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致这张照片后来不能示人。

张志新被杀害后，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运走，作病理解剖实用，又说被剖腹挖心，取了内脏后才火化，也有说是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张志新遗体下落至今成谜，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最令人发指的是：张志新上刑场前，公安恐防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剧疼难忍，凄厉呼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极其恐怖凄惨，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这个最血淋淋的罪行，是辽宁公安局的“创举”，毛远新等当权人物赞同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已经执行了三十多例）。



张志新在行刑前两个小时被割喉的地方（右一为赵玉民）

这里，还有一个万分可悲可恨的插曲。张志新受害时，当局要她的孩子林林、彤彤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后来在张志新的案

卷中找到一份签字并按手印的所谓“笔录”，摘抄如下：

……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

那一年，彤彤不满十岁，而林林也未满十八岁。当局竟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四

张志新平反后，一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长篇通讯于1979年6月5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写报道的记者陈禹山回忆说，报社领导们对张志新上刑场前被惨无人道割断喉管的罪行是否见诸文字不敢作主，报到中宣部审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虽然非常开明，但也希望把割喉管的细节删掉。最后见报的文字是：“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篇通讯发表的当天就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

方一听到实情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



“谁之罪？”：张志新母亲和三个妹妹摄于纪念展厅。

割喉管人是无罪的，
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
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张志新案件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突然停止。人们相信，这无疑与这个全民“天问”有关。当然，这又是一例“奉命行事”。

1979年8月12日，另一位著名诗人公刘，特地来到沈阳市郊外那个“大洼”刑场，来这里凭吊烈士张志新。诗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刑场》，悲愤地喊出：“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象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五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情形又怎样呢？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现在的中共国，居然又出现一个恐怖的新毛时代。这真可用“可——
怕”两字来形容！

当年，还有一位著名诗人雷抒雁以长诗《小草在歌唱》歌颂张
志新。他在诗中写道：“我敢说：/ 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 红日，
/ 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 我敢说，/ 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 地球，
/ 也会失去分量！”雷抒雁写诗那晚，正气凛然，精神抖擞，信心
十足，俨然看到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可惜，几十年后的今天，如

果正义得不到伸张，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你又能怎样？！

当年，张志新也信心满满地展示她对未来中国的愿景：“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但是，非常不幸，她几十年后的同胞，在定于一尊的恐怖皇权高压下，在“数字极权主义”的笼罩下，思想更难自由，“妄议”之罪随时降落头上。以目前来看，张志新真诚的盼望完全落空了。

在今天的中共国，荒谬、扭曲、欺骗无处不在。其中一个荒谬与欺骗竟然就发生在张志新名下！2019年，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前夕，当局举行了“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居然如此厚颜无耻，把张志新列入表彰名单中。张志新因坚持反文革、反毛泽东、反个人崇拜的理念而被迫害致疯，最终被残暴枪决，而今天实行专制高压统治、大搞个人崇拜的习近平，正是继承毛泽东衣钵、把毛的罪恶事业发扬光大者。他不许评价中共的历史错误，特别是文革错误，宣称不能以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在他领导下，中共有关当局还居然要把带来中华民族空前大灾难的文革美化为“十年艰辛探索”。就说张志新案，当年一时间曾经震惊全国上下，但对此案的深刻反省却嘎然而止，一直至今被中共死死捂住。如果张志新真的是中共承认的“最美奋斗者”，习总书记底胆敢让他们党员学习张志新吗？很难想象，如果现在有党员敢以张志新勇气的百分之一，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能被看成是忠于党的表现？能被认为是一个普通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中共当局敢开放人们对文革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一伙所犯下的罪错进行追查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这真是莫大的荒谬与欺骗，这也是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新的罪

行。这种虚假糊弄，真更为“可一怕”！

毋庸讳言，张志新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四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颇有名气。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基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在毛泽东暴政的种种压力下，几乎全部的职业“思想家”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这个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现在，几十年过去，情况竟然没有改变！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不！终有一天，中国人民会对个人崇拜，对独裁专制，群起而攻之。张志新是在黑暗中勇敢反抗专制暴政的女英烈，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曾经告诉人们，个人崇拜是多么荒谬扭曲，多么疯狂失智。她的牺牲，给人们传达了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信念。终有一天，人们一定能够真正纪念张志新这位先烈，继承她的遗志。

其实，今天神州大地，也并非无声。地下之火在运行，许多人都已觉醒。他们深深怀念暴政下的死难者、受害者、反抗者，包括张志新这位英烈。

现在，暂且择录一篇多年前就出现的“祭园守园人”所撰写的《张志新网墓志铭》，以表达对张志新的无限敬仰之情：

沈阳的空冢中除了您的丝巾、发夹，有否一段琴弦？早春的音符，是否正在料峭的松花江中解冻？今夜，林林和彤彤又辗转在怎样的历史悲音中？明天，辽淼的白山黑水五岳湖海之间，会有键弦之鸣、心弦之颤，协奏起您最喜欢听、最喜欢拉的包隆贝斯基的《叙事曲》中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吗？



张志新生前最喜欢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

三十二年——整整三十二年了啊！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最撼天动地的那一节！

面对静雅柔弱的您，面对着七年来在此面对过您的 278000 颗心，面对只有用心、只有在虚拟中才能点燃的洁白的思念、殷红的祈祝和摇曳着蓝色旋律的烛光，最是我知道：

每一次点击，
都是心的触摸，
——触摸您悲怆的音符。

每一份祭奠
都在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
——擦亮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的最强音！

是的，法西斯割断了您的喉，怎能割断您的琴声？！

鸣心铮骨，激越高亢，四弦裂帛，撼遏行云：这是民族低谷期思想的最强音，这是所有浩劫中喑哑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之凸现道义缺失灵魂苍白的正气之歌！

正是您的胆见悲歌，正是您思想和生命的震颤，摇撼也见证着一个盲从时代麻木民族的渐次苏醒，又让一段历史伴随一种舒缓、一种温馨、一种期待，在千百万走出梦魇的心灵中凝结成永恒的记忆，也由此凝入历史的永恒——不是正史，却因此更属于历史的永恒！

白花与烛光，祭酒与献歌，心语与祈祝：这些，都是也仅仅只是记住的证明。而几乎所有的祭奠者都深深知道：触摸您悲怆的音符的不是这些——是一颗颗心；而比触摸更能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的——

是心灵，从您悲怆的音符的千百万次出发——向体制文明挺进！

是千百万心弦的铮鸣与协奏，和着您爱的旋律！

（初稿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现稿有所增修。）

后记

4月4日是一个应该纪念的日子。几乎半个世纪前，1975年的这天，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行刑前张志新被非常残忍地割断喉管，她凄厉呼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极其恐怖凄惨。

张志新的死罪是六个“恶毒攻击”。她生前的确“恶攻”毛泽东。在“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屈服，在监狱里甚至喊出“打倒毛泽东”的

口号。她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是在黑暗中勇敢反抗专制暴政的女英烈。

张志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个人崇拜是多么荒谬扭曲，多么疯狂失智。当年，她也信心满满地展示她对未来中国的愿景：“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但是，非常不幸，她几十年后的同胞，在定于一尊的恐怖皇权高压下，思想更难自由，“妄议”之罪随时降落头上。以目前来看，张志新真诚的盼望落空了。但是，张志新的牺牲，给人们传达了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信念，终有一天，中国人民会对个人崇拜，对独裁专制，群起而攻之；终有一天，在神州大地，人们一定能够真正纪念张志新这位先烈，继承她的遗志。

那颗曾经划破夜幕的陨星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一篇长达两万字的重磅文章出现在中国民众眼前：《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该文以这样诗情澎湃的议论来展开震撼心灵的叙述：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流水行云，真是弹指一挥间！1980年，至今竟已过了几乎半



遇罗克遗照

个世纪！中国社会竟也变了又变……但此刻，且让我们的心思，只集中在遇罗克一个人身上。1979年，《划破夜幕的陨星》发表一年之前，遇罗克案件刚透露出来，尚未正式平反，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很多人都在读他的文章，传抄他的日记和诗作，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当时，面对被惨遭杀害的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全国亿万民众曾经何等悲愤！曾经何等痛惜！曾经何等深思！如今呢？据说时代不同了，遇罗克这种人物已成为历史，并大可以在历史中湮灭……

遇罗克，你难道就这样命中注定，就这样无可奈何，只不过是——一颗过早陨落、只不过一闪即灭的流星吗？！

遇罗克遇难，年纪轻轻只有二十七岁，是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让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暂且回到那些灾难深重黑暗无边的年月吧。

一，在文革初期“血统论”气焰极其嚣张之时，遇罗克挺身而出，发表《出身论》给以严正驳斥

1966年，在所谓“红八月”中，北京市最早掀起一场惨无人道的“红色恐怖”的狂风恶浪，几个星期之内，单单在这么一个城市，根据不完全统计，就有超过三万三千户被抄家，超过一千七百

人被活活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而死。这就是那帮最早“造反”的“老”红卫兵的“得意杰作”！他们后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以便他们的恶行更为组织化。

而这“英雄业绩”得以成就的指导思想就是他们视为通灵宝玉的“血统论”。

当时有一个“红对联”事件。那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基于封建“血统论”——即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红对联”一出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对联”辩论双方代表时说，对联“不全面”，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这条新改对联。听了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那些貌似公允实质却是煽动阶级对立阶级仇恨阶级斗争的讲话，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观念的学生更自以为在理。更多血统论对联纷纷出笼，例如：“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这些“自来红”们，迅速以出身为标准，自为“红五类”——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者，并把其它人视为“黑五类”——即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

子、右派者（后来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黑九类”）。在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及其附属中学以及其它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8月12日，“红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建议，提出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要写进中共党章和法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以后，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红对联”。谭的讲话被翻印了数百万份，几乎传遍全国，流毒深广，成为流行的“行话”。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于是北京掀起“红色恐怖”，而且很快“红色恐怖”就在全国风行。淫威之下，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竟然成为全国民众都得遵守的惯例：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在“血统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

就在“血统论”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极其震撼地突然出现了数百份题为《出身论》、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文章。当时才二十三岁的遇罗克就是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的作者。

“血统论”一向是门阀权贵维护特权的有力工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面向苍天的呐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志士仁人。现在，一位叫“遇罗克”的，响应了。这位年青的平民思想家在文革前就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文章批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成为全国敢这样做的寥寥无几中的一个。现在，他又挺身而出了。他断然指出：“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描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状况，那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几乎成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因素。“出身压死人”——一个人如果出身或成分有“问题”，便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迫害的阴影之下，遇罗克尖锐地质问：“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1967年1月18日，打着“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旗号（希望这能对打砸抢的“联动”分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引人注目发表了遇罗克这篇《出身论》。在以后几期的《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还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继续作出一针见血的系统的批判。由于他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反对派无可奈何，只能有气无力地诡辩和谩骂。因发表惊世骇俗的《出身论》而“一炮打响”的《中学文革报》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排起长队购买这份小报，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十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当时，这张小报二分钱一份，但在黑市上卖到两三元，或者要用好多份其它小报才能换到。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以应对读者的来访。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伙伴们深受鼓舞，他们真诚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并且支持他们。

二，“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就义

可是，等待他们的是厄运。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在文革高潮恶浪翻天的那些年月，中央文革小组一句话或一个眼色，都会使一个人的命运立时突变。这样，《出身论》立时便被置于死地。面对随时会来的危险，遇罗克毫无惧色。他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他照常写作、生活，相信人们终究会对《出身论》作出公正的评价。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他大声地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回答很干脆：“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狱中，遇罗克受尽了那个时代所司空见惯的摧残和虐待。有时他每天都押到各处受批判，每次带出去就像扔木头一样扔上汽车，被士兵踩在脚下，用刺刀扎住后背，脖子上还要戴一个钢制器械，如果在现场喊叫，只消在后面一勒，即可休克。批斗时一名警察踩住脚镣，两名警察把住胳膊，惟恐挣扎。脚镣粗糙不平，铁圈上的毛刺把脚脖子刮得鲜血淋淋。遇罗克回到牢房偷偷用布缠上，而每次看守见到就要扯下！

遇罗克一直坚强不屈。曾经与他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一文中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

通过这种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和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

“文革”研究者发现，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遇罗克在自己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清醒的人道理性。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

张郎郎在他的文章中记下遇罗克说出心里的想法：

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遇罗克付出代价的时刻到了。那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之前，遇罗克曾经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但等到母亲好不容易

易把新背心送到监狱给他时，他已知道自己要被判处死刑了。他想，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穿吧。那天，他就是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为了安慰母亲，鼓励弟弟、妹妹和朋友，遇罗克在被害前留下了最后两首诗。

一首七绝《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还有一首五律：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再回溯到六年前，1964年初，遇罗克曾作过两首诗词。题为《游仙·咏香山鬼见愁》的一首云：

巨石抖，欲把乾坤搂，千古奇峰人共有，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山下渺渺茫茫，来路崎岖征路长，那堪回首眺望。

另一首为《无题》：

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这是他那时的心境和抱负。他准确地预测出“来路崎岖”而且“路亦迢迢夜亦长”；但这是一条“征路”，他“欲把乾坤搂”。而现在，一切都作了一个了结——他已经走完他的路了，是怀着“乾坤特重我头轻”的崇高信念走完的。

三，关于遇罗克被处决原因的一些说法

有一份《北京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关于遇罗克部分原文如下：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出身论》，但一篇文章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难以重判，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

《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引人注目，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网罗拼凑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

遇罗克平反后，他的家人发文，认为他是因第六期《中学文革报》而死。遇罗克在上面发表《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

许多年以后，当年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完全撇开自己在此事上的罪责。他在2016年4月出版的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说，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遇罗克的观点，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根据还是毛泽东这句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戚本禹当时就是根据毛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但他坚决咬定：“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

当年也是遇罗克《出身论》的反对者、后来写出“新时期文学”经典《晚霞消失的时候》的礼平也认为，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还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而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疑问。他说，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深刻得多。礼平回忆，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他也感到很不解；1970年遇罗克被枪毙时，他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他才感到遇罗克被杀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礼平认为，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反对血统论这个选题。他说：“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

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当年创办《中学文革报》并任其主编的牟志京，当年曾经是“血统论”的坚决反对者，刊登遇罗克的惊世之作《出身论》以及其后一连几篇有关文章。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内部消息”，说遇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后来，著名时政评论家、现《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他在《华夏文摘》增刊第352期（2003年9月2日出版）的长文《解读晚年周恩来》中点出：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胡平认为这很有可能。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胡平认为，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像”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

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也有一个说法：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那些“联动”分子曾经大为欢欣鼓舞。他们相信这个枪毙的最后决定是谢富治上报中央得到毛泽东亲自批准，所以感动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

的确，遇罗克事件被披露后，关于他被处决，报刊最早是笼统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一语带过，此后一直语焉不详，让人感觉好像处决命令就是“四人帮”或同党下达的。据说在北京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一共二十四卷，但直到现在没有公开……

四，“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遇罗克永垂不朽



遇罗克摄于家中房间

这位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写出《出身论》的人就这样离开了世界。“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遇罗克无法见容于这个社会，当然还不单单是因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

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

同时又是在毛泽东的绝对神权威慑着几亿中国生灵之时，中国人发出的第一篇革命檄文。遇罗克不同凡响之处是看到了“血统论”背后的“阶级论”。毛泽东的所谓“阶级路线”，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是团结队伍、夺取政权的有力保证；在掌握了政权的和平年代里，



遇罗克（右二）和家人
（摄于1963年春节）

就成了统治集团用来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后代去“名正言顺”地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资源的“封建”手段了。在《出身论》中，遇罗克以种种论据一层层剥开“血统论”的反动和荒谬的实质。当然，如论者所说，在当时政治环境里，他只能把话说到“不好”的出身并不比“好”的出身更能使人变坏，却不能说这种出身带来的压迫和侮辱反而使人更可能作为叛逆。他甚至还必须用毛泽东本人的论点去批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造成的“血统论”。据张郎郎回忆，当时遇罗克也承认他那篇文章并不是理论上特别完美的，他说他出去还要继续研究他这些理论。但是遇罗克实际上却又比单单批判毛泽东走得更远。他严正地宣布：“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出身论》的结尾处，他发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他写道：“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由谁来解放呢？遇罗克明确指出：被压迫者必须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的恩赐，而革命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

人们觉得，中国的遇罗克，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就是一个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1963年8月28日，三十四岁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林肯纪念堂前，面对二十五万

听众，发表了一个震撼美国、震撼世界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说：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

人人生而平等。”



澳华画家王旭作品：

《文革三烈士》。

马丁·路德·金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他一贯主张非暴力主义，但仍多次被捕入狱。

1964年，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1968年3月，他组织“贫民进军”；

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斐斯市领导罢工时，遭白人种族主义分

子枪击而逝世。金的遇刺触发了美国

黑人抗暴斗争的巨大风暴，在全美及全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从

1986年起，美国政府法定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全国纪念日”。

美国人，包括全体白人，至今都以拥有为人权而奋斗、牺牲的马丁·路德·金为光荣为骄傲，年年纪念他，把他的梦想愿景，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融化到美国社会理念中。马丁·路德·金这篇题为

《我有一个梦》的演说，更成为惊天地泣鬼神、气贯长虹的千古美文，响彻寰宇，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当然也不能忘记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遇罗克！

当年也为“老红卫兵”一员的张承志（“红卫兵”是他起的名字，最早用作他及同伙写大字报的笔名），在他的《高贵的精神》一文中万分感慨地说：

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同样，对遇罗克的忏悔，也决非干净的回想录，而是接续他与特

权主义的对峙。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环而已）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当年，还是非常青年的诗人北岛，目睹了那场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高呼“打倒”声中的最后审判，以极其悲愤的心情，罕见地写了两首诗献给遇罗克。

那首题为《结局或开始》的诗中写道：

.....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在《宣告》一诗中，北岛替遇罗克，向世界严正地宣告：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2006年5月)

后记

本文为笔者长文《他们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当时写下：

“四十年前，毛泽东及其同伙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大浩劫中，两千万无辜的生命被夺走，一亿人遭受政治迫害，整个国家的经济损失高达八千亿人民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连人类公认的准则、

道德、文明、人性，也被摧毁被扭曲了——这又是无法计算的、长远的、深层的对中华民族的创伤。这十年所发生的种种，还历历在目，如同昨夜的恶梦一般，无不在一个个如我一样的文革经历者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颤栗与伤痛。

此时此刻，我特别敬祭那些在文革中（也有在文革之后）惨



遇罗克雕像。塑像正面镌刻他说的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而塑像底座上镌刻北岛1980的诗句，引自《宣告——献给遇罗克》：“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塑像于2009年落成，作者为雕塑家郑敏。

遭杀害的思想者。有名的，无名的，他们不可计数，此文只能参考各种资料，略微描述几位。他们珍贵的思想犹如沉沉黑夜里一星半点火种，来不及发光发亮，却被凶恶的政治势力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扑灭了。他们以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见证了文革的罪恶，专制制度的罪恶……”

今天，面对当下习近平种种倒行逆施，人们纪念遇罗克这位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杰出的思想者之时，更感到万分悲痛。

又：

本文当初在中国一些网站转载的时候，曾有许多留言，现在都已找不到了，甚至文章都被删了。以下是在我电脑上发现的一些留言：

* 不要以为遇所批判的现在没有了，也不比把一切都算在林彪，江青头上。文革的共产党和当今的是同一个。《血统论》绝非从文革开始，文革无非给《血统论》一个绝好的用场。

* 遇的理论，其根本无非是天生人权，十四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就已经开始鼓吹了。连美国都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开始取消种族歧视，那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有走。

* 生命无贵贱，被虐杀的都是悲剧。

* 很难得，可惜没看到毛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恐怖。其实遇还是没有达到储安平的高度，储在40年代就总结出的：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无的问题。当然，回头看总是容易的，苛求别人也是容易的。

* 这是一个自私的民族 / 这是一个疯狂的民族 / 这不是一个民族 / 这是我们的耻辱 / 我们一直在重复着我们的耻辱 // 当时的人都有责任 / 仍然活着的人 / 都要深刻反省 // 又有谁在疯狂

的压榨弱势群体 / 又有谁在呐喊 / 伤，痛，逃！

* 我不认同下面的话，我觉得应该受到惩罚的是毛泽东。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是英雄的遇罗克，而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位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的历史都显示了这一点。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 顶一个，当年大兴吃人事件发生可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人配得上中国的脊梁之誉，尤其是在一个专制体系已经深入人的灵魂深处的时代。

* 他们以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见证了文革的罪恶，专制制度，那个封建皇帝的罪恶……

*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搜集“遇罗克”的资料。护卫记忆，拒绝遗忘，揭示真相！

* 唉唉，这些英雄，这些不被他们的国家看重的英雄啊！

*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悲剧继续上演。

* 那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

兒混蛋”，横批最早是“绝对如此”，后来因多数人感觉实在谬误，逐改为“基本如此”。我是当时的知情人，特此证明。

* 谢谢这么好的文章，看了心情非常沉重，但是太值得反思了。

* 我们都要拒绝遗忘。

* 现在诸如文革、反右、六四等等都在新一代青年人中渐渐淡忘了。不可想象，今后……我们要做的是：拒绝遗忘。

* 向为真理而捐躯的遇罗克烈士致敬，历史不会忘记这样的英雄！

宾雁：上下求索，虽九死犹未悔

他少许进食之后，在注射的吗啡影响下，安然入睡，便再没有醒来。美国东部时间 2005 年 12 月 5 日，凌晨零点二十五分，他呼吸停止了。

噩耗通过互联网很快越过大洋，在世界各地传开……

此刻，在我脑海上，漂浮的，是他故乡东北那一片森林，树林之上飞雪纷纷扬扬，天上地下一片雪白；我听到，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或深沉宽广、或激昂低回的管弦乐音徐缓升起之中，传来他沉稳的声音：

我生来是一个爱幻想、有几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环境下，我多半会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诗人，或埋首古籍的学者。我的母亲，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绝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上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成为全国闻名的政治罪人。更不会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后，我会重蹈覆辙，第二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遭到最剧烈的谴责和批判……

刘宾雁先生终于离世了，这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中

国良心”的报告文学作家，一位身上浓缩了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



刘宾雁半身铜像

一，青年时代的刘宾雁：曾经一夜成名，又一夜成了“人民罪人”

青年时代的刘宾雁曾经一夜成名。

那是1956年。那年，四月号的《人民文学》在头条地位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副总编秦兆阳写了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说“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接着，也是秦兆阳的要求和安排，刘宾雁写了另一篇报告文学名作《本报内部消息》，在当年六月号和十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口气其实很温和，但确实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一篇揭露党内阴暗面的有锋芒的作品。

《本报内部消息》也是揭露批判官僚主义，其中直接提到了新闻自由问题。两篇作品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正是在刘宾雁的影响下，报告文学这个文学体裁在全国流行开来，特别是，流行开来还有一个响亮的文学口号——“干预生活”。

当时的刘宾雁，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是在什么契机下唤起创作《本报内部消息》这样作品的冲动的？他记得很清楚——是1956年随邓拓到波兰开国际新闻记者协会理事会时受到启发。当时苏共刚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部分内容循着“小道”已经传到华沙。他们每天在新闻记者俱乐部吃饭，自然要彼此传播这些东西。当时，东欧的变化比苏联快。华沙街头很多地方摆着报纸，共产党报纸、右派报纸都有，英国、法国报纸也公开摆着，随便看。他们访问了几家报社和杂志社之后，热血沸腾。接着，中共中央给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刘宾雁更感到有信心了。

1957年5月大鸣大放期间，刘宾雁常常兴奋得夜不能眠。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更由于高涨的政治热情带来的自信心，他竟然要直接向毛泽东进谏。二十五日，他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给毛写了一封信：“……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



少年时代的刘宾雁

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耽于理想主义的刘宾雁，不可避免地过于天真了。后来他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阳谋”在胸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显然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

转眼之间，曾经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刘宾雁成了“人民罪人”。虽然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也暗中保了他一下，但他在劫难逃，他是毛泽东点的钦犯，终于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外地劳改。此后，二十二年金色年华无声无息地付诸东流。在那凄凉岁月里，他极力回忆起来，最多也只有两三个人去探望过他。

但后来刘宾雁对此厄运却很坦然。他竟然说：“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了右派，离开了官场。”想想此话也对。如果刘宾雁当时一路飞黄腾达，那很可能在文革中要不死于非命，要不成为御用帮凶。该知道，于1925年农历元月15日元宵节出生在哈尔滨市的刘宾雁，可以说是革命的“老资格”。他1939年十四岁就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1944年加入中共时才十九岁。一九五六年定行政级别，刚过“而立之年”的刘宾雁就是共产党的十三级“高干”了，有资格坐软卧、坐飞机，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币，又有用不完的稿费。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富翁，刘宾雁说他都不知道钱该怎么花。“那时年纪不大级别不低，哪儿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如果不是

自己倒了大霉，跌到底层，哪里知道中国社会的实情？！”

二，重出文坛的刘宾雁成为“中国的良心”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

刘宾雁此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他义无反顾。1979年2月获得平反后，马上重出文坛，写出一系列关心老百姓疾苦、尖锐揭露腐败和社会黑暗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尤以同年9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妖之间》脍炙人口。他发展了他五十年代已经形成的风格。《人妖之间》所揭露的社会矛盾，不再是局限于某一桥梁工地或某一报社编辑部之类的个别的特定单位；在跟踪王守信这个贪污犯从一个粗鄙浅薄的女人变成“当代英雄”的过程中，刘宾雁追查到县委、地委、直到中央商业部某局等许多单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他探讨了王守信之所以能成事的土壤，第一次在报告文学中引起人们对共产党内的腐败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注意。这部作品的发表，被人称为“等于引起一场地震”。事实的确如此！

刘宾雁的所有作品都融入他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见解。他不但淋漓尽致地描绘事件的过程，而且喜欢以政论的语调来夹叙夹评。叙述时生动简洁，绘声绘色；议论时逻辑严密，锋利明快。所有分析、引申、挖掘，政论性极强，鞭辟入里，富有真知灼见。其中《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成为那一个时代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发行了一百多万册，书一出来就卖完，真可谓盛况空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宾雁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成为受到

广大民众敬仰和热爱的作家，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的敬重。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应该说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令人敬佩的坚定不屈的政治信念和好打抱不平、助人为乐的崇高的道德人格。全国各地许多人，尤其是下层的干部和工人农民——那些今天称之为“弱势群体”的人们，把刘宾雁称之为“中国的良心”，当作他们的代言人，甚至找上门来，请刘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问题。例如，一篇关于辽宁的报导发表之后，刘竟收到了八千多封读者来信！不轻易夸奖人的文学大家钱锺书先生，曾引《论语》称赞刘宾雁是“仁者必有勇”，又赠给他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85年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首次自由选举中，原来并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刘宾雁，居然以第二最高票当选作协副主席，可见他在整个文坛上威望之高！

受到刘宾雁（以及另一流派代表徐迟）创作方向及其作品的影响，报告文学又一次而且以更大的声势在中国大陆异军突起，发展成针砭时局和呼吁改革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特别是，当时出现了文评家归纳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新品种。具有强烈社会性、政治性的大事件、大问题成了报告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内容。过去的作品，焦点只在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现在不少杰作，一下笔就洋洋洒洒，采用宏观的角度，全景式的透视，有些甚至带有学术性的味道。这绝不仅仅是形式或表现手法上的变化。人们在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作者的历史反思以及这种反思所暗示的政治要求。现实生活中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许多敏感问题，也都在报告文学作家关注之列。这些作品并不听命于某党某人，不是歌功颂德之作，而是作家出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的结晶。他们发自心底的声音，或多或少带有冷峭的、

批判性的色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报告文学在中国大陆高度发达、高度繁荣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例如，1987年10月，九十九家杂志、报纸共同举办《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比赛，应徵作品几乎有一千部之多！带批判性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了这个文学样式的主流。苏晓康、麦天枢等报告文学作家则饮誉全国。他们发展了刘宾雁的“干预生活”的信条，甚至是以文学“干预政治”了。如果说民主是刘宾雁报告文学的灵魂，苏晓康等人倡导民主更为大胆（论者称他们代表“浪漫理性”阶段）。他们许多作品，其道义水平之高，社会震撼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报告文学使整个中国文坛为之激动，1988年半年多时间连续开了几个全国性的研讨会。这一年被文史家称为“报告文学年”。由于报告文学的极大成功，文史家相信，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某一文学样式可以特别获得迅速发展而达到高峰；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那几年，对中国大陆而言，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时代。这甚至是刘宾雁所预料不到的。他当然是喜出望外。他对后继者的新成就，可真是老怀欣慰了。

三，“第二种忠诚”的下场：刘宾雁再次遭难

刘宾雁1979年重出文坛的亮相之作是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三月号上的《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他认为，“干预生活”是一个涉及“文学的根本特性”的问题；而且，“这其实首先是个如何作人的问题，其次才是文学问题。在封建时代，尚且提倡仗义执言，舍身死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于

关系到人民利益、社会主义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反倒不许人们干预，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一篇翻案文章，为他刘宾雁二十多年前曾经倡导却遭到严厉批判的文学口号作自我辩护；这是一篇挑战书，挑战当时还相当流行、但已陈腐不堪的文学理念；这也是一篇宣言书，宣告天下他刘宾雁初衷不改！



第四届文代会上刘宾雁和胡耀邦在一起
(1985年1月)

许多人都说，刘宾雁其实不像一个“本分的”文学家，虽然他写报告文学已是闻名天下。这也难怪，他的职业是记者，他更热衷于政治，是个忧国忧民的改革家，或者说，是个怀抱“第二种忠诚”的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第二种忠诚》是刘宾雁发表于1985年《开拓》杂志创刊号的报告文学。他通过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表达自己的忠诚观。所谓“第二种忠诚”，即是作为有头脑、有是非、有热血的党员，对党应该抱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态度，对它的方针政策，也要分析，不能盲从；支持它的正确的主张是爱护它，揭露和纠正它的错误同样是

对它的真诚的爱护。这种赤子般的真诚，正是刘宾雁自己的人生理念和行为准则。

那么，“刘宾雁岂不是自命为针对党的检察官和法官了？！”党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元老不能容忍了。在他们眼里，复出以后的刘宾雁一直是个可疑的问题人物。现在，刘的“问题”升级了——以前他的报告文学以及相关的调查只是受到几个地方党委的攻击；现在他进一步惹起了中央一些人如胡乔木、邓力群的不满。

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很有意思的社会。就像很多政治历史研究者所说，几乎不可思议的是，整个十年，政治风云反复变幻，大致上竟是逢双年反“左”、逢单年反“右”！或者是同一个时间，有些领导人反“左”，有些领导人反“右”。1986年7月间，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传出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信息。万里竟说不仅一般政治问题、连政府的政治性决策也是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万里在讲话中，还一度离开讲稿，说起刘宾雁的文章来。他说，“刘宾雁的文章《第二种忠诚》我最初没有看过，听说引起很多人反对，找来看了。我看很好嘛，我们就是需要第二种忠诚嘛。”几天以后，万里还约见刘宾雁。刘来到中南海万里的寓所后，万里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

“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

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刘宾雁，自然一定要谈到胡耀邦与他的关系。

刘宾雁曾经回忆说，1958年2月，他的命运已定、准备下乡

劳动改造的时候，胡耀邦把他和团中央系统几名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右派分子找到团中央小会议室去。这时他们这些人最关心的是前程问题，心情都是灰溜溜的。胡耀邦似乎有意表示，他并不认为刘宾雁等人是反党分子，是敌对分子，他的态度和以前一样，仍然以“同志”相称。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他特别提到刘，说：“比如刘宾雁，就是骄傲了嘛，尾巴翘得太高了嘛。”

胡耀邦对刘宾雁的关心爱护是有目共睹的，刘宾雁也是感恩的。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性不改”的刘宾雁给现在已成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带来很大的麻烦。例如，1984年秋，刘宾雁写陕西省一个案件的文章引起一场大风波，竟闹得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一个多月不得安宁，以致胡不得不出面批评刘。他的话是：

“刘宾雁没有接受一九五七年的教训。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记者，去当作家吧。”但胡耀邦的话在《人民日报》传达之后，又引起编辑部一片哗然：“谁应该接受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不是党中央吗？难道要被迫害二十几年的‘右派’来接受教训？”

刘宾雁知道他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使胡耀邦很难办，但胡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他，每次都给以保护，不然他是不可能继续当记者，继续写作到1987年的。而刘宾雁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与有志于改革的人一样，对胡耀邦寄予极大的信赖与期望。人们都说，胡耀邦最得人心的是他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假大空话”，概括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那些曾经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然而不切实际、甚至虚妄、谬误、骗人、有害的话语口号。他主张对这些东西就是要藐视，要戳穿，要抛弃，不管是谁的发明，不管来头多大。早在1978年，他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影响非常深远；而近的就是继续千方百计为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开放改革”方针路线披荆斩棘，鸣锣开道。另一个概念叫“冤假错案”，概括了政治上组织上的种种冤狱。也是在1978年，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時候，便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主持对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无论受害者是党内的干部还是非党的民众，哪怕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定性的，他都主张一风吹，一概平反昭雪。而刘宾雁在下面所作所为，作为一个记者也好，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好，无非是在戳穿“假大空话”、平反“冤假错案”这些大工程上添砖增瓦、略尽绵薄而已。

但当胡耀邦竭尽全力试图进一步开放改革、试图进一步实施他的治国方略的时候，他在某些元老眼中也成了问题人物了。1981年对《苦恋》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夕《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一篇题为《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的居心叵测的文章，特别是1983年来势汹汹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最终目标都是要搞掉胡耀邦。刘宾雁和他的朋友们都常为胡耀邦捏着一把汗；



刘宾雁与夫人朱洪 1987年初
摄于中国海南岛。

胡耀邦的安危，成为他们关注中国政局动向的中心。显然，虽然刘宾雁与胡耀邦地位差别很大，但他们对党内黑暗丑恶的东西，均是不遗余力揭露鞭挞，不护短，不回避，在这些方面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心直口快，满怀激情，既执着，又天真，忧国忧民，是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悲剧人物。

1986年末至1987年初，第一个大变动终于发生了。堂堂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非民主的、更说不上正式会议的什么“民主生活会”上被废黜了，罪名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无数冤假错案的大无畏的平反者，自己却成了冤假错案的殉难者！

顺理成章。1月24日下午七时，中央电视台按“每五天宣布开除一个”的计划，像十天前公布开除王若望、五天前公布开除方励之一样，宣布开除刘宾雁党籍的决定。刘的罪名和前者一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四，流落他乡，关山万里，痴心不改：

老年刘宾雁仍然忧国忧民

很早以前便有人问刘宾雁：你和一家人那些年受到那么多罪，为什么1979年重新拿起笔来，就写《人妖之间》这种作品呢？难道不怕再祸及全家吗？

最初，刘宾雁的回答是：“在1979年那种气氛下并不觉得《人妖之间》这种作品会带来多少危险。”很快，这个答案不切当了，因为他开始遭到攻击和威胁，却依然在写。其实，从1982年起，刘宾雁就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一些先例已摆在那里：先是哲学家郭罗基、作家白桦、诗人叶文福、评论家阮铭，后来又有哲学家王若水、李洪林……等等，一个个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或被撤职、开除党籍。有一次刘宾雁和王若水议论他们的前途，刘说：

“真怪，我们这些人无疑是最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为改革宁肯牺牲自己，可是我们一面这样做，一面又不得不提防着随时可能被我们所拥戴的人踹上一脚。你说是不是？”王若水说他也有同感。果

然，一年以后，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王若水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位就被拿掉了。

著名女作家张洁为刘宾雁找到的解释是：“刘宾雁这人傻，他是‘笨人刘老大’！”张洁借用王毅、刘锦云那篇描写文革中一个农民的悲惨遭遇的短篇小说《笨人王老大》（作品曾获一九八零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所作的比喻，用著名诗人邵燕祥后来的话说，“文学界友人深然之”。刘宾雁似有所悟，觉得自己大约也是缺点心眼儿，对有些事，神经比常人迟钝，大意失荆州。后来，刘终于找到了答案：第一脚迈出去的时候，他确实不知深浅，想不到会有什么危险。过些时候看到危险了，但这时觉得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成倍地增长，那就是他的读者，中国各阶层的人。他们人多势众，在背后推着刘宾雁前进，让他甚至感觉到他们越来越热切的呼吸。于是，刘宾雁欲罢不能，甚至有恃无恐了。

即使被开除党籍，刘宾雁也感到背后民众的支持。说来好笑，这个决定，按党章规定，应该召开党支部大会来讨论，但这个会始终不敢开。据说上头分别找过刘所属支部的党员谈话，发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对，而且难以说服和压服。在《人民日报》报社以外，也作过试探。找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三人都认为开除不妥，对共产党不利。1987年1月24日宣布开除那天，从下午三时起至十时，共有二十七位客人到刘宾雁家里表示慰问。有人向钱锺书提起刘被开除党籍的事，钱先生也说，他赠给刘“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副对联，“是不收回的”。三十年前刘被打成右派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敢到刘家来的客人不超过寥寥数人；今天，同样事情发生之后，刘反而声名大噪，家中更是门庭若市。

刘宾雁深切感到，他的生命是和中国人民紧密相连的。他不无自信地觉得，不像三十年前，他现在还是可以做一点事的。他从中才找到他生命的意义。但是，此时命运之神又和他开了一次玩笑。一九八八年三月，被开除中共党籍的刘宾雁却意外地得到接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邀请的批准，到美国研究和讲学。这个批准是经过赵紫阳亲自同意的。看来胡耀邦的继任者亦同情刘宾雁。（陈一谘回忆他任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时，有一次和赵紫阳总书记谈起刘宾雁，陈说：“我接触过刘宾雁。宾雁这个人有正气，敢说真话。”陈还把他对《人妖之间》的看法告诉了赵紫阳。赵没说话，过了一会点点头，说：“说真话不容易呵！”）但赵总书记这个“同意”不知道对刘宾雁究竟是好还是坏，总之，刘的命运因此又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一年之后，“六四”发生，刘宾雁不能返国，从此开始长达十八年的流亡生活。



刘宾雁曾经伤感地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他自以为“忠

刘宾雁在美国创办《新闻自由导报》。诚”啊，而且还是他觉得的更为宝贵的“第二种忠诚”！但事实上他就是被视为一个“敌人”。多么巨大的矛盾！多么巨大的痛苦！现在，他更要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了。对于刘宾雁这样一个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是他真正的

活动场地的社会改革家，流亡生活无疑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不过，即使处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境况，十八年来，他魂牵梦绕地一刻也忘不掉的是那块哺育了自己灵与肉的土地和人民；“老百姓的疾苦”始终是他倾注心血研究问题的起点和终结。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始终激荡着。真是一个“笨人刘老大”！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者！已经步入老年的刘宾雁，流落他乡，关山万里，却正是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进亦忧，退亦忧”，终日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刘宾雁的友人都说，也都最感慨，他的一个行为方式就是，每次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不管来自何方，不管身份何属，也不管社会地位高低，只要他知道，只要能够前去探望或请到家来问询中国国情，他必定这样做。年长日久，朋友们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但凡有可能，必定将自己身边来自国内的朋友通报给他，接到他家，让他做详细的调查了解。他心头时时刻刻都萦绕著一堆问号。难怪有个作家开玩笑说：“跟刘宾雁一起吃饭最倒霉了，他永远忧国忧民，这饭菜哪还有味儿！”

刘宾雁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精神，如人所说，是他生命萌发期种下的“牛痘”，那痕迹永远抹不掉。人们更不无崇敬地、也许还有点惊讶地发现，刘宾雁在如此逆境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却从未改变他的基本信仰——他自少年时代起，在目睹国破家亡的民族不幸和国民党统治末期的腐败、堕落和社会不公后，建立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

刘宾雁对一种他称之为“宁右勿左”的现象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大陆过去长期的政治生活中，许多人行事均“宁左勿右”，现在在美国，我们可不能简单地倒过另一边去啊。刘宾雁在美国生



晚年的刘宾雁与妻子朱洪在美国相依为命。活十八年，当然对美国社会的优越性深有体会，但他从马列主义分析方法出发，对其中他认为的弊病，对布什总统某些国内外政策，特别对他的伊拉克战争政策，又有不少微词。他本能地不喜欢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非常警惕美国具体政策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对于中共，众所周知，他批判甚多，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笔抹杀。

刘宾雁说，当年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能说是共产党那么一煽惑就走的啊，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的不公，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因此更应该研究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社会主义岂能一扔了之？”他不认为、或者说不甘心，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

刘宾雁的确痛苦和迷茫：为什么自己一生奋斗的理想距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他多次和友人谈起，为什么二十年间中国会变得如此物欲横流，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但是，他当年加入共产党时，为寻求一个民主、自由、公平、人性社会的火焰，仍然不息地在胸中燃烧！人们发现，他生命最后这几年特别密切关

注、研究起拉丁美洲来了。原来他想从中为中国大陆的问题找出某些经验教训。他反复质疑：偏向资本而压制劳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真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的福音吗？如果我们坚定地支持劳工权益，是不是也必须要同时拷问我们自己对待资本的态度呢？

刘宾雁一些观点看法，是有争议的，显然不同于他周围一些人，包括他一些朋友。这个当年的大右派，也被人或明或暗送上一顶“新左派”的帽子。今年十月九日，即是去世前不到两个月，刘宾雁在疾病的极度折磨中，为纪念胡耀邦九十冥辰写成六千多字的文章《孤独的胡耀邦》。可以看出，这篇后来成了他的绝笔的文章，也是他心灵境况的某种反映——他在美国追求他的真理的崎岖小路上，也是孤独的。但理解他的



朋友知道，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刘宾雁在他八十岁生日庆祝会上思考和抗辩，正是出于他对人类正义、公平执着追求的赤子情怀。刘宾雁决非那些无视制度性不公的前提却妄谈“社会公正”、并企图用毛泽东文革中或文革前所施行的那一套来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所谓“新左派”。他也决非那些将其列为“新左派”的人的浅薄无知所能理解的。

刘宾雁借用学者秦晖的话说，我们在反对党内老左派头子胡乔木、邓力群的“假主义”上花了太多精力，却疏忽了中国毕竟面临很多“真问题”。他决心要切实研究这些“真问题”。他的决心，

他的几乎可以说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让每一个知道他病情的人万分感动，万分心痛。这两年，他的癌细胞已经由直肠转移到肝部，其实已经是癌症晚期！但他没有给吓倒。他以说笑的口气说：医生当时切除癌瘤时，说长到这么大，已经有十年了。这就是年纪大的“好处”——癌瘤发展得慢。现代科学发达了，观念也得改变了，杂志上有篇文章说，以前认为，癌症意味著人生的终点，现代人却得习惯带著癌症继续走人生之路。他说他也能习惯，活下去大概问题不大。再活十年就行！他要带病完成他目前正在撰写的回顾自己一生、思索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著作《走出千年泥泞》。今年2月27日，在他八十诞辰庆祝会上，刘宾雁刚毅地说：

再活十年（我觉得少了点）的话，我会更加珍惜时间。近年来悟出一个道理：对于中国，个人的作用是太有限了；但是它又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只要脑子还好用，就一定要多留下一点东西，不管年轻人爱不爱看。总之，一方面觉得自己能够不死、不精神崩溃、不家破人亡，太幸运了，应该多做点事；现在，心里就更是诚惶诚恐了……相信我，决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五，“耿耿良知耀日月，铮铮风骨擎苍天”：

刘宾雁走完八十年生命旅程

可惜，命运之神没有特别眷顾刘宾雁。他走了，留下他一大堆未竟的事业……

想不到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宿命。如同大雁永远留在异乡为宾客，他没有能够活着回到深深牵挂着的祖国，没有能够在北京街头和他

日夜眷恋着的民众打打招呼，说上几句话，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也让许多热爱他、敬仰他的人感到心伤。

人们想到了屈原。刘宾雁与中国古代这位伟大的诗人一样，都追求真理，抨击权贵和邪恶，都遭到放逐，不怨不悔，最后客死他乡。人们说，自古以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似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变的“职责模式”；“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幸成为永远处于“败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豪语。刘宾雁也这样悲剧地走完他的一生。

但是，走完八十年生命旅程的刘宾雁，“耿耿良知耀日月，铮铮风骨擎苍天”。他以赤子之心，自始至终追求人类的公正与正义，完成了他大写的人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们无不为刘宾雁的人格所感动。这个人的一生揭示了：人格的力量有可能超意识、超党派、超宗教、超国界，有可能超越具体观点立场的不同。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左、中、右，无论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无论他的仰慕者、追随者或是心存隔阂者，无论他的批评者或被批评过的人，都觉得刘宾雁实在人格高尚，刚正不阿，堪为典范。的确，几代中国人，扪心自问，谁没有或多或少受到刘宾雁的“启蒙”？谁能否定他留给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精神基因？

当年，胡耀邦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胡耀邦这个期许，也许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作为“中国良心”的刘宾雁，他晚年的坚守和追求，可能远比文学史上的刘宾雁更为可贵。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

应该说的话。”这是刘宾雁生前希望将来在他的墓碑上只写上的一行字。

是的，刘宾雁先生，您已经做了您应该做的事，说了您应该说的话。

刘宾雁弥留间，最后最清晰的一句话是：

将来，……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

是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2005年12月7日初稿，同月18日修改，于澳大利亚悉尼。）

2011年2月23日后记

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先生在美国去世；五年之后，2010年12月22日，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据报道，当天，没有哀乐，没有旗帜，墓碑也无字——刘宾雁生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不准刻于其上。悲咽的北风，迫使两个仪仗人员一左一右牵扯住前导的灵伞。灵伞之下，神情肃穆的刘大洪捧着父亲悄然回归多年的骨灰盒；外孙李达宽捧着一帧风骨俨然的刘宾雁木雕遗像，紧随其后；女儿刘小雁以及卢跃刚等人搀扶着八十一岁高龄的朱洪老人，缓缓行进在亲友与严格限定的来宾混合的送葬队伍最前面。

铺排在墓前的两幅挽联，形象而大气磅礴地凝蕴着刘宾雁的旷世风骨。

一幅写于刘宾雁逝世三周年：

鸦雀无声雁有声，党名除却彰民名；

世间唯有人心大，春日鞠躬向厝灵。

挽祭归葬的另一幅写着：

徒有两度离骚，失土得天，彼厄徒增了塞翁志气；

不留片言墓志，为文做事，此园永驻着中国良心。

还有刘宾雁生前好友撰写的三幅挽联：

谁怜英雄无归地；磊落良心恨入天。

日月真明长在望；风云苍黄久相期。

稷石断裂无言 悲怒鬼神泣；极碑矗立有字 圣咏天地歌。



刘宾雁墓碑

这一天是冬至，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这一天见证了悲愤的一幕。人们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刘宾雁墓前的这块无字之碑将越来越具有历史价值，终将成为未来的人们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文物。“中国的良心”刘宾雁的名字和他的墓志铭已经刻在人们心上，将被人们长久记忆，永远不会风化磨蚀。

北望长天祭英魂

—



居住在悉尼的储望英与夫人陶俊英（本文作者摄于2005年6月30日）。

那天在马白教授家里和储望英聚会。望英君是储安平长子，移民澳洲也有一些年月了，就住在悉尼南区离马白教授家不远的地方，过着平淡幽静的退休生活。我们谈那场倏忽之间就摧残了几十万精英的所谓“反右运动”，谈他父亲。他话不多，看来性格也像他每

天的生活一样，但内心的悲怆，虽然压抑着，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二



储安平遗照（1909年
11月5日-1966年？）

关于储安平，至今还是一个谜——是他之死，或不知生死。

许多人已为此写过文章，提供自己的见解。例如：徐铸成的《我的同乡》（台湾《传记文学》1989年第5期）、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孙琴安和李师贞的《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董乐山的《闲话》（广东《随笔》，1993年第3期）、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胡志伟的《中共文化百人志》（台湾《传记文学》1989年第53卷第2期）、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1999年第2期），以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一书中有关章节……等等。各有各的说法：“投河自杀”（在北京某个地方？）、“蹈海而死”（在青岛？在天津？在塘沽？）、“虐杀毙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掀起“红色恐怖”期间，北京市被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者超过一千七百人）。也有说未死的，说储安平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或说他在江苏某地出家当了和尚……

蔡楚先生那里也有一些储安平先生的传闻，来源于储安平先生离异的前妻易吟先和她的小女儿易欣。这位易吟先于1961年改嫁

给宋希濂先生。蔡楚先生因与宋希濂的前妻冷蘭琴的侄儿冷豫民是老友，因此于1979年11月，借出差北京的机会，帮冷豫民带礼品，曾两次去北京前厂胡同他们家里，见过宋希濂和易吟先。后来，还认识了易吟先的患精神疾病的女儿易欣。1980年，宋希濂和易吟先移居纽约后，据这些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不仅居住过一位酷似储安平先生的老人，而且还常常资助易吟先和易欣。虽然，易吟先判断他就是储安平先生，但这位老人从未承认他是。也因此，易吟先女士生前不愿意披露此事。

似乎呼应这个传闻是章诒和这个神乎其神的叙述：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不过，当章诒和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时，这位大右派章伯钧的夫人没有兴奋起来，只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储安平的后人也不相信储安平还活在世上。储望英的弟弟、现在墨尔本居住的储望华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父亲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储安平想到死是很自然的。而储望英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的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情景：他父亲被野兽吃掉了。他以平静

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储安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可能神志不清地蹒跚到北京郊外像八大处一带的山林里，那时八大处山林里常有豺狼野狗出没……

储安平孤零悲惨的最后日子又是怎样的呢？人们知道，反右之后，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弃他而去，此后经年，大多数时候，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为伍……

经过多方回忆，总算拼凑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情景——

储安平“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

8月31日，刚好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惨受多日凌辱毒打的储安平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但没有成功。一个多星期后，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储安平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他蹒跚



储安平生前和子女的一次合照。

离开家，走了出去……而阴差阳错，就在第二天，他学农的女儿储望瑞曾从北郊进城，回了一趟家——只见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东西也荡然无存，只是满地撒着花手帕，她记得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

9月中旬的一天，储望华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问知道不知道储安平目前在哪里。储望华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

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负责此事，并要求储望华和他二哥协助。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储安平曾有来往的朋友，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储望华，说他们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储望华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储望华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储望华一时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储望华是否和父亲彻底地“划清了界线”。他们知道，储安平最疼爱他这个自小聪明伶俐、天资过人的小儿子。



“反右”期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

在那个全国笼罩在红色恐怖的年代，这种考察几乎是多余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九六九年，大阴谋家、迫害狂康生发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害人的恶魔显然都想清清楚楚确知所害的结果——

他们引以为荣的业绩。

没有答案，即使在威严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死人无言，生人无语。真是一个冷冰冰的“死结”！储安平生死之谜，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如今虽然过了几十年，听来也令人分外黯然神伤。

三

作为1980年“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别”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历史庄严地记录下来：“党天下”。

储安平是在毛泽东“诚恳”动员之下，于1957年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发言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第二天见报于《光明日报》，标题改为《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储安平说：

……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当年某次批判储安平大会的入场卷。

储安平的发言石破天惊，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而个别政治敏感者或有特别渠道者立时觉察到，这位“言者无罪”者肯

定罪责难逃，要大大倒霉了。事实上，毛泽东于半个月前，也就是五月十五日，已写了一份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件，在高级干部中内部传阅。毛已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诉，白天黑夜的、马拉松

式的轮番轰炸，是从六月六日下午开始的。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向世界公开地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6月10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首先在吴晗的主持下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也批判了储安平等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

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当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二十四个人发言，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

6月15日，《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题为《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

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

当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文章《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6月21日晚，九三学社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6月29日，《文汇报》加编者按登载了储望英被迫于三天前写给父亲的公开信。

7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文章《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文章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文章《编辑“能手”》。文章最后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8月6日，《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文章《“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

9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文章《天下究竟应属于谁？》，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

11月28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文章《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

11月24日、25日、28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参加大会的有

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

上述的远远不是完整的纪录。这些东西今天读来真是令人厌恶之极，因此不必再多录述了。不过，应该还加上毛泽东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当然，“伟大领袖”不屑对储安平一人发话，他训斥全部右派，说：“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在全国性的恐怖政治高压下，谁都要对储安平进行攻击、谩骂。为了尊重历史，我也不避讳列出储安平亲朋好友、不久前的战友同志，对他的攻击，其中包括后来同样被打落水者。“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戴晴在她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中如是说。一下子横遭众叛亲离的打击，储安平彻底崩溃了。他在“人民”面前成了大“罪人”，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储安平能有什么想吗？“人民”一词，在党政治文化术语中，藏掖着深刻的诡谲。

早在6月21日晚，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储安平发言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

7月7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在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

但对他的斗争并不结束。在 1958 年 1 月 18 日至 24 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 月 31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于 1957 年 11 月 12 日和《光明日报》社长章



右派们的自我批判收集成书。伯钧被同时免职。

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以毛式的形象又刻毒的时髦语言概括之，储安平已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储安平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储安平竟敢触犯皇帝之大忌。这

个“党天下”之谏，太尖锐了！在几乎五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人们仍不敢如此露骨地公开议论，这还是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禁忌。不过，“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创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事先肯定和同道中人说过他的想法，其中很可能也包括梁漱溟。而以梁一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此举，惊天动地，的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只有他这样的人物，才作得出这样的建言。

储安平何许人也？大概现在知道他的人对其生平并不详悉——储本人生前很少写到自己。以下是他不完整的简历：



1909年7月22日(阴历6月6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城内北门储宅。储家是 早年的储安平踌躇满志。名门望族。

1928年，考进上海光华大学（所读何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新闻系，有说是政治系，或英国文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看了光华的档案，证实是政治系）。1932年在光华大学毕业后，任南京《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193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1939年回国，任中英

文化协会秘书。

1940年至45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不久去重庆复旦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前夕应聘任湖南《中国晨报》主笔。

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独立的无党派政论刊物《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至此《观察》凡出四卷又八期。此后，他秘密去北平并转入地下工作。

1949年9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1年，他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九三学社理事。

1950年7月，《观察》更名为《新观察》，任特派记者。同

年夏离开《新观察》，任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夏，任国家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4月1日到《光明日报》社任总编，两个月后发生前述事变。



储安平早年的出版物

就储安平悲剧的一生而言，其事业的颠峰是办《观察》。永垂史册的《观察》周刊诞生于1946年9月1日（或许只是历史的巧合——1933年，因为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害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国民党当局被迫于9月1日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新闻界自发地定为“记者节”）。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直言“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

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并表明所取的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像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政党的共同政治取向，储安平开头两年既反对国民党，又不认同共产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只是经过1948年淮海战役、国共两党的胜败大局已定之后，便基本上抛弃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在那风云翻滚的几年，《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和独立的品格为知识分子自由论政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台，而储安平本人更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叱咤风云的政论。他的研究者谢泳说，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很有感染力，文字也好，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谢泳，《悲剧储安平》，《生死之谜——储安平》纪念网站）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有些是使某些当权者非常尴尬甚至难以容忍的。储望英送来一套《储安平文集》，笔者翻阅过。这是1998年7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作为“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出版的。书为两卷本，很有分量，但编者张新颖不得不作了一些处理。

“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这些处理没有多大必要。《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

等篇，早在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下称《简编》）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一九九九年岳麓书社还出版了《观察》周刊的影印本。

当然，删去的都是指责共产党的文字。如《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中说：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民主’，有‘自由’，此实为大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简编》，第二十五页）

又如《中国的政局》文中说：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简编》，第三十四页）

同文另一处还说：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第三十五页）

时过半个多世纪，这些文字的确还是非常尖锐。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年储安平持有此种观点并非怪事，而且具有代表性。而对今天中共人士来说，则实可以大度看待历史，甚至不妨

以史为鉴，以促进自身改革，得以进步。就储安平研究而言，这些文字非常重要。这里还提出了一个让人纳闷进而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抱有此种观点的储安平没有随国民党去台湾而要留在大陆，而且还进而支持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呢？除了当时形势变化等外在因素外，可能只能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对国家的大爱去解释。对国家的大爱是两千三百年前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树立的光辉榜样和流传下来的深厚传统。自此以降，中国大多知识分子都怀抱儒家入世观，起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自善其身”，其内心都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



储安平当年主编的一期
《观察》周刊封面。

自我证实的需要。如论者所说，在储安平的思想里，处在一个特定地域的“国家”，主要是指生活在这个地域上的民众以及这些民众所传承的文化；这个国家既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政治集团的。这就使他把爱国与政治分开，他不会因为批判某一个统治国家的政治集团而鄙视祖国，他的批判恰恰是为了使祖国更加美好。储安平深深的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结，也引导他希望参与社会主义的实验，毕竟社会主义本来是一个为大众争平等谋福利的美好事业，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也是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而在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又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这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无法绕过无法解开的死结。

1957年春天，这种对国家的大爱，又一次使储安平失去了时

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按说，1949年之后，《观察》复刊失败，接着自己离开《新观察》，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当使储醒悟。然而，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储安平内心对承担的机会的渴望，他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他的情结，他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

是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虽说储安平是经“各民主党派公推”出任此职，但在“公推”之前，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大人物胡乔木亲临厂桥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顾茅庐”般的热情给请下山的（台湾《传记文学》1989年第54卷5期上有李韦一文，其中曾说胡乔木说过，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戴晴的报告文学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说“文革”之后，胡乔木不知储已死，想请他出来办报，可见胡对储的评价不低）。于是，储安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很快就抖擞起来，前些年毛泽东所领导的摧残人性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如果在他身上哪怕残留过一点点“成果”的话，此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在报社公开大力宣扬：“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认为：“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4年)……看,真不得了,好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

也正是这种对国家的大爱,使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两个月就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做了那番石破天惊的关于“党天下”的慷慨陈词。不然,以储安平在新闻界文化界滚打多年、见多识广的资历,以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均有的深刻的认识,当年何以会如此坦呈这个虽然惊天动地、但看不出有多少可能为对方接受的批评?!他何以会这样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悲剧命运?!

五



……弹指一挥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笔者去年10月2日在北京见到章诒和时,也谈到储安平和她的父亲章伯钧。章诒和把他们两位当年的往来写在《往事并不如烟》书中第二篇里,标题是《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该篇开头就说:

本文作者与章诒和于2004年10月2日摄于北京。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 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

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章伯钧感到内疚，当然他自有理由。不过谁都看得出，储安平落得如此“下场”，应该是在劫难逃。

如今，储望英亦近耄耋之年。他慎重地告诉我们，最近得知章诒和有个想法，要在北京为她父亲立个纪念碑什么的，并希望罗隆基和储安平的纪念碑最好也立并且都立在一起。我心里想，不知章诒和的想法能否实现？不知纪念碑如何设计？有无可能干脆一个碑三面体？毕竟章伯钧在1957年5月21日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接着在5月22日提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又在6月1日提出的“党天下”，已经一起被称之为“中国右派三大反动理论”；而且，这“三大反动理论”得以名留青史，亦需要一起“感谢”毛泽东的“阳谋”之功——它们都是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份密件后被“引蛇出洞”的。

中国当代史上沉重的一章转眼就过去了这么久。荒谬的是，这个所谓的“伟大的反右斗争”至今依然被认为“正确”，尽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五十五万余右派分子都已经平反或脱帽了。这岂不是说，“不予改正”的五名中央级别的再加上地方上九十多名右派的身上——准确地说，除可能几位尚存人世，是冤魂——便要为此这个“正确”的结论屈于政治需要而永世不得翻身了？

往事并不如烟！冤案何时昭雪？！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岳飞。岳飞的后人记录到宋朝给岳飞平反总共八次，开始是初步昭雪，然后发还田宅，再到复官改葬、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

全程历时九十九年。首次平反是 1162 年 7 月，岳飞冤死二十一年之后，正好和右派平反历时的长度一样。难道平反也有周期律？也有中国特色？……不管怎样，人们期盼着。中国人虽然没有沉重的宗教感，虽然不会因为“原罪”而忏悔，但中国人敬畏历史，并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时代的大河尽管曲曲弯弯，最终都会汇进真理的大海。历史正在一点点地昭示真相，也折射着储安平思想的光辉。



作为
20 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之一，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于 1998
年 1 月出版两卷本《储安平文集》。

例如，储安平这段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越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

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
(《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版，第63页)

这是当年储安平对“一场烂污”的国民党的批判。今天，时隔半个世纪，早已改朝换代，但在神州大地，不是也能听到时而隐约时而响亮的回声吗？其中一个回声甚至发生在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身上。根据前苏联总统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所记载，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在北京与他会见时，以“修辞”的方式提出了如下这样一个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应当由他们一起来回答（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EMOIR》第489至491页）：

“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

戈尔巴乔夫说，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疑问。他从问题的这种提法中发现，原来为这种疑问而苦恼困惑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赵紫阳最后如此自我回答：

“假如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党制’的问题。”

.....

这就是历史！

储安平正在复活，正从过去向今天走来。今天那么多人纪念他，也是有力的讯息，预示他思想的光辉明天将会更加闪亮。

储安平将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现实的动态中，活在中国人的生命中，尽管他当年先知般的预言是以昂贵的代价去证实的——包括他自己生命的凄惨的终结。

六

马白教授住的是十八层的高楼。我随储望英、马白走出阳台，往外望去，一马平川，笔直的大道通向无限，南悉尼尽收眼底，而稍微偏北方向，隐约还可见到澳大利亚成功举办千禧年奥运会的运运动场。我们凭栏伫立良久，仿佛面对着万里之外的、位于北半球的祖国……

一代精英，千古英魂，祭祀您了。

（2005年4月26日初稿于悉尼，2022年6月14日修订。）

后记

此文完稿于2005年4月26日，是晚悉尼作家刚好有一个聚会，欢迎天津作家杨显惠来访。他的《夹边沟纪事》描述当年劳改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的骇人听闻的惨烈场景。雷达为此书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此后不久，我便到中国大陆参加活动。无独有偶，5月8号离开悉尼，当晚到达香港，第二天无意中就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一套纪念储安平的程序。四海同心，心同此理，我又一次感到人间正气长在。

2012年4月15日，我们在悉尼科技大学举办了纪念“反右”五十五周年研讨会。储望华应邀特地从墨尔本赶来与会。会上，储望华深情地回顾他父亲悲惨的命运。他还告诉我们，在他父

亲诞辰八十周年时，他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储望华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本文作者和储望华于2012年4月15日在悉尼纪念“反右”五十五周年研讨会上。

2015年5月19日上午，储安平衣冠冢落成仪式在宜兴西郊外龙墅公墓举行，储安平的儿子储望英、储望华、储望德等至亲悉数出现在墓地前，伫立雨中，寄托哀思。作为子女代表，储望华在墓前讲话，之后，俯身亲吻了父亲陵墓前的无字书石雕。储安平在文革期间受尽折磨，最后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现在尸骨无还，落葬无骨灰，也没有逝者生前衣物，只是一帧塑封照片、一本塑封书籍，包裹在一方红布里，装入公墓管理方提供的一只陶坛内。正如储安平子女邀请的亲友代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2004）自由写作奖得主章诒和在她的讲话中所言：“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应该不是巧合，历史上，5月19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57年的那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在毛泽东不断号召不断加温下，当天，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鸣放大字报。紧接着，各种大字报纷纷出炉，整个学校立时处在大鸣大放热潮之中，也带动了全国各行各业进入“帮党整风”的热潮。北大“五一九”运动喊出了“民主”和“法制”的口号，但不幸

的是，也让毛泽东施展他的“阳谋”进行“反右”找到了口实。

储安平是其中著名的一个打击对象。他因“党天下”言论，惨遭毛泽东“引蛇出洞”迫害，至今位列五大不准翻案的右派之一。拙文撰写于十多年前，不过是对惨遭迫害的右派分子制出的一支卑微的安魂曲，是祈求历史正义的一次弱小的呼喊。当年超过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惨遭迫害，今天仍活人世的可能不过三四千人，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2015年5月19日储安平
衣冠冢落成仪式现场。

但此文写作的那个时代，社会上人们多少还是心怀期盼的，本人也期盼中国能够深化改革开放。记得完稿当天晚上，悉尼作家刚好有一个聚会，欢迎天津作家杨显惠来访。他的纪实小说集《告别夹边沟》，描述右派分子劳改中大批死亡的骇人听闻的惨烈故事，当时让千万读者深受震撼，在中国评价很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此书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这个观点也是当时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此后不久，我刚好去中国，无独有偶，5月8日离开悉尼，当晚到达香港，第二天无意中就在香港凤凰卫视看到一套纪念储安平的节目，让我相当感动。四海同心，心同此理，我又一次感到人间正气长在。

此文写作十年之后，储安平终于在老家“下葬”。当时有人希

望“储安平衣冠冢让如烟往事沉淀”，我就说，对“反右”中种种冤案，对极其冤屈的文字狱言论狱，当然不会就此轻易“沉淀”。不过，储安平衣冠冢的落成得到了宜兴市政府的默许，怎么说还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许多善良的人万万没有料想到，就最近短短几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竟然急剧全面恶化，不要说什么希望中共当局对至今已超过一个甲子的“反右”运动做到正确评价、全部平反；相反，完全可能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观点将会再一次遭受清算批判，而且更加严厉更加恐怖。君不闻，“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今天已经成了金科玉律；全面“姓党”、“定于一尊”，已经不容许一丝一毫的质疑。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正在把“天下”打造成一党的进而更是今上习近平一人的“天下”。真是恍若隔世！正是在如此恶劣的局面下，人们更加赞叹和珍惜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真知灼见。

当然，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当年储安平和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多多少少都支持过，或存在过一些幻想，总以为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会越来越好，但几十年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制造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然而，直到今天，竟然还有不少人不但没有从储安平及其他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局限性吸取教训，还反其道而行之。当前，有一批所谓“民主党派”人士，一批号称“知识精英”的利己者，谁上台就吹捧谁，为当局吹喇叭、抬轿子、货予帝王家。这也是非常可悲可叹的。正是：

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获取教训。

附

《北望长天祭英魂》在网上刊登时的一些反馈

2022年1月4日，我把拙文《北望长天祭英魂》分上下两部传给《议报》网，很快便登录了。该网编辑部还给我来信说：“主编蔡霞特别赞赏您的文章，特意放到了特别推荐位置，祝好！”

我当然很高兴。拙文是几乎二十年前的旧文了，这次编书时，我无意中在电脑发现当年它的未删节本发表后在数天之内为世界上不少网站刊登，包括《建设与改造》网（陈子明主持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一个从选举和治理的角度探索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英文网站，由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与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联合主办。网站本着开放和求实的态度，为中国政府官员和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信息库、一间阅览室、一个交流站）、《燕南》网（北京大学学人网站）、《真话文论周刊》网（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博士主持）、《多维新闻》网、《新世纪》网、《中国事务》网、《博讯》网、《世界华人周刊》以及《华夏知青》。

数天之内，在《建设与改造》网上阅读此文的多达一千六百人次；《多维新闻》网回放了三次。

《建设与改造》网加了一个引语：“从储安平到赵紫阳”。

《新世纪》网导言是：“最近得知章诒和有想法，要在北京为她父亲立个纪念碑，并希望罗隆基和储安平的纪念碑最好也立并且都立在一起。我心里想，有无可能干脆一个碑三面体？”

毕竟章伯钧在 1957 年 5 月 21 日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接着在 5 月 22 日提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又在 6 月 1 日提出的‘党天下’，已经一起被称之为‘中国右派三大反动理论’。”

《燕南》网的引语是：“从凤凰卫视纪念储安平所想到”。

该网不但读者众多，而且有众多评论。以下是开头一些评论：

* 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风骨。

*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归根结底是无孔不入的专制主义传统下，全社会尊重基本人权的意识十分淡薄，自由主义的力量对比很微弱，抵御不了极权主义的侵入，肆虐。

这是苦难国史中的宿命，非人力所能及。这么说不是悲观和推卸责任，而是对国人普遍的主体意识觉醒程度有清醒的认识。

各位学友，勇猛精进呀！

* 沉重的历史。

* 千古奇冤的背后是什么？

当初选择的路径不就注定了日后的悲剧吗？

在历史的迷局中，有几人能象胡适、傅斯年一样清醒而执著地坚守自由主义的底线，不为天花乱坠的极权主义所迷惑呢？

中国知识界为自己的肤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殃及国族全体！

* 五大右派平反之日，即是我中华复兴之日。

GCD 只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的执政党，并非国家之党，人民之党，仅是部分人的专权之党。五大右派不知何时能在中华大地上彻底平反，还历史以真面目，给历史一个公道。我畅想那一天必定是中国大陆走向自由、民主、共

和的伟大的一天！是迈向真正伟大复兴的坚实一步！

* 曾经如此的漆黑，还能有光明的来日？想想可怕、可疑的是，这种漆黑仅仅是某个政党，还是这个民族的自身、人类的自身？！

*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 值得纪念、反思的人、事！

* 民主与乱世的疑问。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首先我承认自己被“洗脑”的厉害，比如在民主问题上，我的疑问也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统治的国家，如果我们也实行两党制，实行西式民主，中国有没有可能乱？这种乱是不是会破坏经济建设？究竟民主与稳定是什么关系？

我不是学者，对这方面没有研究。心存疑问，恳请专家解答。

* 那你一定读过《中共 2005 年 5 号》文，正在扶持民主党派建设、参政！

* 那是个疯狂的脑袋啊！有自由精神的人太少了！所以，才感觉他们的好！

* 我们何时也能纪念啊！！！！！！！！

我在“史海钩沉”栏 5 月 23 日发稿：《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却换来家破人亡——储安平》。遥寄哀思，向他致敬！！

直到今天，对反右派仍然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并没有承认错误，只是把“扩大了的”552.877 名右派，居

面临下歧视性地给以改正，不是“平反”，不退还法定的私有财产——22年的工资，连个“对不起”都不说，更没有“赔礼道歉”，更没有“赔偿”22年的精神损失，毁坏前途的损失，家属子女受牵连的损失……在法律上，道义上都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就算不了了之吗？……储安平就是屈死冤魂的代表，在上天是难以瞑目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此严重违背宪法第41条：“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向谁伸冤，向谁讨债哪？……

储安平又是中央级不虞改正的仅有的五个人之一，就是这个“反右派是正确的必要的”论成为我们大家纪念他的障碍和禁区——什么时候才能“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决不能有“实用主义”的对待，需要时挥舞他，不需要时丢弃他，实践已经证明了的真理，却不愿意，也不敢承认他，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 纪念！

* 这是谁的耻辱？

“中国右派三大反动理论”；而且，这“三大反动理论”得以名留青史，亦需要一起“感谢”毛泽东的“阳谋”之功。

* 没有平反的大右派和九十几个中右派都是谁呀？请知道的列出来。非常感谢。

* 正视历史 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

* 五大右派名单：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

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猛看一眼，真的被这种先知般的预言所惊骇！细想，这可能就是中国的宿命了！

.....

现在，在中国，上文提到的许多网站已经灰飞烟灭，即使在个别残留网站中找到我的文章，文后的留言、评论亦已统统归零。真是恍若隔世！

大时代剧变中的一个悲剧

一

2013年2月9日，壬辰龙年的最后一天。除夕夜，在北京佑安医院一间病房，一位叫“鲍蕙荞”的女人带来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说：“敦子夫人太劳累了，我们怎么也要吃顿团圆饭。”不过，这顿年夜饭，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罢了。鲍蕙荞，或是敦子，现在哪有什么心思品尝丰盛菜肴。至于病房里的这个叫庄则栋的病人，这两个女人各自人生一个阶段中最重要的男人，更连张口的气力也没有了。

前一天中午，庄则栋病情急转直下，院方通知家属考虑准备后事。在敦子赶回家中取衣服的两个小时里，庄则栋不断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夫人的名字。他执意让人用手机拨通电话，用最后的气力慌乱地呼喊：“敦子，你快回来吧，快回来吧……不然咱们就见不上了。”敦子赶回病房后，他才安静下来，闭着眼睛紧紧拉着敦子的手。他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儿子庄飏握住。守在身边的人问道：

“你拉的是谁的手？”也许是潜意识起作用，庄则栋回答说是“蕙荇”。站在旁边的前妻赶紧上去，从庄魑手里接过这只曾经叱咤风云但现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枯萎下去的手，喉咙有些发梗，说：“我是蕙荇。”……

2月10号，癸巳蛇年大年初一，庄则栋永远合上了双眼。

中国官方媒体北京2月10日电：

“中国乒坛宿将、中美乒乓外交功臣庄则栋，在与癌症病魔作了顽强抗争后，终因治疗无效，于今天下午17点06分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电文六十个字，但这六十个字如何能够概括得了庄则栋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

二



本书作者曾于2003年9月
在北京拜访庄则栋。

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
没有谁不知道庄则栋的大名的。

1961年，北京承办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中共政权成立以来首次承办大规模的国际比赛。比赛中，

二十一岁的庄则栋与队友过关斩将，最终击败称霸世界乒坛多

年的日本队，首获男团冠军。在单打比赛，庄则栋势如破竹，脱颖而出，第一次登上男单世界冠军宝座。在视体育也是政治的中国，这个胜利非同小可。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大陆，久与世界隔离，又

正值大饥荒，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一个冠军的奖杯就犹如一支起死回生的强心针，让举国上下兴奋莫名，生活在困难时期的几亿人饿着肚子为庄则栋和他的队友雀跃欢呼。笔者当时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大部分同学都已饿得浮肿了，但那些天一有空便围在收音机跟前收听比赛实况转播。记得庄则栋取得胜利那晚，大家纷纷从宿舍跑出来，在春寒料峭中尽情地敲着脸盆饭碗狂欢庆祝。

此后，在整个六十年代，庄则栋步步走向巅峰。他横睨群雄，所向无敌，国家队内部三连冠、全国三连冠、世界锦标三连冠尽收囊中。从1961年到1971年，以庄则栋作为主力的中国乒乓球队，四夺世乒赛男团冠军。1973年，国际乒联永久地授予他一座复制的男单奖杯“圣布莱特杯”。

1971年，庄则栋一个事先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意外的举动，更让他成了参与国际政治的风云人物。

那时，在日本名古屋正在举行三十一届世乒赛。一天，一个美国运动员无意中错上了中国代表团的

车，全车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敢打一声招呼。一片沉默和尴尬。在难以忍受的漫长的十分钟之后，庄则栋向他走了过去。当时车里的人纷纷发出善意的警告：小庄干嘛去？别去！别惹事！别理他！当时文革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别紧，人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和“头号敌人”往来，这能行吗？



当年的世界冠军庄则栋

但庄则栋还是向前走去，通过翻译向这个叫科恩的美国选手说：为了表达对美国人民和运动员的友谊，我

送你个礼物作纪念……

中美两个敌对国家的运动员交往，果然引发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种种揣测纷至沓来，兴风作浪，沸沸扬扬。不过，此时忙于文革并为文革搞昏了头的中国有关当局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巨大价值。相反，据说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把庄则栋的行为初步定性为“外交事件”。中国驻日使馆已经决定连夜发他回国，追究责任，只是考虑到影响太大而未敢付诸实施。如果当时庄则栋真的被送回国就肯定要进监狱了。

几天后，外交部收到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访华的报告，还是依惯例决定给以否定的答复；周恩来、毛泽东也先后批示，同意外交部的意见。但是，在毛批覆这个报告当晚，奇迹发生了。毛泽东吃过安眠药准备睡觉时，顺手翻看摆在床头的《参考资料》，无意中在78页看到庄则栋与科恩结交的消息，脱口感叹道：“我的庄爷爷！”他感到庄则栋这个打乒乓球的小青年做到自己心坎上去了。本来毛泽东说过，他吃过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但这次例



有庄则栋等乒乓球
运动员签名的球拍

外。他收回成命，迅即下达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很快，同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到达了北京，7月和10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两度秘密访华，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一个历史的转折发生了，世界格局出现原先绝对无法想象的大变化。

三

这就是人们说的“小球转动大球”。毛泽东后来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此后庄则栋的命运便发生了一次大起大落的奇特的变化——“乒乓外交”使他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政坛上迅速升起的一颗新星，也酿造了他人生一个大悲剧。

就因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句话，庄则栋于1973年成了中共中央委员，1974年开始进入国家体委领导层，不到一年之后，只不过三十三岁，便官至国家体委主任，可谓年少得志，意气风发。不料，又不到两年之后，政治风云突变，“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晚上悉数被捕。当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粉碎四人帮而兴高采烈时，庄则栋却从体委主任高位黯然直落成了被监管分子。庄则栋无法明白自己何错之有，自己一心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怎么一夜间就变成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帮凶？！1977年5月22日，又绝望又想不通的庄则栋用一根尼龙绳自杀，虽然没有死成，但此时的前世界冠军成了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关押审查四年之后，庄则栋被发配山西等候结案，那是1980年10月。又过了三年，在1983年，庄则栋回到北京回到三十年前学习乒乓球的市少年宫任教。人生又回到原点，一切政治活动和荣誉都再也与他无关，包括纪念“乒乓外交”的活动。经过文革十年，庄则栋和钢琴家妻子鲍蕙荞的感情也破裂了，再生活在一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最后，在1985年，他们二十二年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当他离开鲍蕙荞家的那个小院子时，他的全部财产只够放一辆三轮车，这辆车还是他自己蹬着走的。他回到北京交道口他母亲的家里，

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当然，在他的微薄的财产中，他还有自己视为最珍贵的当年他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



庄则栋送给本书作者的书：

《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庄则栋已经落难，年过四十的敦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他们自然很快便堕入爱河。但因为庄则栋的政治问题，两人的结婚申请竟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最后经邓小平亲自批准才得以通过。1987年12月19日，在敦子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并定居北京以及庄则栋同意不能出国这些条件后，他们终于成功举行了婚礼。敦子是个典型的日本太太，当初为了结婚，她曾专门在日本上过一个家政学校。在他们整洁温馨的家里，处处可以感受到女主人勤劳贤淑和二人世界的宁静祥和。就在敦子的爱心陪伴下，庄则栋走完人生的最后二十六年——敦子是他晚年黄昏的“长明灯”。

四

这许多年来，庄则栋总说，他要忘掉文革，不去想，也不去写，

这段历史任由后人去评说。每天早晨，庄则栋都和敦子到小佛堂里双手合十敬佛祈福。他说他小时候曾经被班禅和达赖两位活佛灌过顶，所以一生做成两件大事：拿世界冠军和促成乒乓外交。



2003年9月，我在北京曾经专门去拜访过庄则栋。他送给我的书是他和敦子合著的《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书中当然不提他文革“飞黄腾达”的事。我们也不谈及。不过，我心里一直疑问：

庄则栋写给本书作者的题签 庄则栋可以彻底摆脱文革的梦魇吗？

在澳大利亚以及西方其它国家，不乏各行各业的明星因为个人对政治感兴趣，而且实在有政治才干，进而通过个人奋斗，包括善于利用本身的明星效应，改行步入政坛，并取得出色的成就。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里根先生。这位二三流的电影演员，竟华丽转身变成绝对一流的政治家，成了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总统，他的贡献甚至延伸到促成“柏林墙”的倒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庄则栋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

这个原本单纯、热情、朴素的青年，在三十岁以前只是一个乒乓球天才，而对于政治，他的全部经验只不过是来自文革开始时每一个中国人所耳闻目睹的一切——政治就是站队，站错队就要倒霉。他看到，跟刘少奇，刘少奇一完下边就是一连串的大大小的被斗得不可开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林彪，林彪一倒他的“四大金刚”都全部落进“林彪反革命集团”。而这一切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那么，跟着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绝对

不会错吧？这里有一件事是最致命的。1973年，庄则栋被派往“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毛泽东在这封日期定为1966年7月8日的信中，把他称之为“现在不能公开”的“近乎黑话”的内心想法当然也就是关乎中国全国人民命运的国家绝对机密都掏出来对江青说了，所以庄则栋把江青他们看作毛主席最信任的人来对待是最自然不过的。后来过了许多年，庄则栋回忆起都说，这个经历对自己影响“真是很大”。

江青当时着意培养自己人，而且要以最快的办法。她看中了年轻单纯的庄则栋。1974年12月庄则栋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时，她告诉小庄：“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可以说，当江青选择了



他时，庄则栋已经无从选择。关于他的一句政治八卦开始在全国

2003年的庄则栋，当时他开了一间乒乓球学校，看来还算踌躇满志。

流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青云直上的庄则栋成了江青的宠臣，或者不如说，成了一个工具，一个江青得心应手的工具。像那个年代许多被“四人帮”拉拢的干部一样，庄则栋上任后也着了魔似地推行“四人帮路线”，更换了很多干部，开始他所谓的“体育革命”。他后来说，“我有私心杂念，就是想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跟对人，别犯错误。”不料正是跟了江青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铸成人生大错。

五



庄则栋和前妻鲍蕙荞。

俗话说，知夫莫如妻。庄则栋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又做到了部长级别的体委主任，但鲍蕙荞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对那些东西很不感兴趣。她一再提醒丈夫，要和江青保持距离，千方百计要把丈夫拖到她的安全岛上来，但庄则栋认为，跟着“第一夫人”，政治上安全。

在那个恶梦般的年月里，他们常常争执，鲍蕙荞常常伤心流泪。政治上的悲剧导致了家庭生活的悲剧，裂痕最后难以弥合。妻子觉得丈夫不是搞政治的料，这倒是其次，她感到最可怕的，是丈夫这个人变了，她最珍视、最喜欢的东西在丈夫身上没有了，而不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多。从那时起，鲍蕙荞和庄则栋之间就有了分歧，感情也逐渐产生了裂痕。鲍蕙荞对那段日子作了这样回忆：

最初的那种幸福与甜蜜早已远离了我。我突然想起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那时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他被那群没有人味的人绑上了战车、捧上了天，自己还在飘飘然之中。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医院，独自忍受了分娩时的担忧、恐惧和痛楚，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

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我实在感觉不到有半点温暖。当年那个真诚、热情、羞涩的青年，怎么在他身上连点影子都没有了呢？

十年“文革”，丈夫离她以及这个家庭越来越远。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举国震恐。鲍蕙荞拉扯着两个孩子，和三个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红绿灯下搭了一个地震棚，住了两个多月，这段时间庄则栋居然也没有回家看过一眼。两个多月后，“文革”终于以“四人帮”倒台宣告结束。此后，虽然庄则栋隔离审查四年又发配山西三年，但可以说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鲍蕙荞作了这样的自我解剖，说：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开他，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允许自己那样做，不是出于爱情，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关于我的婚姻，我曾经在接受一家日本电视台采访时，做过一个比喻：我的家庭是一只小木船，在旋涡里头旋旋旋，最终虽然又旋出了水面，但船上的一切东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个比喻可能只有切身体会的人才会想出，可以感受得到鲍蕙荞的无限惆怅。他们是在1959年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认识的，当时大家都不到二十岁。1961年，鲍蕙荞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在中国音乐界引起一阵的轰动；此时，庄则栋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和单打的冠军，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两人再次邂逅，其后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当年，他们的爱恋曾引起多少人羡慕啊。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可是，文革之后，当年的青春纯洁，锦绣年华，幸福向往，早已消逝得无踪无影……

六



庄则栋和妻子敦子。

庄则栋弄到妻离子散，甚至差点以自杀了结自己尚还年轻的生命，他政治上的悲剧，家庭生活的悲剧，让人不胜感叹。但是，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少民众受到

惨无人道的迫害！比庄则栋更惨得多的悲剧千千万万，简直无法计算！就说当时的中国乒乓队，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等名将，庄则栋的教练和前辈，在文革中惨遭批斗，蒙受种种羞辱、冤屈，短短几个月内就相继上吊自杀了。

庄则栋说他要忘掉文革，不去想，更不会去写，以拜佛取得内心的平静。笔者作为一个同时代人，充分理解他的处境他的难处，但是，如果对他作更高的要求——他作为文革时期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应该有更高要求的——那么，他在历史面前，似乎欠缺了什么。不少人也有这个看法。例如，凤凰卫视的著名主持人陈鲁豫。她采访过庄则栋三次，她个人的感觉是，庄则栋对文革的这一段经历“没有反思”。他觉得政治就是跟人，跟对人，就往下走；跟错了，就倒霉。庄则栋给陈鲁豫讲过一件很具体的事，就是他特别敬重的大人物都可以随波逐流，都可以根据需要去表态，他“也就无所谓了”。

这就涉及到对文革的认识；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认识。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文革是

无法无天，灭绝人性，是个人崇拜，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最大特征的毛泽东思想的登峰造极。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江青在1980年公审时用了一句既形象生动又透彻准确的比喻已经说得很清楚：“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不过，行文至此，我突然感到，也许，庄则栋庆祝七十大寿。我们还是不应该因为庄则栋欠缺文革反思而把他视作一个死不悔改的罪人。看看这几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这种文革借尸还魂的把戏不是还受到许多官员和民众热捧吗？今天即使在薄熙来经已暴露的罪行已属天理难容的情况下，不是还是有人叫嚷“当官要学薄熙来”吗？再进一步说，虽然三十多年前就明言要“彻底否定文革”，但三十多年来，文革却一直是一个不能摸触不能公开探讨的“禁区”，这不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桩很难自圆其说的咄咄怪事吗？再看看今天的中国，不少明星、名人像庄则栋一样，被挑选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安排在政府部门从政，他们不管在“两会”或在其它国内国际场合，经常是在简单地重复官话，根本提不出自己的什么见解。有一位被戏称为“活化石”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从1954年第一届连任至今2013年第十二届，而且以“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来标榜自己。这种天下罕见的类似的“奇迹”不是天天还在发生吗？庄则栋的感觉而且亲身证明了的——政治就是跟人，跟对人，就往下走；跟错了，就倒霉，不是直到今天还是中国官场的金科玉律吗？多少腐败官员不就是因为“上面有人”逃过法律制裁甚至“带病”升官吗？



庄则栋在病床上。 既然如此，要求庄则栋深刻反思文革，意义又有多大呢？就让我们以宽容体贴之心对待这位乒乓天才吧。庄则栋临终前一天，当他急切盼望见到的大师兼好友范曾来到病榻前为他画素描时，竟然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坚持坐了起来，极力睁大双眼，力求给人留下自己最佳状态的形象。就让我们记住他这种精神吧，就以范曾给他送来的题字纪念他：

“小球推大球，斯人永不朽”！

（2013年2月15日于悉尼）

后记

北京时间2月28日早上，庄则栋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佑安医院举行。据冯翔《不是功臣，就是囚犯？——庄飙记忆中的父亲庄则栋》（《南方周末》2013年3月7日21版-22版）所写，那天，四十五岁的庄飙不停地奔走在医院大门口和太平间之间，去接一拨又一拨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客人。9时30分，告别仪式开始。庄飙以长子之身站在父亲遗体身侧，与一个个来宾握手。他站在第二位。站在第一位的，是他的继母佐佐木敦子。他的母亲，已和庄则栋离婚二十八年、现已七十三岁的鲍蕙荞在告别仪式开始前就赶到了现场。庄飙搀扶着她，在数百名宾客注视下走进大厅。稍后，她在一位亲属搀扶下提前离开。



佐佐木敦子为庄则栋扫墓。（唐师曾摄）墓地
位于北京昌平，墓碑最下方的石基上有“爱妻
佐佐木敦子敬立”的字样。背面刻着：“在这里
长眠着小球推动地球的人”。

来的名人不
少：濮存昕、陈鲁
豫、陈喆……但没
有看见体育系统的
人。人们问，庄则
栋过去那些队友、
教练、学生呢？国

际乒联终身荣誉主
席徐寅生、国家体
育总局前副局长李

富荣，均未出席。梁戈亮是受庄则栋恩惠的人，然而，缺席了。他很含糊地说“没有接到通知”。另外两位庄则栋在体育界的多年老友也都没有出席。有人私下表示接到了不得参加庄则栋遗体告别会的通知，但没有人愿意公开证实这条通知是真是假。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告别会，包括那些前天还说好一定到的，连飞机票都订好了的人。解释含糊不清：“这个事情，不好跟你讲是谁通知的……比较复杂。”

中国这些事情真的“比较复杂”，特别如果往其深层实质察看。我把庄则栋大起大落的人生，看作大时代剧变中的一个悲剧。在这个沉沦神州，除了那些以鲜血祭祀民主自由的先知先觉者外，还有一些被黑风妖雾裹挟到地狱的迷失灵魂。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把人变成鬼，变成另一类祭品，庄则栋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进而论之，中共可以调换主子，但它把人变成鬼的事业依然继续不变，而且还能变着花样，让可能的得宠的新鬼自以为不同于落难的已被抛弃的旧鬼。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1983 年秋天，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进修。新西兰地靠南极，远离世界的喧嚣，平静而又美丽，可称之为世外桃源。可是，我这个来自赤县神州的海外学人，心头却难以平静。许多夜晚，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却思绪不宁，举目遥望，好像看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文革结束不过几年，十年惨烈的灾难，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还不够吗？还一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成？！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报读博士学位，而且，几经考虑之后，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理所当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面；而几年前我已开始关注的王若水等人，便变成我要评论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见到王若水本人已经是几乎二十年之后。只有一次接触，而且只是短短的两三天开会期间。那是 2000 年 12 月中旬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这之前，1996 年 9 月上旬，我在云南昆



2000年12月中旬，本书作者与王

若水摄于香港大学一个研讨会上。这便厄运临头？！应该说事情并

没有这么简单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在那次香港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插曲，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清清楚楚。王若水的论文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宣讲之后，一个来自北京大学、被认为“新左派”的年轻教授立时盛气凌人地问难，训斥王的论文缺乏学术规范，不过是些“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说（研讨会的语言是英语）。王若水没有怎样回答。我不安地注视着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为肺癌开过刀，虽然他对我说过手术效果还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体并不好。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忧郁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会看到其中有掩隐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有一股悲戚与苦涩。他脸上明显地刻画着悲剧。

事后我隐约感到，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领导潮流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只不过一年之后，2002年1月9日凌晨三点十分，王若水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这位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智者，一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于因肺癌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一，领导潮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最得心应手也最光辉的岁月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年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在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若水谈得最多，名气也最大。

这个热潮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甚至当时事实上异化问题还要比人道主义问题提得早一些。虽然异化问题是人道主义讨论应有之义，但这多少还是有点令人惊奇——毕竟，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公众包括党政领导来说，“异化”是个新鲜概念。也许事出偶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王若水索稿。他记得王若水在1963年参加起草周扬牵头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王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王若水从柜子里翻出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删去文末一段，就交给汝信，在1979年第一期的集刊登了出来，题目为《关于“异化”的概念》。这个杂志专业性很强，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王若水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中国公众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九八零年六月，王若水又得到一个偶然的逐愿机会。他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

他们听不懂，希望王若水解释一下。

王若水回答时，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批判个人迷信有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现成方法。王若水指出，所谓“个人迷信”，就是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王若水还警醒地而且相当超前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王若水曾经这样解释异化：“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周扬在1963年那个曾经受到毛泽东欣赏的报告中，就是采用王若水这个学术性的解释。王若水也把这个解释写进一年半前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中。这次讲话，他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

事后，这一段录音被整理，以《谈谈异化问题》为题，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八期上发表，继而被不少报刊转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人把录音带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王若水得知，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所谓“全家”，自然包括胡耀邦）。王若水几天后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王若水发现，人们对“异化”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显然，这是因为它能够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给以比较深刻的解释。

1980年，王若水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为随后出现的“异化文学”鸣锣开道。同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王若水被邀请做了发言。王在发言中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王若水约稿，王应约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这本文集在1981年初出版，书名就采用王文的标题）。王若水写作此文显然企图切中“要害”。多少年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们把人纳入了阶级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王若水的话来说，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冷冰冰的马克思主义”。1982年春，王若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也是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

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王若水早在1982年夏天就着手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各部分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领袖神化而把民众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作商品和单纯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

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

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

“你是谁？”

“我是人。”



周扬和他的三位助手王元化（前右）、顾骧（后左一）和王若水（后左二）。他们参与起草周扬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

王若水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异常强烈，对那时已有一些冷却下来的人道主义讨论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朱光潜也给王若水写来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文中观点。

当时适逢《人民日报》

报社召开记者年会，

从各地来的与会者要求人手一份。王若水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分发之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 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有趣的是，这个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会，其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而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的确，王若水这篇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

从1980到1982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地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也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

民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顺便指出，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这个最要害、并逼使最高领袖邓小平后来亲自封杀的观点的人还不是王若水而是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高尔泰。他早在1979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并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高尔泰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加激愤。不过，由于党内职务和资历因素，王若水影响更大。正是在王若水等人的推动下，一股“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掀起来了；而周扬在1983年3月7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的、王若水也参与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标志这股热潮达到最高峰。

二，毛泽东让他大起大落：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过一些风光的时候。这是另一种“风光”——以李慎之的话说，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网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

1954年11月某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王若水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说他也是“新

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己也受到启发。王若水又接连写了第二第三两篇，毛也看了，并对第三篇特别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1957年4月，王若水以《人民日报》理论组的编辑身份，撰写了一篇社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题目为《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第一篇，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当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显然，胡是前一天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页267）十日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邓拓回答说：是王若水写的。毛泽东就说：让王若水也来。毛对此文显然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页77）毛两年多前看过王若水批判胡适的文章，对其名字有印象。

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到毛的住处后，毛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王若水，大加表扬，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那一次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说邓拓像汉文帝。据说毛决定撤掉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时，曾想过由王若水取代。

又过了几年，1963年，王若水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写了《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表扬了一番。

如前文所说，这年王若水还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时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

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写作分工时，王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周扬这篇文章，特别内中所谈的“异化”问题，为毛泽东高度赞赏。

由于这个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谓春风得意。当时，《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因此他可以贴大字报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多年来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甚至自以为在参与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年之后，在1992年12月，王若水这样反思那时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王若水，《没有结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指示《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当时已经被起用为“看大样组”（共六个人，几乎相当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的王若水，完全赞成周的指示。可是，张春桥、姚文元跑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让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王若水更觉得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了上海的机会，于1972年10月14日在理论版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张、姚为此大为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王若水于12月5日索性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张、姚一状。信上说：

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没想到这封信（李慎之纪念文章中讲的“若水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惹来一场大祸——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正是毛的意见。

这年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对他们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毛进一步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过后第三天，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处境尴尬，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指责王若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王“极右”；姚文元质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着就开始批斗王若水，从1973年到1974年，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王若水被批斗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后来又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对许多人来说，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难以承担。报社都担心王若水会自杀。但他却仍然能够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报巷”里走过，一派蔑视的气概。王若水对朋友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他，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

这种感觉甚至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

几年之后，王若水拒绝投降终于得到回报。

1976年文革一结束，王若水从干校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要分管理论、文艺、社论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几年，《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在胡、王等一些开明党人的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它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期，销量空前高，破历史记录。报纸配合拨乱反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纠正文革错误的，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流行说法：“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报》；“红旗”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大谈特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然不同凡响。

三，一根粗大的导火线：王若水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

但是，好景不长。

1983年，正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而王若水则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这似乎突然但实属必然——在中共某些领导人看来，王若水虽然“风光”一时，但绝非正统，不过是贩卖一些异端邪说，也绝难得逞。

这年3月16日，周扬九天之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发生一场举世皆知的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发表周文的当天上午，中宣部长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总编辑，接着找王若水。他对王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



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全文发表周扬讲话。

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邓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3月10日从所住的

医院来到周扬家中当面对周扬的谈话。王若水被叫去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王若水对邓力群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根据自己对这次谈话作的笔记，对所谓“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王记得，胡乔木整个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但听来比预料还要温和。王若水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胡乔木对周扬还很客气（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对王若水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王若水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秦川原先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经过胡的3月10日的谈话后，王若水他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王若水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曾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

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在3月10日，当谈话中周扬问胡乔木意见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王若水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但事情更严重的是，按邓力群的说法，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9日胡乔木打给郁文的电话。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口气很严峻。王若水他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会发表周扬的讲话。而胡乔木三月十日那次谈话，在王若水听来，是说了让周扬修改一下讲稿，但说得很委婉，并没有说不能发表。但从这个电话看来，王若水推测，胡乔木那天专程来和



周扬谈话，是想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撤销发表。胡乔木在心底里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王若水非常惊讶。

不过，王若水发觉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

了。198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周扬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消息，并预告将发表讲话全文。这句预告是王若水特意加上的，以防别的报刊抢发。

3月26日，中宣部开会，由胡乔木主持，通知周扬、秦川和王若

水参加。胡乔木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报告》说：

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求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很明显，《报告》重点是指责王若水，说王企图利用周扬的威

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以便扩大影响。这个《报告》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处理。

这个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爆的争吵。秦川这样回忆：

……周扬听着听着，突然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的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扬没有退让。

……

十六年之后，也是曾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凌志军和马立诚合作出了一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评论。他们问道：胡乔木是否有权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这两位在党中央的喉舌工作过的作者显然是故意发问。他们当然知道，正如他们自己在书里也说，

“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需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正是由于这些“必然的根据”，周扬被迫退让了。1983年11月6日，中国大陆各报发表了新华社前一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

个特意安排的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久，周扬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着继续做研究。

他对去看他的王若水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现在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紧紧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想到上次对王提到的希望无法实现了。王若水安慰地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1989年7月31日，周扬游丝般的气息停止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仅有一句话：“文艺理论家周扬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于王若水，他于1983年10月28日上午，和《人民日报》其它领导人员一起，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和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王若水他们宣布书记处10月20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的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



周扬在《人民日报》公开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预示他熬过文革重新复苏的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王若水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并不吃惊。

王若水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他将被迫摊牌，和他所在的党组织正面冲突；王若水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来得早了一些，这是王若水不愿看到的，但没有办法。

四，“清污”运动：“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胡乔木、邓力群搬倒周扬并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包括对王若水的严厉的处理，其过程竟然同时是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清污”运动；而这场“清污”运动又包含着一个妄图搬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阴谋——被史家称之为“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邓力群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

起初，胡乔木、邓力群向王若水等人宣称得到中央同意的处理报告其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展得不顺利。当时胡耀邦要出国访问，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后来也没有找。显然，胡耀邦有想把事情压下来。邓力群2006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一书中也说，他们于1983年4月20日把一个月前曾经上报、现在修改过的报告以及其它

材料再次报送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他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他邓力群就回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周扬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但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

于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大概这个时间（可能五月份），周扬也托薄一波给邓小平送了十八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

史家一般认为，邓小平当时终于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力群在他的《自述》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八月份找胡乔木谈了一次话，是缘起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邓力群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邓力群就把帮胡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龚育之等把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反复作了修改。

1983年10月12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

染”。王若水说，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不过是借邓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而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多年以来，王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归纳出王若水言论中有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邓力群对王若水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像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胡话虽然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在当时刚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会议组织者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

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10月12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第二天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12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不伦不类地搭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若水的命运也决定了。

会后，全部的宣传机器都发动了起来。

10月19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

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

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胡乔木、邓力群在《通知》中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

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



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

《人民日报》头版重大消息：王震传达邓小平清除精神污染的指示。十二届二中全会原定的“整党”反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11月1、2、3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清污”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它有关消息。“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胡乔木、邓力群把“清污”运动搞得来势汹汹，正好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整几个知识分子或开明的文化官员，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开放改革特别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统筹实施者；他们企图在中央高层酝酿“倒胡”——邓力群觊觎总书记的高位早已是司马昭之心。

胡耀邦1982年9月当上总书记。提拔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不满意，他们喜欢的人是邓力群；而胡乔木、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多次起劲地反胡耀邦，这一次又找到了机会。



开展“清污”运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参与对“精神污染”的大批判。

“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污”运动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亦不堪设想。幸好，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和习仲勋等人头脑比较清醒，联手作了抵制。此时邓小平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支持胡赵等人的抵制。

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

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

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闹了二十八天，终于半途而废——正是史家所言的“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说：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

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

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不过，此时历史的诡谲又表现出来。“清污”运动刹车之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有了新的不满。问题在胡耀邦过后继续在不同场合，如同日本外宾谈话，同上海领导人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1984年12月底召开中国作协四大，由于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开成了一个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会（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呈现一派反左景象，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非常难堪），这些情况当然让陈云等老人发怒。邓小平终于同意端出胡耀邦（1986年北戴河期间，邓小平已下了决心，发话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邦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1987年1月16日，在另一场称之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胡耀邦被赶下台。不久，一个传说甚嚣尘上：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了（例如，1987年6月下旬，王震找王首道，谈邓力群当总书记好。见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虽然，也是因为邓小平一句话，邓力群最后也垮了台。但这些权力斗争并没有改变王若水等人的命运。事实上，在1987年8月，王若水进而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党，王拒绝后被予以除名。

五，解释权威：胡乔木讲演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

那天，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 he 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便由两个播音员轮流代念全文。正如胡在开场白所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从1983年10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这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像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参与起草的八个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胡乔木指定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邢贲思本来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过去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欺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更是双重的欺骗。当然现在他有所修正）。但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小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最后总算完成了。

胡乔木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三万九千字，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前两个问题那几年中国大陆思想界并没有多少争论，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的确，胡再讲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讲演地点和十个月前周扬一样仍选在中央党校礼堂，是发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我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的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1984年1月号上发表。《红旗》杂志1月26日转载。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

《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

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胡乔木经过多次修改后出版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文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作了高度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场。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像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当年，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撰写九篇评论苏共路线的文章，不但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进行

了规模巨大的宣传，俨然成了（当然是一厢情愿）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现在他们显然企想重温旧梦，为胡文造势。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文的通知。《通知》说此文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1月28日，胡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此后，各种赞扬在全国各地各级各部门包括各种报刊、电台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胡乔木的讲演被看作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精神污染”的讲话的最权威的解释；他听到了全国上下一片赞扬声。这毫不奇怪。胡文发表之前不仅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王若水说他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邓作了如下的批示：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按照邓力群《自述》所说，这一切，包括邓力群自己关于异化的观点的变化，都是来自邓小平的决定性的影响。书中说，1983年9月30日，邓力群他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在谈话中讲了如下这些看法：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

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 1964 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邓力群《自述》说，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他和胡乔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他邓力群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而胡乔木也是因为看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

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内中真相如何，大可值得研究，邓力群《自述》自然只是一面之词。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例如其中这段话，在全党全国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六，一场悲壮惨烈的抗争：王若水单枪匹马反驳庞然大物胡乔木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演的结尾，周告天下，他“恳切地欢迎”不赞成他的基本观点的人参加争论。对此宣告，全中国学者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即使胡本人真有此心，也没有谁胆敢挑战党的首席意识形态权威，而且此权威后面还站着一个最高领袖。

果然，完全意料之中，会后全国顿时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几

年前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再出现。

只有一个几乎被掩盖的声音，就是来自王若水。他势单力薄，一时几乎是茕茕子立，形影相吊，但始终没有停止表达他

的观点，一有机会就不时发出声音——整个抗争，可谓相当悲壮惨烈。

胡乔木讲演那天，王若水去听了。王最注意的就是胡讲演的这个结尾。胡乔木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周扬和王若水，而且首先是他王若水。周扬已经公开作了检讨，失去了反驳的资格，只有他能出来公开答辩，而且他确实想姑且试之，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当时，王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纷纷好意地来阻挡，只有三个人支持：刘宾雁、王若水妻子冯媛和王的二妹。刘宾雁说得好：

“这就好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球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自诩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 王若水单枪匹马一个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一反自己观点，在《人民日报》登出长文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间。

王若水在文章中说 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对世界或历史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宽泛得多。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胡乔木批评人道主义“不能对世界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王若水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因为这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做出评价。王指出，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含义的一个方面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时，他把价值观念排除在世界观之外了；而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伦理道德时，他又把价值观念缩小了。难怪胡乔木认为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没有多少可以继承的东西，因为人道主义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是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的。王若水说，在社会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人道主义（即使它们是唯心主义的）有批判继承的关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并不是除了伦理道德之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不是伦理道德可以完全包括的，而它们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中很宝贵的东西，并为马克思所继承。

关于“人的价值”，王若水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或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因此就绝不能像胡乔木那样，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又对“人的价值”的概念表示蔑视。在胡乔木文章中，集中力量来批评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因为他们还要讲人性、人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而这些统统是为胡乔木所否定的。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像胡乔木说的那样，人们对社会主义提出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

而是许多合理的、可以解决的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被官僚主义置之度外。

王继续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即思想工作；但单是这个不够，还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是把它的意思缩小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正是在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道德问题正要从社会条件去找原因，问题在于改造社会。”

《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王若水回应胡乔木而为自己作的一些辩护，看得出他并没有太深入探讨，例如全文不涉及异化问题——他知道邓小平讲了话这就成了绝对不能讨论的禁区，而当下他主要考虑的是能否发表。

王若水这篇文章本意给《哲学研究》发表，但香港的《镜报》杂志突然在1984年6月号刊登了。王并没向《镜报》投稿，但他曾把稿子复印了几十份向人征求意见，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流传到了香港。胡乔木马上以此为理由，下令禁止王文发表；同时，严厉地责令人民日报社追查这个所谓“镜报事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王若水成了可疑的阴谋分子。胡乔木、邓力群还不到此罢休。在他们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又加紧调查王若水和所谓“地下组织”的关系。

1985年初，政治气氛有些松动。《三月风》杂志向王若水约稿。王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革命人道主义”》。胡乔木在他的长文里把毛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扩大的

解释，王若水对此质疑。他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救死扶伤”这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呢？这实际上还是把“人道主义”看成贬义词，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类定语，就不能对它肯定。王若水说，其实，革命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来实现人道目标思想和行动。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当然要救死扶伤、帮助老弱病残等等，但不会满足和局限于这些行动。他的目标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动政权。王若水的这种说法不仅批评了胡乔木，也否定了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王若水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年的历史证明，反人道主义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和危害，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得多，因此应当是主要反左。

这篇文章不但刊登在《三月风》杂志上，还在《工人日报》发表了（值班编辑用了一点小办法），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第二天，总编辑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问他发表王若水文章有什么背景。类似电话而后还纷至沓来。

1986年，王若水写了一篇更有深度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文汇报》于此年7月7日至18日连载。这篇文章是王若水在1985年作的几次演讲的整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论者认为，这篇文章以及以前发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王若水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是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王若水自己也说，他认为马克思的最好的东西在马克思的哲学里面，它仍有生命力，而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是他在这方

面的研究心得。

1986年，王若水还找到了一个机会，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近二十万字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

这部书的出版也有一个故事。王若水想把那篇《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答辩文章收进文集去。他从1985年8月开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又改了一遍。这篇文章



在1984年已经按照《哲学研究》王若水著《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意见早就磨光了许多棱角，但仍有人觉得太尖锐了。有人更担心那篇《谈谈异化问题》，想把它撤下，因为这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三联书店将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中宣部出版处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编辑不敢答复。后来商量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有这件事，但“稿子还没有齐”。对方要求看目录。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想了一个办法：把那篇答辩文章暂时撤下来，也不列入目录。在全书的清样已齐，临近七月付印的最后时刻，范用从抽屉里拿出了这篇稿子，交印刷厂火速排出，加在清样中。结果，这本题为《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新书出现在1986年的书市上，成了一本畅销书，人们排着队购买，初版三万册不久就销完了。

七、被党除名的王若水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反驳胡乔木

胡乔木、邓力群对《为人道主义辩护》这本书保持缄默。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聪明办法，因为反驳未必那么容易，而且会使这

本书的读者大大增加。但是，他们找到了别的报复办法。如前文提到，在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继胡耀邦下台和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出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8月26日做出决定，要《人民日报》党组织劝告王若水退党；如果他拒绝，就予以除名。中纪委所列出的王若水的几条主要“罪过”是：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扬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执政的共产党异化为“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化势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以及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包括发表周扬文章。



王若水的申辩书

王若水向党中央提出申诉，逐条批驳了中纪委的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王若水觉得他已对这个党失望了——无情的现实把他青年时期的理想扯得粉碎。他有时夜晚从睡梦中醒来，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我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种心情曾反映在他于

1985年写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王若水于198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稿，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的另一本文集，书名就叫《智慧的痛苦》。

1988年，不再是中共党员的王若水，在批驳中纪委决定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发表反驳文章：《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发表于1988年第十期的《书林》杂志；《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吗？》发表于他和朋友合办的《新启蒙》丛刊上（分

别在第二辑，1988年；及第四辑，1989年）。王若水终于答复了胡乔木对他的所有批判。

在《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中，王若水反驳了胡乔木说的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的说法。王说：毛泽东曾批评教条主义是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也把个人崇拜说成是“对于个人的神化”，人们没有听说过胡乔木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那么为甚么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相提并论呢？为甚么不能说个人崇拜和宗教一样都是异化呢？胡乔木还把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不谨慎和脱离群众，还有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成熟。王说这也是很费解的。毛泽东变得不谨慎和脱离群众了，那么他在群众中的威信理应降低，为甚么反而产生了个人崇拜呢？至于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在1956年八大时一度是比较正确的，后来才陷于错误。这不是毛泽东受全党影响，而是全党受毛泽东影响。全党之所以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因为对毛盲目崇拜。所以，个人崇拜是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陷于错误的原因，而不是后者的结果。王若水指责胡乔木这恰恰是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

胡乔木指责王若水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次根本性的“飞跃”。王若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一文中评论说：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新的，但它必然带有它所脱胎出来的半封建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的问题，必须靠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来解决。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就有商品拜物教，这就是一种异化。

胡乔木说，如果说异化是合乎规律的，又提出克服异化，这就

是自相矛盾，因为规律是不可以克服的。对此，王若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问道：阶级社会的产生和阶级斗争是不是规律？如果是，共产主义者为甚么要消灭阶级而斗争？理由很简单，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都是合乎规律的，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消亡。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消灭异化，因为产生异化的条件还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去减少异化现象。如“文革”，就是可以避免的。

按照胡乔木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但这些不是异化；只有“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才是异化，但是这种灾变“并不存在”。王若水驳斥说，且不说这种对异化的解释的错误，人们可以问：“文革”是不是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胡乔木必须否认“文革”有这样大的危险性，否则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

胡乔木给王若水他们关于异化的观点所下的政治结论是“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王若水说：这个话的实际含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这种帽子是吓不倒人的。什么叫“反现实”？难道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难道像贫穷、愚昧、落后、犯罪、污染、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这样的现实也反不得？难道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大锅饭、党政不分等等这样的现实也不能碰吗？不要改革吗？套用胡乔木的话说，“反现实”这个用语，正是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压制对现实的一切批评和改革的尝试。但是，如果不改革，那就不管怎

样空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样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人民是不会信任共产党的领导的，这样社会主义事业真是没有前途的。

在《论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一文中，王若水探讨了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的含义。在批评王若水等人的文章中，这句话是引证得最多的，胡乔木的论证也是以这句话为基础。王若水指出，马克思的下一句话是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这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因而使得人的本质也产生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人的真正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论证的），但人的现实的本质不一定符合这种真正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批判这种本质，并进而推翻一切压迫人、侮辱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社会关系，这就是革命。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受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从而认为完全可以从后者出发来说明前者，这种观点，实质上 and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人性不是历史中的纯被动因素。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完全决定了人的本质，那么怎么谈得上改变社会关系呢？也许有人会回答说，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但是，人就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束缚了生产力就是束缚了人。如果他们的本质已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他们又怎会感到这种束缚呢？

王若水本人自认，总的来说，他对这三篇文章要比对他最初写的那篇长文要满意一些，特别是《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比较多地从正面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出现了几百篇响应

的文章，可是王若水的反批评文章出来后，却没有什么人出来批驳或商榷。据说，胡乔木曾授意邢贲思写文章驳王，邢婉言拒绝了。胡乔木又不愿意自己出面发表文章，于是又一次施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保持缄默。显然，他已意识到，他的反驳只会更加引起人们对王若水的文章的注意。但发表王若水文章的《书林》和《新启蒙》也付出了代价——两种刊物都被戴上“自由化”的罪名而先后被迫停刊了。

八，最后岁月：思想越来越独立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旬，王若水把“清污”运动的前后内幕，把他这场惨烈悲壮的抗争的过程，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纪实文学。这部著作1995年5月脱稿，1996年1月修改，1997年9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个英文节译本，书名为：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DRIVE —A FORMER PEOPLE'S DAILY



王若水著《胡耀邦下台的背景》

EDITOR REMEMBERS——《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人民日报前编辑的回忆》，作为 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1996年夏季号专辑出版）。王若水原来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个当事人对“清污”前后的回忆》，明镜出版社出版时经王同意改成《胡耀邦下台的背景》，虽然在内容

方面相应作了一些补充，但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全面的历史而还是王若水个人的回忆录。在书中，王若水以铁的历史事实，铁的逻辑（当然是王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说明了真相，而真相自然把某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1997年5月7日，王若水在此书后记中还作了如下声明：

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和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一样；如当时我还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现在我已不这样想了。

的确，如人们注意到，也为许多论者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王若水免不了有局限，但很明显，他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纪末几年，王若水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缘起1995年底，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纽约的《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马克思主义批判”是该期封面主题，同期刊载有郑义的《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其后，此刊同年9月号登载了高寒的《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很快，郑义在同年十月号发表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再清算——答高寒》，王若水也在此刊2000年2月号发表了《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王若水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目的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人们习惯都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以此刚好相反，他认为那两场革命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乌托邦，达不到的；马克思的经

济学说基本上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跟列宁所讲的不一样，不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王若水觉得最好把马克思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人主义”。他说：

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即实践的唯人主义——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

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结尾处写道：“（中国）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这样，他通过独立思考，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确实是错了，但同时也指出世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六个误解。论者认为，该文是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有些论者还认为，王若水似乎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

王若水《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一文也表达了一些闪亮的观点。例如，王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后，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继承了这个思想，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中苏论战中，中共就是用这一套理论来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

了原来的地方。

拙文开头提到《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是王若水于2000年年底前完稿的，几乎可谓是他的“绝笔”了。在此文中，王若水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鞭辟入里地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它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运动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文章的结尾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如论者所言，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外，便是要透彻研究毛泽东。他即使在1996年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之后，还力

王若水著《新发现的毛泽东》（上下两部）战恶疾，加紧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将尽之际——在2002年元旦上午，医生边给他治疗，他还边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冯媛在电脑上记录了2600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语言干净，不需要什么编辑。终于，在王若水去世后

的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冯媛在“编后记”中说：“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这部分上、下两册、厚达 756 页的巨著，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经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结晶了。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撵下神坛，要求评毛。早在 1979 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发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很可惜，评毛的进程被阻挡了。后来这些年，大陆有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书，



王若水与妻子冯媛

其中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学养和历练，第一次最为全面最为深入地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特别选择毛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论者认为，他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

他“新发现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毛泽东。

九，公道自在人心：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



王若水摄于北京大学校门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毛的阴影还在，虽然还有人为毛招魂，但许多人都觉得，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在过去，像王若水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乎一辈子都遭人白眼。而现在，王若水发现，一旦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的时候，他在许多地方还是受欢迎。大学生请他去讲演，学术团体邀他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最让王若水铭记在心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当然是那些不畏风险写出的对他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文章。

例如，1985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在创刊号刊出了冯川的《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这家杂志在第二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长文《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高尔泰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

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高尔泰还指出，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只差没有点名，高尔泰针锋相对且非常雄辩地逐一批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击中了胡的要害。

同年4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写于1982年的论文，作者公开声明是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由于李贵仁的文章，这一期杂志后来被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

同年7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乐苦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尽管王若水并非同意刘再复的全部观点，

而且觉得刘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但他高度评价刘的这两篇论文，看作“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这一点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刘的主体性论文同时受到胡乔木的高度赞赏。）

以上文章没有谈异化问题，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开，如高尔泰在《备忘录》附记中所声明那样。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变了。1986年12月18日，《广州日报》用一整版登载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异化理论》，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黎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有人不承认异化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理由是：凡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来描写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观点，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质，单是向后看是不够的，还要向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理论，需要一种理想模式作为逻辑前提，作为座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将充分实现。

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月才发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海理论（内刊）》1988年第3期）。孙月才提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孙月才认为，应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是一个

可以研究的问题。孙月才提出公开讨论胡乔木文章的要求，并点了胡乔木的名字，这是很有勇气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可惜这篇文章只能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至于他第三点批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在王若水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倒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扬和王若水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当今社会上存在异化现象，是为了克服它（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些意思，都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

王若水一直记得孙月才这篇他认为的“好文章”。他去世前半年交给他朋友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附录”上有一行铅笔字，是王若水的笔迹：“这是准备将来三版时增加的两个附录”（将来三版的书指他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1988年12月，中共宣传当局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王若水拒绝参加（因为把他当作另类代表）。苏绍智参加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辩护，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1989年2月，高尔泰还了一个心愿——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

异化概念》（《新启蒙》第三辑，1989年），探讨他在1985年写《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时未能探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赞赏说，高尔泰这篇论文是他看到的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深入最详尽的阐释，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王若水的一些较有地位的老相识后来也公开发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都分别叙述了这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件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王若水的态度。

因“六四”下台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赵紫阳也看到并赞成王若水的文章。李锐曾回忆说，1995年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时，给他寄了一份。他立即复印托人带给赵紫阳。赵很喜欢读书，有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读后很赞成王若水的观点。（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

历史似乎可以划下——或者不如说，已经划下——一个句号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发表在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胡已于1992年9月28日去世），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常念斯”是一个化名，此人显然是胡乔木的老友，而且有些来头，他当然不会说出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胡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份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但他如上文中讲出两个“恐怕”——从胡乔木赞赏者

口中讲出，其意义“恐怕”不小。

夏中义以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来形容当时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见《学术—思想二十年——夏中义、王家范、童世骏访谈》，《社会科学报》原发，《学术批评网》2002年5月31日转发）。夏中义指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远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那么大的代价。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人被“异化”。所以1978年以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就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词语讲，他是“螺丝钉”。

十，历史的玩笑：王若水等人当年天才的 预见与异化现象严重的今天中国

历史不时开一些令人仰天长叹的玩笑。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大批大批的学者或非学者，甚至政府官员，包括当初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异化的人，都在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都在谈异化，都在谈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等等。事实上，“异化”这个高度专业性的哲学术语，今天已经进入寻常社会生活之中。打开任何报章杂志或电视台，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些说法：权力异化与腐败现象；

女性意识的异化；艺术的异化；中国足球已经异化了；知识时代作弊是知识的普遍的异化；招生指标异化为敛财的工具；爱情被金钱异化了；“富人”政治权利的异化；公权异化；公务员身份被异化；手机的异化；贵族化月饼异化成礼品、政治生态环境的异化、发展的异化、道德异化、权力寻租行为的公然异化……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多不胜数。

其中很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例如，从政观的“异化”被总结出五个方面：一是“极端个人化”，某些人从政是私欲膨胀，一味地为自己谋权夺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垄断化，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市场交易化”，某些人视从政为投资，以职权为资本，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极力为个人谋求非法利益；三是“特殊化”，某些人俨然以“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处处炫耀，盲目追求各种特权，猎取各种便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是“庸俗化”，有些人一心只想当“太平官”、做“和事佬”，曲意迎合，一团和气，四平八稳，以牺牲原则来调和关系，随波逐流，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五是“虚荣化”，“不求有为，但求有位”，以外在的职位粉饰自己的形象，摆架子、讲排场、耍威风，沐猴而冠，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得意洋洋，咄咄逼人，实则内心空虚而贪恋禄位。

一般共识是，公共权力过滥和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的基层细胞和神经末梢了。众多中箭落马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之所以能财源广进，就在其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一柄任命的尚方宝剑，足可以在当地横扫一切。而更为隐蔽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是众多的权力部门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稳固本部门的特权，又没有有效的制约形式和机制。以国家

机器作后盾的权力异化和泛滥，后果是令人震悚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论者指出，由于公共权力异化的行政垄断，而由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垄断使公有制的全民产权异化成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有产权，基层公民大众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剥夺了，这就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事实表明，在众多公权泛滥和异化的现象中，公共权力与垄断经济的狼狈为奸，后患无穷，弊端极大。但是，在中国这个政经合一的国家，这个现象太普遍了，也正因为普遍，人们已熟视无睹。

论者指出，像“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这些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公共权力的泛滥，是公共权力失控的前提，也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基础。大量的公共权力异化得不到有效扼制，将使整个社会呈现畸形发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败，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尤其是要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异化。

中国当前出现道德信仰危机，有一个名词形容：“道德滑坡”，或更为甚之：“零度道德”。以下现象是人所公认的：社会许多领域许多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经常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令人极之忧心的是，这些现象竟然随着共产党“突出经济”的宗旨的确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严重。论者指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道德

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所调节的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提出解决“道德异化”问题，用以重建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观、道德观、底线观、审美观、人格观，等等。

今天的中国，人们大谈特谈“发展的异化”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吃了苦果痛感前非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决策让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单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就成了中国式的“指标崇拜”，发展就开始了异化。今日中国，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高动荡。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于是，相应出



晚年周扬

现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叠工程。根据权威资料，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八个；中国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受到污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八至十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二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就是这样以大量能源的消耗、以环境的恶化为代

价的。人们根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没有想到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的经济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

……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叙述。

现在，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当年王若水、周扬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们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从这种理解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早在1980年（几乎三十年前！），王若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们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努力，像他们义无反顾地公开宣称那样，始终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向往。这是多么大义凛然！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范畴，这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即使对中共来说，这也应该算是巨大的功绩。只可惜，他们迎来的，却是自己的党炮制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迫害。

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这是中国悲剧。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仰天长叹！



王若水访美时与刘宾雁等友人合照。

异化现象如此严重的今天的中国，号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又回到当年王若水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可能令王若水他们安慰的是，他们的思考，后继有人，虽然思考的深度、广度、侧重点、出发点、影响力，以及所处地位，各不相同。

老子云：“上善若水。”王若水就是这样上善之人，在各个方面都足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滴水穿石。正是若水精神，鼓舞着许多志士仁人，各尽绵薄。

（成稿于 2007 年 12 月，修改于 2008 年 1 月初。）

后记

本文为纪念王若水先生辞世六周年而作。写作时参考和引用王若水各个时期的著作以及各家对王的评论，力图符合历史真实，如有误差——想必难以避免——当由笔者负责，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王若水先生是中国为数不多专注“异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有局限，有争议，但不失为一位“痛苦的清醒者”。几十年前让他和周扬惨遭厄运的那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王若水、周扬他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当年胡耀邦连同赵紫阳以及万里、习仲勋等中共领导人抵制和终止“清污”运动，其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如果套用“异化论”，那么，其“思想领域的异化”、“经济领域的异化”，特别“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人们不能不警觉中国的国运。

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经是那样跃动……

一，罗孚逝世：曾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5月2日凌晨，罗孚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许多人也许都有同感：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最终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罗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长子罗海星带我到他家。临近“九七”时，罗孚夫妇、海星及其儿子离开香港移居美国，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又先后重回香港，刚刚定

居下来（海星儿子则在美继续求学）。见面之后，我便回悉尼，带回罗老赠我的两部书：《丝韦随笔》和《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罗孚由夫人和罗海星陪同应邀到悉尼旅游，这次我得以仔细端详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悉尼文友

习惯称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当时《澳洲新报》总经理吴承欢先生，陪同他们，一行八人，到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



本书作者和罗孚先生、罗夫人吴秀圣女士、儿媳周蜜蜜女士合照（2012年11月29日摄于罗孚先生香港家中，厅堂上悬挂老友黄苗子所题“岛居”二字）。

接着赶到澳京堪培拉过夜，第二天参观游览国会大厦等胜地，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悉尼。一路上，我近距离细心观察和欣赏罗老和生公的风采，聆听他们谈吐间所涉及的陈年逸事，真可谓胜读十年书。

其后我在香港见过罗老几次。最后一次见到罗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访，然后出来一起吃饭，那天除了罗孚夫人吴秀圣女士和儿媳周蜜蜜女士，还有他们两对内地亲友夫妇。出门前，罗老被小心地给穿好外套、围上颈巾，扶上轮椅，由女佣推着，到餐厅后吃饭也需要女佣帮助。他整个时间都不说话，但似乎也在留心听着我们说什么。最令我感动的，他还在送给我的《北京十年》扉页上签了字，字迹很小，可见眼睛还好。但饭尚未吃完，他似乎已经睡去，又由女佣先行推回家。我望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思绪万千，一阵感慨。我不由得还想起他的长子——已于2010年1月14日凌晨病逝的罗海星。当时罗老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二，“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见识梁羽生、金庸的伯乐

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2003年10月那次悉尼旅游，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我们对生公毕恭毕敬，而生公对罗老则始终执后辈之

礼。这很让外人大惑不解，该知道罗老比生公不过只长三岁。

他们两人这种关系要追溯到 1949 年夏天。当时，年纪轻轻的梁羽生（此时他用真名陈文统）考进了香港《大公报》，1952 年 2 月升为副刊编辑，半年之后，又破格成为《大公报》社评委员会成员。这当然可谓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报馆与当时的罗孚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罗孚 1941 年已进《大公报》，作为“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于 1950 年 10 月面世后不久，便成为该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同时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并为报馆内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正是罗孚，于 1952 年下半年把陈文统从《大公报》延揽到了《新晚报》。

也正是罗孚，催生了新式武侠小说。1954 年 1 月 17 日，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成了轰动一时的大热事件。罗孚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既然市民对比武打擂台如此热衷痴迷，何不趁此热潮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以增加报纸销路？罗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让梁羽生出手写武侠小说而且一举成名？这就可谓是慧眼识珍珠，的确是他作为伯乐的过人之处了。

梁羽生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写，后来竟写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罗孚看到梁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发表后大受欢迎，又找上梁推荐的同事金庸。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此种体裁的基础。而罗孚，就这样“灵机一动”，“异想天开”，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用在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

柳柳成荫。”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有金庸、梁羽生。罗孚也因之被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他也以罗孚式幽默在《香港人与事》文集中这样回顾：“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

罗孚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是他们走红华语世界的幕后推手，后来，他还让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后重见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读董桥》推动了中国大陆的董桥热……作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罗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罗孚与满信法师一起翻看纪念星云大师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左为梁羽生。

但罗孚不仅仅是一位报人、作家。1947年，他就参与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调到香港参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并

正式加入了中共，入党介绍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胡绳（一说林默涵）。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在编辑部的党员继续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五十年代后半段，中共港澳工作归口由北中央主管侨务的廖承志的领导，他被廖

公亲昵地称作“罗秀才”。而这位共党“罗秀才”，随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此命运便舛驳沉浮，身不由己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因为“美国间谍”一案，被北京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那天在卧龙岗南天寺，住持满信法师赠送我们纪念星云大师弘



2003年10月23日，本书作者陪同罗孚（右六）夫妇、罗海星（左一）、梁羽生（右七）夫妇一行八人到澳洲卧龙岗南天寺参访并拜会住持满信法师（右五）。

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书结缘，又请我们吃了一次丰盛美味的斋饭。席间大家谈得很欢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师问起生死命运问题。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是潜意识里，我心有感触，还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罗老，还有他的长子罗海星。

三，“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

文革早期的罗海星

我多年以前就知道罗孚的大名，是因为海星的关系。

1964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以教师身份参与广州外国语学院（今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筹建。1965年，建成后的广外首次招生。当时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饶彰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在大量的

红五类中，也招了几位洋气的香港学生，当然他们家庭背景均非一般。他们到来之前，我们一系（即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蓝继嫦就不止一次有点神秘兮兮地嘱咐说，有一位新生很年轻帅气，非常出色，是香港一位“重要的”统战对象的儿子，要注意栽培。这位出色的新生就是罗海星，当然内地一般级别的干部不知道他的父亲罗孚并非“统战对象”而是肩负统战“统战对象”大任者，是比“统战对象”高贵十倍的“革命干部”。

由于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正苗红的罗海星虽然出生并成长于资本主义的香港，却向往社会主义“革命”，一进校便马上全身心热切地接受红色教育，不但读书好，各项活动特别对他比较困难的劳动改造也异常积极，很快便加入共青团。自然，他向往革命的单纯也让他“进步”到文革狂热中去。

1966年6月，文革被伟大统帅掀起，全国腥风血雨，黑浪滚滚，一阵高似一阵。广外很快便停课闹革命，分派文斗，进而武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罗海星，自小崇毛，认为毛主席是带领亿万民众实现均富理想的伟大领袖。他响应最高指示，投身文革，参加一个称之为“三三三兵团”的红卫兵组织。这个“三三三兵团”战斗力猛烈，而且非常奇特——在学院内是誓死保卫饶彰风的所谓“保皇派”，在社会上是威震四方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在广外与其对立的组织是“东方红”，它也很奇特——在社会上是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在学院内却与省委派来的、要打倒饶彰风的“工作队”站在同一条战线）。当然他们一切行动都贯穿着一条毫无疑问的统一的逻辑：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就那么简单，而且坚决。

罗海星那年只有十七岁。他和全国所有年轻人一样，在胸前别



七十年代末赵紫阳接见香港左派新闻界代表团
(前左一为罗孚)。

着毛主席像章，肩上背着解放军常用的那种绿色布背包，四处串联批斗，心里想着自己多么富于正义感，多么富有革命精神。文革

中，党政部门瘫痪，革命小将透过阅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通过获取的中央文革小组暗中透露或正式传达的消息，各自领会毛主席最高指示自行造反——以罗海星后来用粤语回忆的说法就是：“点做冇讲明，各师各法。”罗海星曾和战友们一起，想从广州走到井冈山瑞金，重播“革命火种”（来到梅县因当地爆发脑膜炎要停步）。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州红卫兵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夺权号召。这样一来便出现更加激烈的派系斗争，广州市的学生及其它各行各业都分为“旗派”和“总派”，初以水喉通、大刀、匕首之类对抗，接着到军营抢夺武器，便用真枪实弹相互杀人了。文革中，罗海星还有一个“替毛主席找出敌人”令他深感自豪的任务：他以被审查干部的交代材料为线索，用他的红卫兵特权到政府机关遍寻机密档案。他不但逐一面见、查问过广州不少地方高官，还踏遍陕北、新疆、内蒙以及东北各省。

罗海星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参与批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1966年一次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十万人批斗大会，罗海星以及我们广外许多师生也身处其中。赵紫阳不亢不卑，对各条非常刁难的问题回答得有理有利有节，相当镇定，头脑非常清晰。逼他自己喊“打

倒三反分子赵紫阳”，他拒绝开口；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然拒绝；最后他只喊了一句“打倒赵紫阳”。他肯定心里这样想：我既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却事实上被你们打倒了。

四，“被毛泽东骗了”：文革后期罗海星幡然悔过

上文提到，罗海星文革中面对面查问过广州不少高官，其中一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是红军老大姐。老大姐婢女出身，身世坎坷，看尽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大地主的压迫剥削，中共的出现令她满怀希望。这位曾经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想不到共产党执政后她竟被打上一条“地方主义”的罪名。饶彰风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长时也因“地方主义”这个罪名蒙冤。老大姐和其它老干部的种种故事慢慢使罗海星醒悟：他走遍全国参加审干，看到数不清的人纷纷倒下，到头来发现它们并非敌人，绝大部份都是无辜者。事实让他承认，所有审查批斗，几乎都是强词夺理，背后就是要“整人”。

据广外一些师生回忆，罗海星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他自己说是因为“过不了良心”。但他却亲眼看过不少被批斗者像狗一样，弯腰跪地被打被吐口水，被一众红卫兵包括黄毛丫头毫无人性折磨得死去活来，其情其景多年以后还是历历在目。其中饶彰风院长之死，最让罗海星深感恐怖。

饶彰风被关禁审查后，经常被毒打，甚至三更半夜被押到野外，要自掘墓穴站在里边接受批斗审问，三番几次对他搞假枪毙，假活埋。饶死前那个晚上，同监人半夜听见他的牢房传出狠喝骂声、拍

打声和最后一声惨叫。这是1970年9月12日，在粤北乐昌监狱，饶彰风是年仅五十七岁。半年以后，无法隐瞒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要她同死去的丈夫划清界线，而且还“约法三章”：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不准告诉亲友。数年后开棺验尸，亲属发现饶的右锁骨被打断，左胸肋骨凌乱断开，头颅骨上有一个半边带齿半边圆形的洞……本来毫无瓜葛的罗海星也因饶彰风受到牵连成为被批斗对象——只因他得悉饶彰风的问题后告诉在香港的父亲，落得一个泄密罪名，结果被关四个月，重获自由后，翌年被安排下农村锻炼，一年后才分配工作。当然他这个经历在那个年月不过是小事一桩。

罗海星经历一场文革血红洗礼，才看清年少时所崇拜的伟大领袖的真面目。他认识到，文革不过是中共的一场血腥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利用人性贪生怕死的弱点来达到个人绝对的极权统治的目的；而文革中所谓“人民力量”，实际只是毛泽东自我膨胀操控老百姓的恐怖手段。罗海星说：“老毛是枭雄，跟古代的独裁皇帝没有分别。一场文革令七百万老百姓死亡，全为满足他的一己私欲。”他无限慨叹：年轻时实在太“左”，太易被煽动，红卫兵都被毛泽东骗了。

2007年10月12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发表一通讲话，说什么：“民主一旦走到极端，有可能演变成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局面。”这种将民主与极端拉上关系又将文革与民主混为一谈的混帐观点激起罗海星，也像许多香港人一样加以严词痛斥。此时的海星，不但对文革做过反思，他还因为参与营救“六四”人士的“黄雀行动”被捕坐牢，在狱中染患上血癌重病，现在正遭受病魔折磨。

五，“儿子好汉父英雄”：罗孚全家总动员投身“香港文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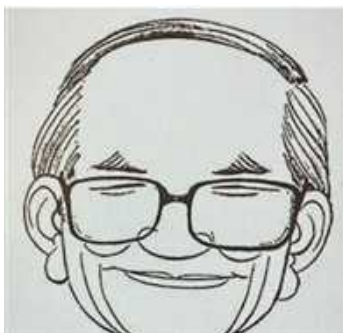
1966、1967 那两年，革命小将罗海星在广州冲锋陷阵之时，父亲罗孚在香港亦热血沸腾，亲自出马，毫不逊色。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老资格文化战士，罗孚党性组织性极强，多年来，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内地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反右派、大跃进等等，不管造成多么恶劣的后果，不管国际舆论如何恶评如潮，只因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罗孚便百般辩护百般美化，并与对方（其中包括曾为部下同属左派阵营后来自创《明报》成为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有时可谓“左气逼人”。现在是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罗孚响应更不在人后了。当时，香港逐步沦为武斗“英帝”的桥头堡，并于1967年演变成了一场所谓“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大公报》报社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是二线的其中一个“头头”，但在整个“反英抗暴”斗争中，实际上都是站在“第一线”。他们紧跟当时北京的“极左”政治主旋律起舞，宁“左”勿“右”，甚或更“左”一步，结果斗争行动最后发展到恶名昭著的“真假菠萝阵”的地步——在香港到处安置真假炸弹（香港人俗称炸弹为“菠萝”）。这个行动赢得左派头子的赞赏，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为未来世界性的城市斗争增加了一项新的武器新的战术。

罗孚本人狂热到“全家总动员”。他甚至允许他的两个只有十来岁的儿子海曼和海沙参加“战斗队”，发传单，放假“菠萝”，而且连自己都亲自上阵，以示以身作则。罗孚和他的左派同志完全漠视香港无辜市民在街头被炸死，对几乎天天从两广西江漂流到香

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绑的浮尸也无动于衷。他们对毛主席坚信不移，相信他的世界革命的鬼话，什么为了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死人的事便难以避免，而且是值得的。这是香港百年来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也是丑恶的一笔，其后果众所周知。这场斗争被称为“香港文革”，港英政府则称之为“六七暴动”，虽然为港英制造麻烦于一时，却让己方损失巨大，元气大伤。在七个月里，有五十多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接近五千人被捕。到了1967年底，斗争已无以为继。此时，香港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整个香港形势岌岌可危。“真假菠萝阵”在此次“反英抗暴”斗争中是最失香港人心之举。

罗孚和他一帮香港左派文化界报业界朋友，个个具有出众才华，在五、六十年代也曾开创相当不错的局面，但香港左派这一下等于自绝于港人。就说报业吧，六七暴动前占了报章三成销量的左报，不可避免地由兴盛走向萧条。这一群过去多年来尽忠报国、不惜舍身取义的左派精英，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的捉弄下，变得人人自危，或投机取巧，或沉默寡言，或随波逐流，也有出走投敌的。

罗孚实为一个文质彬彬的文人，却也曾有过一段如此匪夷所思的狂热举动，这正应了很多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的观察和分析：海外某些爱国人士左起来比国内左派还要左。不过，幸好，这毕竟不是罗孚的常态，不是他为人的风格。后来，他曾八个字形容那段疯狂岁月时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中国漫画家丁聪为罗孚造像。

六，从红到发紫的高台打落成了“美国间谍”：

罗孚蒙冤被判十年徒刑

过了“疯狂的六十年代”，对罗孚来说，却因缘际会地迎来了“火红的七十年代”。

1949年中共接管大陆政权以后，外交孤立，香港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成为了中国对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其中《大公报》更是中共对外宣传战线的关键点。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外交策略出现变化，北京积极与美国缓和关系，罗孚作为一位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领导，又有在香港新闻界打滚多年而收取的人脉广人缘佳的优势，便逐步被委以重任，从香港的报人、文化人，延伸至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前身）领导下，参与对台对美的统战、情报工作。为了报效国家，罗孚开始加强和台、美人士密切接触。

例如，他在1971年，通过和前云南省主席龙云七子龙绳德的合作，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学者访华团。这个“北美第一团”，是与当时海外“保钓运动”有关系的。“保钓运动”背后，有好几十位积极参与者，后来大多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

罗孚还透过时任《星岛日报》编辑曹聚仁，与台湾文化界重量级人士、儒学大师徐复观建立良好关系。在中共领导心目中，徐复观是国民党内最了解中共的人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的情报头子。

罗孚当时和美国在香港的新闻处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不止一次接受美新处邀请赴美访问。

他还与不少当年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官或学者认识、交往，这些人的身份都并非一般。

……等等，等等。罗孚这时纵横于香港文化界、学术界，为中共

统战与宣传拼命工作；而北美的学术界、台湾的新闻界，甚至美国、日本驻港的官员，也都找他沟通和开拓与大陆来往的管道。罗孚当时风头一时无两。

香港收藏家、罗孚好友许礼平年前有一篇文章《雾里看花说罗孚》，说他印象里罗孚“温文尔雅，谦和谨慎，学养高，城府深，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微丝细眼，幽默笑谈。概而言之，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无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都能处理得好。”罗孚凭其“极具亲和力的书生”形象，又有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好”的能力，便很容易获得熟识和不熟识的人特别是文化人的好感和信任。有人说过，国民党搞海外工作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达到罗孚一半程度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其形象经过罗孚的“过滤”，给人印象好了很多。徐复观在晚年的时候，还多次表示，他非常欣赏罗孚的人品、学问、文章，甚至说如果共产党人都像罗孚那样，中国就有救了。总之，这个火红的七十年代里，统战工作占了罗孚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北京中央调查部的领导也开始重视他的工作。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

谁知突然晴天霹雳。1982年5月1日，在广州陪同亲戚游玩的罗孚突然被召回北京“开会”，下机后立即扣查关禁，一年后被栽上“美国间谍”罪，判处十年徒刑。此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宗中美间谍案，当年在香港乃至整个华人新闻界和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然而，非常蹊跷的是，判刑后虽然一直到1993年满刑后才能离京返港，却未坐一日监牢，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每天派厨子做很好的饭菜，并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

假式”来形容其“服刑”生活。

七，罗海雷做了哥哥未作之事：写出了他们父亲的一生

本文有关罗孚种种往事，特别是他“美国间谍”一案，多是从罗海星的弟弟海雷一部大书中获知的。

过去十多年，我几乎每年都到香港，每次到港都会找罗海星以



罗海雷大著《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封面。

及广州外语学院的老同事餐聚。而每次和海星谈天时除了关心他的身体外都会谈到他的父亲，表示希望有关罗孚一生的资料能够问世。

早在 2002 年第一次见到罗老后，我就向海星探问，你父亲有写回忆录的可能吗？我说，你父亲是香港地位很高的报人，又是卓越的作家、评论家，而且又肩负中共的统战工作，交友非常广阔，在长达六、七十年的岁月里，经历数不清的大小事件，这一切，可谓波澜

起伏，丰富多彩，特别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最引起国际瞩目的“美国间谍”一案，如果不记录下来，不向世人“交代”一下，实在太可惜了，似乎也不应该。海星回答是：绝无可能。他父亲从来没有这个写作计划，也不可能，他一向行事低调，这是他的性格，而写回忆录多少与他性格不合。至于所谓“美国间谍”一事，他回港后更守口如瓶了，不论谁问他都只是轻轻一笑，很少作答，采取“不打听，不回应，不讨论”的三不鸵鸟政策。家里几个兄弟姐妹，连

母亲在内，大家对此事还是“一头雾水”。我还是不止一次对海星说，不管怎样，能挖出多少算多少，你父亲不写最好你来写，你是长子，比较起来，对父亲的工作和所接触的各方人物了解最多，自身经历亦算丰富，文字功夫又不错。但海星总是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也许他觉得此事难度太高，他知难而退；也许他觉得自己毕竟是坐过牢的人，担心难以客观中立，或别人看来不够客观中立，让父亲传记蒙受污损；也许他已经感觉出弟弟海雷完全可以胜任，可以写得更好。后来海星在2005年查出患了血癌，写作之事自然就不再提了。万分庆幸的是，罗老的小儿子海雷有兴趣了。2009年春节回港度假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和父母商量。海雷建议三条办法：一是父亲自己写；二是海雷写，父母再补充；三是海雷自由创作，但对外仍然声称是父亲授权的。对罗老来说，第一条不可能，第三条不愿意，那就只好协商走中间路线了。于是，2009年下半年，海雷每次回港都和大哥一起讨论如何“整”这部书。海星后来于2010年1月初不幸离世，就在出殡前两天，海雷把握这个时机，问父亲关于“美国间谍”的事，希望父亲给历史与家人一个交代，这次，罗老终于“开口”了。这样，世人也就得到一部四百七十九页的大著：《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由香港天地图书于2011年7月出版。2012年我到罗家拜访的时候，罗老夫妇送我《北京十年》的同时，也把这部书送给我，是2011年10月第三版。

全书分为十二章：桂林“罗秀才”初露头角、黑暗的日子、革命的年代、冷战初期的香港、看不见的战线、疯狂的六十年代、火红的七十年代、羁留北京十年、重返香港、文化人的故事、书画收藏、观察与反思。书前有罗孚亲自撰写的“代序”，罗海雷写了

“后记”，除此之外，还有十七份附件，内容也非常吸引人。此书写作非常严谨，据说前后一共易稿十五次，罗海雷搜集了多方面数据，罗孚亲自核对，尤其是对于书中提及的人，力戒出现纰缪。罗海雷表示，书中全是真实故事，记述父亲几十年的浮沉，以及他在三次人生关键转折期间的真实感情；又以《大公报》作为主线，兼及描述 1949 年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港澳工作的轶事、秘闻和谜团，以及改革开放后北京文艺界朋友与父亲交往的人和事。整个分析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也介绍宏观的形势和局面。特别是，此书首次将罗孚“美国间谍”案的来龙去脉、有关人士全盘托出，成为此宗事件发生后首次详细记载的文献。作者既有真凭实据，又有历史视野，整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图景，立体、多元，交织着不同历史人物的言行思想、组织规范、政治博弈和历史限制，映衬出一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与他的朋友在大时代身受的酸甜苦辣与无奈。



罗海星先生（本书作者摄于 2002 年 12 月 5 日，香港）

罗海雷这部书荣获佳评，被列入《亚洲周刊》2011 年非小说类十大好书之一。海雷说：“这荣誉的得来更多是表明了大家对父亲的支持与关心，是公道在人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可惜，罗海星活不到看见弟弟这部佳著的出版。

八，“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罗海星不幸病逝

正当罗海雷开始收集资料、理清思路时，死神不知不觉中慢慢



本书作者与罗孚及其长子
罗海星合照。（摄于2002年
12月5日，罗孚香港家中）

靠近他的哥哥。

2009年8月，我月初从悉尼经香港到内地，月底又从内地经香港回悉尼，两次停留都找了海星聚谈。他一切看来都好，情绪也不错，第一次夫人周密密作陪，点了完全吃不完的一桌肴馐点心，第二次除周密密外，还有罗老夫妇，以及海星的几位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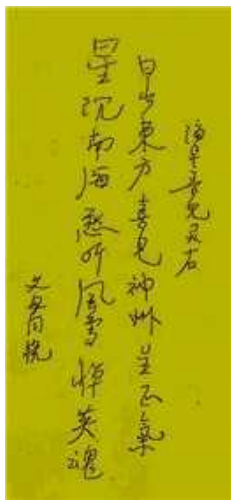
不料，两个月之后，10月中，海星染上H1N1甲型流感，在病房隔离五天天后康复，但11月底又因肺炎入住玛丽医院，一度入住深切治疗病房，被鼻饲插喉，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海星始终有斗志与病魔决斗，竟然逐步康复，而后学习呼吸，学习走路。2010年1月10日，医院下达可以出院通知，不过医生发现他的凝血度还较弱，要更换药品后再出院，谁知翌日又开始体温上升，原以为可以回家过六十一岁生日，却在14日零点24分去世了。13日下午，半昏迷中的罗海星显得相当平静。这天晚上，他母亲、妻子、儿女都陪伴在侧，八十九岁的父亲当时也坚持要去医院，但家人担心他承受不住没有让去。当医务人员整理好海星的遗体时，亲人们围拢在病床周围，母亲用手不停地抚摸海星的脸颊，爱子之情，丧子之痛，难以形容。周蜜蜜说，海星应该很安慰了。

2月4日，罗海星在香港红磡世界殡仪馆出殡，举行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运火葬场火化。按照海星遗愿，骨灰撒落大海。他生前曾说，他的名字叫海星，他也欢喜大海，有一天死后希望骨灰撒落大海，尘归尘，海归海……

罗海星 2005 年被检查出患上血癌，那几年始终在与病魔搏斗。他曾依医生建议施行骨髓移植手术，由符合医疗条件的弟弟捐出骨髓。此后，虽然生命一时得到挽救，但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免疫系统非常虚弱。而这个不治之症的病根，始于 1989 年他因参与营救“六四”人士的“黄雀行动”被捕判刑后在广东粤北怀集监狱服刑期间。那里有放射性矿藏，水质甚劣，乃癌症高发区，以前附近曾有部队医院，后来也拔寨撤离，虽说因人而异，但对免疫系统的破坏是肯定的，有些人往往十三、四年后引发病患。当时身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罗海星，出狱后果然终于罹患血癌。



罗海星 1965 年十六岁时与父母合照。当年海星入读广州外国语学院。



罗孚手书，给爱子海星的挽联。

因为这一段特殊经历，2月3日晚上举行的罗海星追思会异常悲壮。他生前无权无势，并非达官贵人，但追思会偌大的灵堂座无虚席。约三百出席者中，有香港支联会及当年黄雀行动的成员；有当年被营救的六四民运人士；有司徒华、朱耀明、刘千石、韩东方、许礼平、金渡江、孔捷生、陈丽卿、蔡崇国……等等这些人物。《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壹传媒》主席黎智英、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送上花牌；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罗海星生前所在的机构有员工送来花圈；认识或不认识的

其它人士致祭的花圈更由堂内排到门外。灵堂墙上挂着挽联：一位香港市民以“敢拒愚忠真爱国，坚承义勇定回天”作哀悼；香港文化名人杨瑞生写的是：“海立垂云名早耀不屈不挠罗门有子垂青史，星移斗转志犹坚能言能守挚友同心悼哲人”；海星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孔捷生这样感叹：“仁之大者虽千万人看孤星往矣，魂尚存乎惟江海水载侠骨归兮。”灵堂上方是“德高望重，福寿全归，浩气长存”的大字横匾。左边挂上海星岳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写的挽联：“笑迎风暴笑对死亡磊落一生何所悔；难舍华年难酬壮志缅怀娇客恨难平”。罗孚夫妇给儿子的挽联挂在右边：“日出东方喜见神州呈正气；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白头人送黑头人，哀思之情，不足为外人道，却仍挥洒一片爱国丹心。

九，义薄云天，无怨无悔：罗海星参与“黄雀行动”不惜自我牺牲

罗海雷在大哥追思会上说，大哥所做的一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有良心的香港人。罗海雷为亡兄著书立传，书名《星沉南海》出



送别良心香港人，三百人夜祭罗海星（2010年2月3日罗海星追悼会上）。

自父母挽联，将于今年七月出版。此书透过贴身观察，写出罗海星一生对于国家的苦恋以及为此参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的“黄雀行动”的故事。

“黄雀行动”出于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由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所定；或起于营救行动创立者、香港影星岑建勋一次

采访中临时说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姑且把它叫黄雀行动”。不管如何，香港这一拨有文化界、政界、宗教界、商界、演艺界、江湖大佬各色人马组成的绝密团队一开始参与救人时，只是凭着良心，凭着爱国的精神与勇气，并没有什么“黄雀行动”这一说法。他们分工严密，效率奇高。整个行动分为



罗海星为哥哥树碑立传。这是他2014年1月出版的《星沉南海》的封面。

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数据；前往前线救人；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二十几年来，营救过程很多机密尚未公开，但据传三百多名民运人士经“黄雀行动”救援，成功逃亡海外。这些人士中，有学运积极分子如柴玲、李录、吾尔开希、封从德、项小吉、王超华、蔡崇国、张伦，有作家孔捷生、远志明、老鬼，等等，有著名文化批评家高尔泰、工人领袖吕京花、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陈一咨、电视片《河殇》主要作者苏晓康、北京政法大学的教师吴仁华、北京《新观察》杂志编委艾端午、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人民日报》记者徐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等等许多人。

罗海星被捕下狱是因为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失败。海星与这两人素昧生平，但一听到这两个名字，知道他们是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清明节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就觉得是很不错的人；当然，更因为王军涛和陈子明已被定为这次八九民运的主要“幕后黑手”，如不获救便会判处重刑，因而便毫不犹豫一定要前往搭救。罗海星由衷敬佩现已失败的八九民运。他说过：

“数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事件，就只有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前夕，他在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的身影中，看到了文革初期自己的少年纯真模样；但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争取民主带领人民力量，而他那时却是被当权者利用，卷进所谓“人民力量”的极端漩涡里，与民主一点关系也拉不上，只有极权扭曲人性的丑恶。

罗海星去营救之前，其实王军涛和陈子明一个躲藏在长沙一个在湛江其行踪均已被安全部门人员掌握。当局设下陷阱，让罗海星的一个“朋友”与其联系，而罗不虞有诈，从中穿针引线进行营救。当“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钺（“六哥”）发现派去湛江的两名兄弟落网被捕，打算立即安排快艇接正在广州的罗海星偷渡回港，却一时无法联络上，结果罗回到深圳，从东门买了菜准备过罗湖口岸海关回港时遭到拘捕。那天是1989年10月14日。其后，罗海星于12月18日被正式逮捕，1991年2月被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刑五年。服刑两年后，英国首相梅杰访华，在9月3日会见李鹏时要求北京放人，罗海星因此获准保外就医返回香港。

罗海星虽然提前获释，但从此一生彻底改写。

罗海星1986年出任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北京首席代表，当年他才三十七岁；1989年他又辞去这个显赫的职位，自组公司下海从事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这一份出类拔萃的履历，可以说让人羡慕之极。如果罗海星选择走另一条路，他在大陆和香港之间所建立起的种种特殊关系和渠道绝对可能给他创造出很多人难以企及的商业成就；但他却利用这些条件参加了“黄雀行动”，此后便永远告别名利场，不但入狱，而且因而患上不治之症，即使未患病之前，也找不到合适的好的工作，最后刚过六十一岁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但是，罗海星生前从来没有后悔过参加“黄雀行动”，即使患上绝症后依然达观乐天，对当年抉择无怨无悔。二十年来，他也甚少向外透露其在“黄雀行动”的角色。他极像父亲罗孚，从来语调沉稳，心态平和，自己那怕作了惊天动地的事也不向人提及。他一直默默付出，只在心里觉得凭良知和爱心做了应该做的事。

试想想，六四开枪之后，民运已遭镇压，当局布下天罗地网，到处追捕四散逃命的暴徒反革命，天天有落网消息，全国风声鹤唳，人人避之则吉，而就在此时，罗海星却投身进去救人，毫不考虑自己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家庭之人，更不考虑会出现多么可怕的后果。古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三点，才算是彻底的坚守。人们称赞海星说这些他都做到了。他义薄云天，可谓大时代中的真英雄，但与其说是大义大勇，更让人觉得是宅心仁厚，如同风中之烛，以微茫之光照亮世道人心。

海星夫人周蜜蜜是一个见证。她说：此事海星看得很开，从来没有挂在嘴边，走时也没有吩咐。“佢冒咁大嘅险，完全系为咗爱国。”周蜜蜜像她母亲黄庆云一样，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人们希望，海星在天之灵，有个童话般的环境。海星的一生也像个童话，带着一抹凄美、悲壮的诗意。这个童话的意义，只有当我们具有对正义和美德的信念并对其衷心尊崇和不懈追求后，才能被深刻领略和欣赏。

十，罗孚父子的悲剧宿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苦恋的写照

罗海星的一生，也像他父亲一样，是他们那几代一生心系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的缩影，在在现出他们那些人的“爱国

苦恋”的心路历程。

那是藏在心灵最深处那一丝挥之不去也难以厘清的思绪和情怀。

罗海雷在父亲和长兄身上，看到他们对于国家都有这种特殊感情。他们本来都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人才，本来都坚信党的主义。罗孚自青年起几十年来就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儿子罗海星十六到三十岁在大陆，读书，参加共青团，参加红卫兵，下乡，成为国家干部，并加入共产党，到八九年还在交党费，结果都先后进了这个党的牢房。父子同命，遭遇逆境，但两人也一样，从没半句怨言。问及父兄对中共的感情，罗海雷也思索良久。他随后坦言：“像我爸曾说，已被共产党抄鱿鱼了，他们还怎会有忠心可言？经过一生人的转折历练，他们俩对共产党的感情都错综复杂，只能说，对于祖国，还是剩存着挥不去的苦恋吧。”

这里，再谈谈罗孚“美国间谍”案。

罗海雷在他的书中特别举出早年被指为中国第一冤案的潘汉年案。罗孚案比较起来，不啻是潘汉年案的“山寨版”。罗海雷说，中共陶醉于自己的组织能力，不断审查自己人的忠诚，如果说这在战争时期还有些理由，但是到主政时，却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党内权力高度集中，还往往轻信以“左”投机的小人诬告，这样的审查结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伤透人心。

罗孚“美国间谍”案虽判十年徒刑，却未进监狱。这让人们不由得认为，中共当局最后也知道自己“摆了乌龙”，但碍于面子，只好将罗孚“软禁”——一方面在权争中必须判他刑期，另方面也明知他无罪而予以宽待。许礼平在他的《雾里看花说罗孚》一文中说“伟大的、光荣的之后，还有正确的，死不认错，也就正确了。要

保持党的一贯正确，只好委屈罗公，请罗公配合，假戏真做……”真是谁也没有“司法公正”这个概念！

北京著名文化人邵燕祥以“一个悲剧的存在”形容之。他认为罗孚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左派文人的悲剧宿命。这是从屈原时就已有了的“忠而见疑”的传统悲剧。天真的人，以为自己一心为公，忠心耿耿，遵纪守法，驯顺有加，不知道已陷入“三人成虎”的怪圈。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功劳都没有用，要整你时就是要整你。这又是古来士大夫“忧谗畏讥”的传统悲剧。这四个字是范仲淹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当时的“谗”和“讥”，有不少还是当皇帝面对当事人的指责，不全是“密折”即小报告（或称告密），然共同点是不实之词。不实之词一旦蒙蔽上聪，后果可以致命。这也往往是做事越多，“问题”越多了。这种种因人治而发生的负面人际关系，又由于继续诉诸人治而无法治环境和法律机制的调节，不可避免地酿成一出悲剧。



著名剧作家、上海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沙叶新在其微博上有一段文字，如此描写罗孚一案：

“罗孚，香港资深报人，文采风流，待人醇厚，统战之功卓著。82年骗至北京被捕，罪名美国间谍。失去自由十年。最后不了了之。近有《罗孚文集》出版，罗海雷有《我的父亲罗孚》问世，皆道及这冤案。王元化说：‘我党冤枉自己人真叫厉害，冤狱遍于国中。’为我党办事者常无好下场，蒙冤者累累，屈死者多多。”

这又是一个中共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罗海雷说：“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兼负起对台对美的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获得了很多荣誉，却也因此引起内部有人妒忌，密告中央，结果根据多方面分析推断，北京有人保他，却可能是更高层的已发话了，便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黄苗子为罗孚鸣冤的手书证词。

“机缘巧合”，“历史独特环境的产物”，是罗海雷谈论他这本著作时喜欢采用的词句。他说，这也是他父亲看人看事看自己的态度。

十一，迎来文学创作高峰：罗孚“临安”北京十年，焉知非福？

自1982年5月起，罗孚在北京蛰居了十年。这期间，罗孚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他写了《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等书，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几十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和叶灵凤的三大卷《读书随笔》，写了《燕山诗话》。

返港之后，从1993年至1995年间，罗孚在香港报刊上以“岛

居杂谈”、“岛居新语”、“伪自由语”等为栏目继续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特别是，他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北京十年》，共有六百九十六篇，现已出书两部。这些文字叙述他自己的生



活、创作历程和内心活动，并结合文坛的旧事新事，抒发自己的感想。其中记录最多的，就是罗孚在北京时期与文坛人物的往来。在他的笔下，有冰心、夏衍、聂绀弩、沈从文、常任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

罗老在他送给本书作者的《北京十年》扉页上签名。

楼适夷、舒芜、范用、萧乾、周而复、启功、王世襄、黄永玉、刘宾雁……等等如雷贯耳的大名，也有他家的小保姆这等的小人物，当然还有人们都知的大人物的不被人知的事。罗孚在《北京十年》

“前言”中，自谓此书“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读，野史可能比正史更为真实，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诗讽赫鲁晓夫，并非伪作；潘汉年夫妇骨灰终迁葬于八宝山，官方无言。正史失真，令人兴叹。”此书篇什发表时，正是以其“真实”、“趣味”、“野史”在海内外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

例如改名事。罗孚被“假释”时，当局好心将他改名为“史林安”。有人把“林”字写错了，成了“史临安”，错打正着，不就是临时安排么？罗孚却想到“临安”就是古时杭州偏安之地的名字，而自己曾经用过“史复”作笔名，便“附庸风雅”请人刻了一方图章：“临安史复”。罗孚还打趣说有人错得厉害，写成“史灵安”，居然要他永远安息，而始作俑者是他老朋友“风婆子”郁风……这

些风趣的文字，来自《北京十年》的第二篇，此书第一篇更以“阿Q”自我调侃……从这些喜怒笑骂皆成文章的篇什大可看出罗孚在北京十年的生活及其情趣。十年间，他游走于社会，与北京的文史、艺术界诸多友人重叙契阔，诗酒唱和。聂绀弩1982年写给罗孚的《步和史复见赠》曰：“落日燕山吊子之，鲁公应赏此情痴。千年绝塞千山雪，一树梅花一首诗。月满庭除花睡处，日航天海酒醒时。古今中外谁诗好？你不知兮我不知。”真是活灵活现描画出他们当时相处的情景。罗孚在北京的软禁地有画家华君武相赠的一幅画，上面题字“上不必骄奢，下亦无须悲怆”，这就是罗孚的心境。正如他在《燕山诗话》自序中说，“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许多人说，能把这样的假释日子，过出诗意，也算是罗孚的生活功力了。参透人生的罗孚，早已不计较名利得失，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他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际，经历沉重打击，能处变不惊，沉着应付过去；后来在身体健康备受各种病魔侵袭时，也有幸能处理得当，力挺过来，好好地活着，不然也活不到如此高寿。也正是因为罗孚具有这样不凡的生活功力，具有“曾经沧海客，又赏狮山云”的淡定，才会在逆境中迎来文学创作高峰。

更重要的是，罗孚在逆境中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己的过去。在编辑自己的散文集时，他坦率地承认他早年很多文章不忍卒读。1988年，在《感慨万千》（此文收入《丝韦卷》，作为代前言）一文中，他说：

“……四十多年来，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最要命的是，当写下这些假话、错话时，自己却是很为严肃的，认为那是真话和正言，真实无疑，正确无误，很有些‘替

天行道’的味道。现在大梦醒来，才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实和正确到了哪里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虚。”

又说：

“……真是以其昏昏，导人昏昏。自己愚民，执行的是愚民政策！”

罗孚写出面目一新的文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反思。他的老同事、五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后来写下《丝韦的自我反左》一文，对罗孚的反思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上海名作家陈子善教授谈到《北京十年》时说：“罗先生以连载随笔的形式记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同时不断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经历、交游和他对中国现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作为一位外来的、特殊的观察者、体验者，罗先生在《北京十年》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尽管只是局部，只是某个侧面。现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忆录和论述已出现不少，《北京十年》是当时情景的一份难得的实录，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罗先生这部回忆录是很值得一读的。”

《北京十年》连载时就引起轰动，两岸三地许多学者都称赞有加。董桥等人评论称《北京十年》是“罗孚的代表作”。人们指出，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十二，“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

罗孚回港后已非“昨日之我”

罗孚“临安”北京期间，最让他刻骨铭心的事件，无疑就是“六四”事件了。

“六四”期间，罗孚忘记了自己怎么说也算是个“囚徒”的身份，以六十八岁的高龄，也独自去过天安门广场几次，在那个非常的环境下见到他那些北京文化界的老朋友，还静静地跟随学生示威大军参加过游行，附和那些“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群情激昂的口号。罗海雷在他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情不自禁地挥笔这样热烈赞叹道：

有福的是能在北京，亲眼看到了长安街上如海如潮的游行示威的群众，百年难遇，父亲却遇到了。幸何如之？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倾盆大雨中，和千千万万人站在一起，接受瓢泼般的雨水的洗礼，实在何等痛快！

罗孚的确感到有福，他自我庆幸。1993年他回港后接受电子传媒访问时，这样说：

“如果我这十年，还是照样在原来的工作上面，我又得在这讲很多假话。比如说六四。要么我就不做，六四以后，要么我就自动挂冠而去；要么我就得转轹，转轹就要讲违背自己的假话。”

他北京十年，是“杯具”还是“洗具”？不管怎样，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他获释回到香港时，带回一首在京就已写下的五律：

曾经沧海客，忽上帝王都。

散绮心犹在，传经愿已殊；

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

浊酒消寒日，故人幸未疏。

罗孚摆脱束缚、不愿再为马列传经的心愿，在回到香港后不久即发表的一篇文章表露得清清楚楚：

“回到原来居留过的地方，我已不是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已经去掉了这一重束缚，这是看不到的，但自我感觉得到。我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小心谨慎……，要按照甚么教条，教义，甚么本子，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做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么，什么是他想说的话呢？

他首先为香港“六七暴动”道歉。罗孚回港后第一时间于1993年3月15日在《当代》杂志发表文章，向暴动中受影响的人士特别死伤者公开道歉，是第一名当年左派人士就此事件正式用文字公开道歉的人。认识罗孚多年的前《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表示，罗老总最难得的地方是勇于对自己过去的做法作出深刻反思，这在左派中是很难得的品质。那次由左派发动的严重灾难，除了罗孚以外，未有左派领导人向市民道歉。左派应向他学习，他这种风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作为一位资深报人，罗孚当然对新闻自由问题感触最深。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时，罗孚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表示，百年《大公报》的前五十年值得人们追忆和纪念，而后半段则乏善足陈。他说，百年《大公报》一向有“四不”的座右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大公报》一旦成了党产，还有什么“四不”可言？罗孚举出“八九民运”为例，报纸口径一夜之间就从反对李鹏转到支持李鹏，这就是“党、卖、私、盲”一应俱全了。

罗孚心头一直想着“六四”平反问题。他回忆说，那时根本没有想到政府会向学生开枪。他认为“六四”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双输”结果，真正令他对共产党感到失望。罗孚曾出席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他觉得，夜还长，还是“如盘夜气压重楼”。他希望，照夜的烛光依然需要点亮，让香港的烛光成为照亮中国人社会的永恒之光。

自2013年4月罗孚第二次中风入院后，他神志已不太清晰，状况时好

时坏。在中风前，他告诉家人他反对“占中”运动，可以想象，他心里一定思考得



很深。他 罗孚追思会于2014年5月24日晚七时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可能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可能担忧香港社会态势恶化。他可能最不希望看到“六四”悲剧会在香港重演。

罗孚恳切期待北京能够推行政治改革。他说，他曾见证新中国成立，当时他到广州出席地方庆祝活动，他和他许多文化界朋友是何等兴奋！他一开始就是在毛泽东极力鼓吹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思想熏陶下，跟着共产党并从事新闻工作以期参与实现这些伟大理想的。但是，后来这些“承诺”都变质了，不见了。当年预告是建立联合

政府，后来都不是了。他回顾说：八十年代邓小平曾考虑推动政治改革，并让赵紫阳作出研究，最后没有推行，后来又发生“六四”事件，以后政治更倒退。

罗老家人说，罗孚生前遗愿就是 希望中国好，希望平反“六四”。这是他生命最后二十多年来念兹在兹的心头大事，是他的不散梦魂。

十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罗孚绝笔

不了解罗孚者当然很难理解他的这个遗愿——他把“中国好”与“平反六四”连在一起。

在审视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一生的时候，在审视他们所经历的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我游动的思绪捕捉住一件看似不相干的“小事”。

1989年，台湾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发行，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当年，年青的贾樟柯在他小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偶然看到消息，无比激动，甚至是深为震惊——比中国人第一次拿到金狮奖更让他震惊的，是有关这部电影的介绍。1947年，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史称“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死者将近三万人。侯孝贤在影片中通过一个林姓家庭的命运，第一次描绘了台湾人民的这一反抗事件。贾樟柯回忆说，《悲情城市》的介绍还没有读完，一片杀气已经上了他的脖颈。大陆上演的政治事件刚刚过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却已经将“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银幕。很多年后，自己也成了导演的贾樟柯有一次和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聊天，这位主席的一个观点让他深以为是：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

他想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贾樟柯觉得整部电影像摆在先人画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命运的法则高高在上，却从来不给答案，内心偶有感动与落拓，竟无法准确描绘，激情丧却，空留一地残骸……

1989年之后过了二十五年，贾樟柯这位中国独立电影导演与编剧人在国际上已名闻遐迩。他去年编剧与导演的最新作品《天注定》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并受多国观众热烈好评，本人也应邀担任今年电影节的评委。可是，这部剧情片至今未能获准在中国上映。

《天注定》取材于山西的胡文海、湖北的邓玉娇、重庆的周克华以及富士康的跳楼惨剧等十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四个真实社会事件，讲述几个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自杀的经历。这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故事，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滋生的社会背景，包括贫富差异、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等社会问题，以及个人的精神困境。贾樟柯肯定亦很无奈，给电影起了这个“天注定”的名字。这部电影所表现的中国大陆底层民众的真实处境以及这部电影自己的处境，让人觉得，这个国度，一定在什么地方，有病了。

我不由得想到罗孚于2011年6月杪在儿子罗海雷那部大著上亲自撰写的“代序”。罗老用的题目为：“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太触目惊心了——这是龚自珍的诗句！道光六年，即1826年，龚自珍写下四首七律《释言》，流传下来的这首云：“东

华环顾愧羣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



1997年罗孚全家在香港合照。

龚自珍多年来批判现

实，倡言改革，写了不少锋芒毕露的文章，发表不少惊世骇俗的言论，多触时忌，冒犯上层，给自己带来不少忧患。他做此诗，表面上是自惭、自悔、自解，其实多为反语，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对自己的嫌弃，曲折地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罗老在“代序”中说：“许多朋友劝我写回忆录，从来都是敬谢不敏。说来惭愧，我乃一介黔首，昔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也曾向往狂热‘斗争’，忘我‘革命’，到头来，却被抓将官里去。”罗孚引用了鲁迅的诗句。1933年3月2日，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这“二册”，一是《呐喊》，一是《彷徨》。《题《呐喊》》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的确，“积毁可销骨”，文祸像幽灵一样，是权势的伴生物，在权势者身边随影而行，随时出手，置文人于死地。此诗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当时鲁迅纠结、痛苦、郁闷的心境。但历史证明，鲁迅的“纸上声”绝非“空留”，罗孚当然对此非常清楚。

罗老的“代序”，不但将龚自珍的诗句作为题目，文中还借用

他的《己亥杂诗 182》中句子：“误我归期知几许？蟾圆十一度无多。”罗孚让人们不能不联想到龚自珍《己亥杂诗》中那两首名诗。其一：“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其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者，龚自珍深沉的爱国情怀真是天日可鉴。而罗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此时已是年老

多病体衰，世事于他已渐行渐远，他极力振作精神，撰写了这篇异常重要的“代序”——它可视之为罗孚的绝笔。再过三年之后，在2014年5月2日这天凌晨，天门洞开，仙乐四起，罗老看到他的爱子海星，踏着祥云，前来迎接他，于是悠然起身，含笑而去。

罗孚的去世，象征着中国左翼文化人追求乌托邦理想的时代的终结，也预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蒙田很早以前就执着地要人们相信：“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又一次，我们在罗孚和他的长子罗海星身上，看到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经是这样跃动……

（2014年5月20日写于悉尼。）



罗孚去世后第二月出版的《我重读香港》，此书收集了他憬然悟道后的文章。

2014年5月25日后记：

2014年5月24日晚七时，罗孚追思会在香港殡仪馆举行，25日上午十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香港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骨灰将洒于广西桂林的母亲河漓江。

罗孚灵堂灵位旁挂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再复等人题写的挽联。纪念册上印着黄苗子当年手书的聂绀弩赠给罗孚的诗句：“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遗照四周摆满花圈、花篮，敬献者包括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及夫人、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香港政府新闻处长聂德权、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和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等人。当天下午五时起，香港各界人士陆续前来吊唁。《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总编辑贾西平、总经理盛一平、副总编辑李启文、主笔叶中敏等，皆到现场鞠躬致祭。在追思会上致悼辞者有：《新晚报》前副总编辑郑纪农；《七十年代》创办人、专栏作家李怡；出版界友好陈松龄；徐复观之子徐帅军；《文汇报》前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陶杰父亲、《大公报》前副总编辑曹骥云；香港收藏家、罗孚生前好友许礼平；蓝真之女蓝列群等。

在追思会上，獐子罗海雷对父亲的一生，用四点作了全面的概括：成为很多人的伯乐、有好强的好奇心、长时间有独立思考及对历史有全面认知。

刘再复先生所撰写的挽联，则对罗孚的一生作了这样精炼、准确的描写：“受伤更明道，一生耿直正直，后期真精彩；落难成正果，止于大彻大悟，晚节显辉煌。”

他一生短暂，却是世间罕见的传奇



杨小凯教授

2004年7月7日清晨7时49分，有一位华人在墨尔本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大概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位离世的华人曾经名叫杨曦光，他们大概不清楚曾经生活在身边的这位华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位华人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以一篇文章震惊中国大陆的权力中心；他坐过十年冤狱却在狱中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他大概也要归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的观点可能不容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精英所忽视……

这位华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天妒英才”这一句被用滥了的悼词，用在这位现名叫杨小凯的教授身上可能并不合适，因为他生前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对他的过早谢世，真是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悲怆！

一，《中国向何处去？》：一篇文章震惊中国权力中心

小凯原来是他的乳名，他的学名是杨曦光。1968年初，在那个荒唐混乱险恶的年月，这个名字曾经流传一时，为中国大陆许多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知道，虽然于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义。

当时，随着“文革”汹涌而诡谲的铺开，杨曦光，一个十几岁的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竟然过于早熟地严肃认真思考中国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在他写出的那批在当时左得出奇却又大逆不道的论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完稿于1968年元月6日。几天之后，元月12日，文章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刊出。

这篇文章刊出时加有一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稿，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然而，这份印了八十份、只发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胫而走，数天之内便以各种方式传到全国各地。杨曦光立时

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为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在当时神州大地浓重弥漫的“巴黎公社热”中，杨曦光也从“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

“巴黎公社热”的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杨曦光当时也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拥护者——《中国向何处去？》正是以“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的。他的这篇大作，主旨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吹彻底的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手下的统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但是，杨曦光他们的极左思潮，却不合时宜干扰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且，他的大文中所运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并以此“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这也是按列宁的思路），而且断然提出

“推翻”什么的战斗口号，对中共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这岂仅是一株“大毒草”？！这亦可能变成一场足以冲破神圣庙堂的滔天洪水！

镇压发生在1968年元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省无联”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杨曦



当年对杨小凯的逮捕令。
杨曦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于是，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等人在全国展开了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规模批判。

1968年2月，杨曦光作为要犯而被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亲被怀疑就是康生所谓的“黑手”“陈老师”（她刚好姓陈），受尽批斗凌辱后悬梁自缢，身为高干的父亲则被关押，一个妹妹下放到山区，另一个妹妹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

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此外，杨案还连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1969年10月，杨曦光经一年零八个月的拘留后转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二，从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变成经济学家：

杨曦光在十年冤狱中自学成才

十年冤狱，自然是杨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以及自觉的责任感。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十年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



劳改中的杨小凯（前行右二）

电影文学剧本。如人们所说，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杨曦光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荒唐险恶的时代与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机械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这绝对是寥若晨星，甚至绝无仅有！当然，杨曦光也万幸地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学富五车却因政治问题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杨曦光的老师和启蒙

者，特别是其中那位在 1970 年就被枪毙了的《湖南农民报》总编刘凤祥。

杨曦光的质疑精神与生俱来，个人又经历这种不平常的际遇，他自然不相信当时流行的、只能顶礼膜拜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狱中甚至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后来不无自我打趣地说：

“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杨曦光读罢《资本论》之后，心中便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杨曦光已完全没有坐牢前的理想主义了。他转而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当时在狱中的真实感受。

.....

1978 年 4 月，杨曦光刑满释放。

此时，四人帮倒台已一年半，但还是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

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闲居了一年。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杨小凯后来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一名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



1979年的杨小凯

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所里安排杨小凯住在一栋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他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

杨小凯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开始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1982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全力帮助下，杨小凯被武大聘为助教，一年之后，又被提升为讲师。这个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这时，他又碰到人生一个机遇。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慧眼

赏识。于是开始了他人生另一条新的历程。

杨小凯生命后二十年的轨迹，记录了他新的奋斗新的成就：

1983 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7 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

1989 年，任澳洲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 年，成为莫纳什大学正教授；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 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 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 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 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 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 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2000 年，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



全家福：摄于 1988 年，在 Monash 大学，时杨小凯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三，“超边际经济学”：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内行人的说法，杨小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学术上的成就怎么形容都不过份。他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

当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便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赞赏杨小凯了，特别是杨和他的同事黄有光教授这几年所作的叫做“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两年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学访问，当着校长的面就说，这是当今全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认为杨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的确，按照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的意见，超边际分析是杨小凯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后的贡献。杨小凯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称之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如以黄有光的话来形容，这个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妻子生的唯

他一生短暂，却是世间罕见的传奇



杨小凯著作《发展经济学》封面

一孩子。

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

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而杨小凯，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把经济学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并把其发扬光大。他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新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内行人评论说，超边际分析是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钥匙。它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可见，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

但因为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迟迟没有突破。也许是出于机遇、勤奋和天才，杨小凯首先找到了寻求最优角点解的方法，因而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超边际分析阐释所有的分支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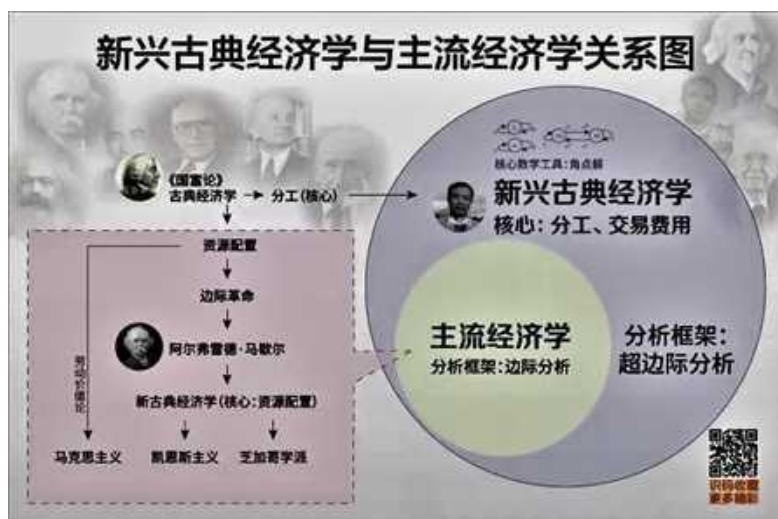
在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

杨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进而，在此问题上，杨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显然，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极其丰富，或者说跨越了一般经济学范畴。当然，杨小凯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证明；也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张五常对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尚未信服。但这位很少钦佩别人的教授也说杨小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中国学子。正是聪明者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者难求也。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张五常那种求学的际遇，杨在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是怎样？！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四，“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

人们都说，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
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
论性突破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
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华裔
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关系图（网络）

正如他们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

在本世纪初这几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后发
劣势”之争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大大开阔全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思
路。这个论争可谓具有经典意义。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从当年一个叛逃过来
的台湾军队的连长变成为今天能够影响北京经济政策的智囊人物。

这位智囊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进一步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國大陸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个观点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摹仿发达国家，由于摹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摹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

“落后国家摹仿技术比较容易，摹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摹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人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民众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

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可以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五，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

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采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关于宪政的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杨小凯，一个经济学家，却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了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应该说，这是他生命—学术轨迹所注定的，是其应有之义。中国要改革开放，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

革而不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接收了坏的资本主义，杨小凯作为一个对资本主义了解非常透切的内行人，自然心急如焚发出警告。而作为一个在中共专制独裁制度生活过并惨遭迫害的过来人，杨小凯更深刻认识到，这个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在一个题为“中国改革面临的焦点问题”的长篇对话中，杨小凯指出：“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是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发出警告：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关于宪政，杨小凯还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共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

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极左思潮、革命手段，而现在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倡导自由，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倡导宪政，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和什么什么思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他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在他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的自述中，他回顾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三个阶段的心理历程。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此时觉得，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以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自述》中，谈及英、美、澳洲、加拿大的制度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支持“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人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

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杨小凯最终皈依基督，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在他的《自述》中，杨小凯启发性地自问自答：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肯定众说纷纭。例如，宪政学者刘军宁就明确不持“基督教救国论”。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2002年7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阐述了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2005年，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广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信奉上帝的教徒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七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

六，逝世突显价值：感悟杨小凯教授的命运和思想

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杨小凯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向友人详细描绘他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地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身患重病的杨小凯摄于墨尔本家中

真是真是令人无限痛惜和悲怆的英年早逝！杨小凯就这样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去了。

不过，杨小凯天上有灵，一定也感到相当宽慰。

杨小凯谢世的当天，噩耗便马上传到他梦魂萦绕的祖国，而第二天，也就是7月8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第一时间举行了悼念活动。“艰辛求索宏图初展曦光何以顿逝？！心系神州壮志未酬鹤驾几时归来？！”——各位教授、学者怀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缅怀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事迹。

“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杨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悼词这样定位。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说：“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与楷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悼诗云：“平生风云惜师友，岁月蹉跎志弥坚。魂如有灵励相知，智遗千秋鉴世人。”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杨小凯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灵，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

悼念座谈会由杨小凯学术对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词说：杨小凯以五十五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他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自己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

林杨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二十

年。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学术观点上，特别如前面所述在所谓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问题上，时有冲突。但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毅夫充分认识到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的价值。

杨小凯的价值似乎由于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尤其显得珍贵。那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



杨小凯灵柩

小凯的去世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身世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觉到了：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和中国大陆某些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的确，应该让中国大众充分明瞭杨小凯的价值。

应该在中国二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去感悟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并从中看到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杨小凯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记录他的难友的非同凡响的书，书名叫《牛鬼蛇神录》。书的最后一页回忆他 1978 年 4 月刑满释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诉自己：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家人在杨小凯墓前。

二十六年来，杨小凯从中国漂泊到美国，又从美国漂泊到澳大利亚，但他一直心系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灵。

他仰望星空，不断思索。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终在探讨他的祖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始终在探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可能性。

当年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几十年来，仍一直萦绕於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而“向何处去”的方向，在他的思索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把杨小凯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联想起来，毕竟这三位具指标意义的改革派领袖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报考研究生、平反冤狱、出国留学)留下印记。也许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顽强地萦绕于这三位中共领袖的心头？也许他们

都有著类似的执著，有着某种理想主义情怀？也许杨小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练，又有其学养优势，因而这“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无束缚，更有突破？也许杨小凯与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别太大，彼此并无多少可比性？

总之，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和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热切希望的。

而今天，处于当前中国严酷形势下，面对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面对他的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人们发现，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理论证实无比正确，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国的现实。今天，他二十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中国人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封面

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本文写于2004年7月杨小凯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文中有关讨论参考国际经济学界的意见。2022年6月22日稍作修改。）

2022年6月22日后记：

澳华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于2004年7月7日在墨尔本家中去世。倏忽之间，竟已十八年了。本文写于当年7月杨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现在特发稍作修改的此文，以表纪念。这位大师级的华裔经济学家的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

杨小凯教授的生命—学术轨迹注定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他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杨教授生前，曾有一场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眼下中国的现实。今天，他当年先知般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杨小凯与妻子吴小娟。

附录

谁为华夏鼓与呼

雨 石

我的眼前放着何与怀博士将要出版的新书——报告文学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里面，是沉甸甸的十篇作品。两个星期来，我沉浸在阅读中，无数次地被其中的人和故事感动着，我好像跟随作者笔下人物的脚踪，阅遍了他们光辉的生命之路。

这是一条苦路，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有的只是背负十字架的坚忍、血泪、以身殉道——成为血祭，殉那片他们所深爱的苦难的土地。

这个民族似乎遭受过魔咒。它自称神州，却似乎总是不得神的眷顾，几千年从未跳出过专制王朝循环更迭的怪圈，且每一个“新朝”，总是比上一个“旧朝”更加暴虐和黑暗，尽管新朝可能有着“某天国”、“共和国”之类时髦堂皇的名号。

但这个民族，也从来不缺少脊梁，正如本书的主角，那些“沉沦神州的血祭者”。虽然他们的声音常常被认为大逆不道，他们的肉体常常被消灭于“菜市口”的愚众冷漠的围观。

法国思想家蒙田这样说过：“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他们，便正是这样的人类伟大的作品。在一个黑暗笼罩的时代，这样的生命，就是一束束光。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于是这束光便有了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承载了最多痛苦最多忧患的生命。

而何与怀博士的使命感，来自那澎湃于他生命中的良知和勇气，坚持站在历史正义一边，保存记忆和真相、抵抗假历史……。这也正是这位耿介的知识人，在今天中国全面向文革倒车之际，发出的大声疾呼。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出现过文学创作的短暂繁荣期，随着言论空间的较为放宽，以针砭时弊、揭露政治阴暗面、赞扬时代英雄、呼唤社会改革为主旋律的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以徐迟、刘宾雁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几乎风靡了整个中国，被视为中国人良知的声音。现在，由于“你懂的”原因，要么万马齐喑，要么歌德颂圣，即使报告文学还没有死绝，也很少再有人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了。

但今天，当我面对着何与怀博士的这部大作，我意识到，中国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强烈的批判精神没有断绝，它们在这些如燃烧的火焰、如奔涌的激流般的文字里顽强地存续，它们又回来了！

真是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每一篇激情磅礴的雄文，那些叙述、抒情与思辨的交响，犹如一座座丰碑，读之令人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仿佛看到那些追求真理和民主自由的先驱者们，在作者的笔下一一复活，正在向我们这些存活于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走来，并发出这样的灵魂之问：我已经尽力了，你呢？

这是一长串被无数追求自由的人们铭刻于心的名字：林昭、遇

罗克、张志新、陆洪恩、储安平、杨小凯……，他们或因坚持真理的独立思考而不见容于一个专制的政权，或因在文革的疯狂中发出清醒理智的声音而惨遭迫害和残杀，或赤胆忠心希望以自己的思想学术研究成果帮助国家向好而终致幻灭；他们本来是民族的精英，时代的佼佼者，或最淳朴的普通人，当文革尘埃落定，整个国家开始在濒临崩溃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时，他们也曾获得短暂的平反，但很快又被刻意遗忘。当权的人希望两三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们的名字可以被人们完全遗忘，被时间完全湮没。因为他们的名字会提醒人们记住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缺乏宪政法治的社会可能带来的灾难。随着岁月的流逝，事情好像也就真是这样了。

所幸，这世界还有一些像何与怀博士那样的有心人，热血未冷，要为这些英灵的不被遗忘，为他们未竟的志业，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鼓与呼。

正因如此，何与怀博士这些黄钟大吕的文字，在今天看来，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他说，忘记真实历史，制造虚假历史，本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那么，真正有作为的作家，“必须对抗这场预谋。要有良知底线，坚持站在历史正义一边”。集子里的这些文章，每一篇都有理有据，资料详尽缜密，可以当作人物传记来读。夹叙夹议的叙事风格，动辄万言，更字里行间思绪飞扬，警句迭出，时见灵光闪烁，启人深思。作者对文字把握之精准娴熟，达于化境，即便单纯作为文学来读，也是最顶级的作品。可以想像，作者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寄予了多少崇敬、多少深情，付出了多少心血！

许多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最近短短几年，中国的政治生态竟然急剧地全面恶化，向专制极权回潮。习近平确立独裁君王地位后，对外扩张，对内高压，以网络精致高科技实行全社会严

密管控。此时不要说什么希望中共当局对过去一甲子的反右、文革等运动做什么正确反思、平反昭雪，相反，包括储安平指出“党天下”的弊端、遇罗克的创导“生而平等”，反对以血统论剥夺天赋人权、王若水的“社会主义异化”忧虑、经济学大师杨小凯的呼唤实行宪政民主、以避免旧制度最终将中国带上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而与全世界对抗……，这些本来有利于国家健康发展的思想，在当今只能遭到更为恐怖的围攻和清算的命运。一个新版文革，已经在路上向我们走来；先知的预言，竟毫厘不爽地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那些文章的主角，除了那些我们高山仰止的英雄以外，还有几位比较传奇的人物。他们的人生，有代表了从极左到经历文革的荒诞而幡然醒悟的知识分子“老革命”，也有被时代裹挟，辉煌人生尽毁、生命悲剧收场的前世界冠军。他们的故事也被收入集中，这其中隐喻着什么？

是的，在一个极权专制社会，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专制体制的巨兽可以毁灭所有人，或把人变成非人。就算你是和珅大人、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林彪，或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的“红二代”，那又如何？！

思考，是人类远离灾难的路径。人们啊，要警惕！

这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危邦不居，“润”（Run—逃离）变成了“显学”。你可以“润”，逃离你再也待不下去的地方，到彼岸去为你和你爱的人寻得一片净土，这一切天经地义；但请你在仰望星空时，记得为那一片饱经忧患的土地祈祷，为仍在禁锢中的人发声，也要珍惜在接纳了你的国家享受到的民主和自由，因为这些有一天也可能失去，假如不好好地守护而听任政治骗子胡作非为的话。这是何

与怀博士这些非凡的作品给我们的启示。

最后，我想用英国诗人 John Donne (1572—1631) 的一首诗来作本文的结束：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海岬失去一角
如同你自己或你朋友的领地
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是为你敲响。

(2024 年 4 月)

(本文作者雨石女士为澳大利亚著名华裔作家。)



雨石女士

鲁迅的恶意与中国人的智慧

武陵驿

提笔写作本文是在4月12日，禁不住想：告别鲁迅的口号喊了好一阵，可告别鲁迅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悲哀和恶意便涌上来。鲁迅在1926年相同日期的《语丝》上，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他说过不止一次，他对中国人向来是恶意满满的，而他自己竟然也是中国人。我想，这是他如今越来越招中国人讨厌的原因。他又说现实出于他的意外，其实，以鲁迅的锋芒和洞见，很少能有什么出于他的意外，因为他一如既往的对中国人充满恶意，然而，他竟然意外了。他说有三样东西叫他意外，暂且按下不表。

这些意外，却是我们在何与怀博士的新书内所能见到的意内——意料之内。何博士所书写的这些中国人，我们不陌生，大抵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常常忘却的，如：敢于大声质问逮捕者我犯了什么罪的遇罗克，从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走向个人向何处去的杨小凯，从红得发紫变成美国间谍的罗孚，单枪匹马挑战党的喉舌的王若水，

从球坛误入政坛跟随第一夫人的庄则栋，痛斥党天下乃至于下落至今不明的储安平，堪称共产党员楷模却落得先锯喉后枪毙的张志新，在笔者求学时代就因为民主自由诉求而被开除出党的刘宾雁等等。

以刘宾雁为例，他既是人民的罪人，也是中国的良心。何博士的书中，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类似的彼此矛盾的身份定性，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份悖论，也是读者诸君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现实悖论。如果要成为中国的良心，你必须甘心做人民的罪人。无论结局如何平淡，如何壮烈，他们的人生都是意外，于白纸黑字间看见的淡红，全是血迹，一个人的悲剧已经超乎个人命运的意外。这些中国人在何博士的笔端，却依然勇往直前，死不悔改，何其傻也。今天，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利己主义，无论是精致还是粗鄙，都围绕在复旦的国师周围，围绕在同济的讲坛上下，笑语盈盈，和谐融洽，看不见意外，哪里需要恶意？由此可知，今天，最不受欢迎的是鲁迅。当然，何博士的这本书也在不受待见之列。

然而，笔者毕竟依然要顶风作案，推荐何博士的这本书，以及书中对中国人满满的恶意。鲁迅在同样的一篇文章中，用异乎寻常的平静，说出他关于中国人意外的看法，这些意外，有他所认为平常的理由：“当局的凶残，流言家的下劣，也有中国女性临难的从容。”这些均能在书中一一发现。我们阅毕该书，无论自觉与否，都是在淡红的血色中的苟活者，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你会发现与书中的时代、与鲁迅的时代并无多少不同，如果有不同，大约仍是鲁迅所说的“杀人者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现实是令人失望而绝望的。

如果读者诸君在本书内寻找智慧，很可能也会失望而至绝望。中国人历来鼓吹的老庄哲学持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庄追求像水一样的智慧，这种水一样随着地形、容器改变自身的智慧就是至高至尊的善。放在杯子里就是圆的。放在水槽里就是方的。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可以“处恶”而“无尤”的处世之道和至高之善，在何博士所撰的这些悲剧性的中国人身上是见不到的。何博士的这本书，不只是写了一些勇敢无畏的悲剧性的中国人，写了他们所处的荒唐悖逆的悲剧时代，更提出一个大问题：那个荒唐悖逆的时代为什么至今得不到彻底否定和清算，而这些勇敢无畏的中国人的悲剧为什么一再地上演、至今不绝于耳？书中所展示的中国人是另类的，一些傻傻的中国人，是老庄智慧的对立面，面对当局的凶残和流言家的下劣，不惜牺牲个人，莫不以悲剧收场。中国人是不乏智慧的，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到处遁形，不与人争，便无所谓是非对错，没有是非对错，便是至高之善。日常生活里，君不见到处都有人对你说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有立场不同而已。君可曾明白他们所讲的乃是善，最大的善，所谓难得糊涂。因此可见，何博士书中的这些中国人大大的不善，大大的不智，他们是一些为数不多的傻傻的中国人，可是何博士的叙事却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些傻傻的中国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于这个国家将来的意义，也将是真的猛士依稀看见的微茫的希望。

鲁迅当年能看见那些亡者永存的微笑和旧影，今日，我们从该书也能目睹一些傻傻的中国人螳臂当车的事迹，纵然现在沉默的是大多数，纵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何博士的作品仍然是要我们依稀看见那微茫的希望。写到这里，想起中国人博大精深文化和上善若水的智慧，笔者说不出话，这篇小文如果可以算作小纪念，也许可以说明鲁迅为什么在 1926 年的相同日期：4

月 12 日，他同样说不出话，文字是说不出话时唯一能代替沉默的方式，中国的问题，历来是傻子太少，聪明人过于拥挤。让我们一起用何博士的叙述来纪念一些傻傻的中国人。

（本文作者武陵驿先生为著名华裔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现为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武陵驿先生

躁动的火山

——评何与怀新书《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蒋行迈

在当今世界，大人小孩都在视频节目里看见过躁动的火山：在升腾不止的白色飞烟之下，红色的岩浆带着沉闷的撞击声在山口翻滚，刺鼻的硫磺气味从山体蔓延到大地，随时可能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喷发在时刻等待着一个临界的爆点……

当我们把自然界表现出和蕴藏着的这一情景对照人类社会，所有独立思考的人士都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相似的”飞烟、岩浆、撞击声和硫磺气味。它们在某些地域出现，强烈地刺激着感官，而历史上在这些地域准备着爆发的“火山”更是历历在目，它们都是“躁动的火山”。

在当今的华语报告文学中，就出现过一批记录和预示人类社会躁动火山的书籍。及至2024年的今天，又一部这样的书籍出版了，它就是何与怀的新书《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在书里报道了一批

坚守普世价值，抵制和反驳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先知先觉者，并对他们以鲜血作“岩浆”，咆哮黑暗、祭祀共和、呼唤爆发的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进行了追述和传扬。特别是，这部新书不仅在当今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回顾了储安平、林昭、张志新……等人追求人民共和的顽强精神及其反对独裁专制的现实意义，而且第一次翔实地报道了最早反驳文革的先觉者和血祭者，他就是上海工人刘文辉。

在今天的网络里，还可以查到刘文辉于1966年9月向十四间大专院校发送《反驳文革万言书》及他因此被处决的真实故事，但其《万言书》里“反驳文革十六条”的具体内容已经再也查不到了。查不到背后的原因就藏在“反驳文革十六条”的原文里。何与怀的新书《沉沦神州的血祭者》披露出了刘文辉“反驳文革十六条”的具体内容，该内容明确显示，刘文辉不仅是在有理有据地反驳文革，而且是在有理有据地反驳一党专制，反驳领袖崇拜和反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红卫兵如党卫军般对“敌对者”大打出手；在向被枪决者家属索要五分钱子弹钱的那个恐怖和昏聩的时代，难怪像刘文辉这般大无畏的殉道者只是凤毛麟角的了。是他，也只有他，成为了在“零时间”公开站出来反驳文革的唯一者，也因此使他成为了比屈原更加伟大和更加现实的时代启蒙者和文明之火的取火人。

紧随刘文辉之后的“飞烟”、“岩浆”和“取火者”还有陆洪恩、张志新、遇罗克、刘宾雁、王若水、罗孚、罗海星、杨曦光等人士。他们在何与怀的新书里复活，讲述着他们如何批判文化大革命是和文艺复兴之文明方向背道而驰（陆洪恩）；如何揭示领袖独裁的危害（张志新）；如何批判等级制度和彰显人权（遇罗克）；如何阐明“第二种忠诚”的意义（刘宾雁）；如何把人道主义列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王若水）；如何揭穿灵魂欺骗是以“革命”的

名义推行（罗孚和罗海星）；以及如何呼吁用先进的宪政理念和制度战胜落后体制的“后发劣势”（杨曦光）……

以上的“血祭者”把他们的人生和性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事业。然而，正如何与怀在他的新书里百般遗憾地多次重申的那样，中国人民政治上的觉醒受到了新当权者严厉的鞭挞和全力的阻挠。那个新当权者想要权倾世界和流芳百世的梦想注定他需要把全国人民的头颅按倒在愚昧和胆怯的泥沙中。一次次警醒心灵的运动被镇压了，一个个新生的取火者被陆续投入了监狱中。

尽管如此，呐喊的声音不断响起在大路边，铿锵在高桥上；变革的愿望显示在签名信里，隐喻在白纸之中；反抗的行动正在高频率地发生，不满的情绪更在神州的大地上蔓延。历次的和当今的镇压已经使底层的内聚力不断加大；“飞烟”从未断灭，“岩浆”加速翻滚，躁动的火山等待不了太久。

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在以世代传承的爱心，盼望和促使一场拯救人民和国家的变迁。

（本文作者蒋行迈博士为澳洲著名华裔作家、文学评论家。）



蒋行迈博士

